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邱坤玄博士

中共「和平崛起」戰略下的國際秩序觀



研究生：王炳忠 撰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七月

摘要

中國崛起是正在發生的客觀事實，學界對此關注的焦點，在於崛起的中國是否會對國際秩序產生威脅。西方學者的研究，主要採用權力或制度、價值的取向，進而得出「必然威脅」、「不會威脅」、「可能威脅但可避免」等結論。然而，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無論是權力或制度、價值的研究取向，皆忽略了「認知」這一重要因素，亦即對外主要行使中國代表權的中共對客觀國際形勢的主觀判斷。因此，本文針對中共在「和平崛起」既定戰略下對國際秩序的觀感與期待進行研究，並藉此掌握中共認定的「崛起」意涵，提出學界對中共外交戰略應有的正確認識。

本文就中共宣示的政策及實際作為進行分析，發現中共追求的是包含自身在內的多強集體領導的格局，並為了捍衛發展空間爭取成為東亞國家中權力最高位者；在國際制度方面，則是傳統主權制度的維護者、經濟制度的改革者與區域合作的促進者。中共奉行的是一種「不爭執政權，但要發言權」的策略，也就是依附於其認知的多極化趨勢，透過擴大自身的發言權，以和平手段促成與其它大國一起「共同執政」。然而，由於中共至今提不出具有普世性的發展模式及知識體系，故始終無法抗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價值霸權，而這將對中共「和平崛起」所期望的國際秩序多極化帶來重大挑戰。

關鍵字：和平崛起、中國崛起、國際秩序觀、中共外交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探討.....	3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20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23
第二章 中共「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	31
第一節 「和平崛起」戰略的思想淵源.....	31
第二節 決策者對「和平崛起」戰略的設計.....	39
第三節 學術菁英對「和平崛起」戰略的批評.....	50
第四節 小結.....	57
第三章 中共「和平崛起」對國際權力格局的觀感.....	59
第一節 促進多極化的世界格局.....	59
第二節 衝擊核心利益的區域格局.....	67
第三節 東亞稱雄與美國霸權.....	78
第四節 小結.....	87

第四章	中共「和平崛起」對國際制度的觀感.....	89
第一節	傳統主權制度的維護者.....	90
第二節	經濟制度的改革者與區域合作的促進者.....	98
第三節	價值觀的論戰.....	108
第四節	小結.....	118
<hr/>		
第五章	中共「和平崛起」的前景評估.....	121
第一節	中共「和平崛起」的目標.....	121
第二節	中共「和平崛起」面臨的制約.....	128
第三節	中共「和平崛起」的前景.....	138
第四節	小結.....	143
第六章	結論.....	145
第一節	研究成果.....	145
第二節	未來展望.....	149
參考文獻	155

表 次

表 1: 中共高層對「和平崛起」的相關發言	5
表 2-1: 中國大陸 GDP 及對外貿易總額(1978~2003 年)	42
表 2-2: 中國大陸 GDP 及對外貿易總額(2003~2012 年)	43

圖 1: 分析架構圖	28
圖 2: 「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的內外連動關係	12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2012年11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中通過由習近平任新一屆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會主席，中國大陸正式進入習近平時代。¹兩週後，習近平率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到中國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宣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中國夢」。²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海外版》進一步詮釋稱：「中國夢就是追求中國崛起。」³

此時的中國，距離辛亥革命結束帝制已逾一百年，即將迎來的是2014年——甲午戰爭一百二十週年，歲次同為甲午。而再往後至2040年，便是鴉片戰爭二百週年。著名中國近代史學家唐德剛認為，中國自鴉片戰爭起算兩百年，將可望走出「歷史三峽」，完成現代化的歷史轉型；⁴鄧小平也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期許，中國能在21世紀中葉時，成為一個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⁵

回顧近百年的中國歷史，經歷軍閥割據、日本侵華、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

¹ 「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 政治局常委與記者見面」，中國網，2012年11月15日，〈http://news.china.com.cn/18da/2012-11/15/content_27121188.htm〉(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4日)。

² 「習近平：承前啟後 繼往開來 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奮勇前進」，新華網，2012年11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29/c_113852724.htm〉(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4日)。

³ 陳振凱，「中國夢的中國氣質與中國景象」，人民網，2012年12月8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2-12/08/content_1156744.htm〉(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4日)。

⁴ 唐德剛認為四千多年以來的中國政治社會制度變可分為封建、帝制和民治三大階段，其中要經歷兩大「歷史三峽」，也就是兩大歷史階段的轉變，才能完成現代化。第一次是從封建轉帝制，發生於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第二次則是從帝制轉民治，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唐德剛並稱，中國自鴉片戰爭起約需兩百年，即大約在2040年時，可以走完第二個「長江三峽」，迎來「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的新時代。見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台北：遠流，2005)，頁16~17。

⁵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6/25/content_1546523.htm〉(瀏覽日期：2012年3月7日)。

等一連串的動盪，大半個 20 世紀可說是中國人苦難的年代。直至冷戰結束後，隨著國際體系的改變及中國國力的上升，中國的崛起才有了明顯的跡象。1992 年，美國學者孟儒(Ross H. Munro)發表〈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的真正威脅來自中國〉(Awak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一文，西方學界開始盛傳中國威脅論，此後並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提高甚囂塵上。⁶到了 2010 年 8 月，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⁷美國高盛資產管理公司(Goldman Sachs)進而預言，中國的 GDP 將在 2027 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⁸當今的中國無疑已是國際高度矚目的焦點。

在西方傳統二分法思維的影響下，西方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研究，主要圍繞在崛起的中國是一個「維持現狀強權」(status quo power)抑或「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的論辯上，即就中國崛起對國際秩序的影響進行探討。⁹至於中共官方，則長期迴避談論自身的崛起，直到 2003 年才首度宣示「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並隨即引發中外學界的高度關注。後來中共官方雖在說辭上將「和平崛起」改為「和平發展」，但大陸學界對「和平崛起」的各種論述仍持續進行。¹⁰顯然，「和平崛起」已是中共確立的國家戰略。

多數學者認為，「和平崛起」的提出有很強的對外宣示成份，即對中國威脅論進行回應，強調中國崛起的過程是和平的。¹¹若用國際關係的話語表達，就是中國不會以強硬的手段衝撞既有的國際秩序。準此，和平崛起戰略主要在處理實力上升的中國與國際秩序的互動關係。事實上，因為國際體系中現實權力結構的

⁶ See Ross H. 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62 (Fall 1992), pp. 10~16.

⁷ 「中國 GDP 規模超過日本 正式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網**，2011 年 2 月 14 日，〈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11-02/14/content_21915401.htm〉(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4 日)。

⁸ 「高盛：中國 2027 年有望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環球網**，2011 年 11 月 21 日，〈<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1-11/2190759.html>〉(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4 日)。

⁹ 宋興洲，「中國崛起：修正型強權或現狀型國家」，**全球政治評論**，2011 年第 11 期，頁 19~60。

¹⁰ Robert L.Suettinger, "The Rise and Descent of 'Peaceful Ris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12 (Fall 2004), pp. 1~10.

¹¹ 「崛起的中國要有自己的話語權——訪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宮力教授」，**南方網**，2004 年 3 月 22 日，〈<http://www.southcn.com/nflr/llzhuanti/hpjq/sdcs/200405101003.htm>〉(瀏覽日期：2012 年 3 月 7 日)。

制約，國際秩序的話語權往往掌握在西方世界手中，而在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下，中外學界對中國崛起的研究，很大一部分便著重在中國是否會藉由非和平手段崛起。

筆者作為一個在台灣生長的中國人，基於民族情感，對於中國的崛起充滿憧憬。筆者既好奇中共將如何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下帶領中國崛起，同時也亟欲了解中共的和平崛起戰略對達成崛起的定義究竟為何。因此，筆者以為，關於中國崛起的研究，核心的問題應是：中共對當今的國際秩序抱持怎樣的觀感，亦即宣稱「和平崛起」的中共所懷抱的國際秩序觀。筆者相信，藉由對此問題的解答，方能真正了解中共和平崛起戰略的思維內涵，並推估中共外交可能的走向。

二、研究目的

如前所述，本文聚焦於中共在和平崛起戰略下對國際秩序的觀感，具體期望能達到以下幾項研究目的：

（一）探討綜合實力持續崛起的中共對國際秩序有何企圖。雖然中共亦發表過若干對國際秩序的願景，但在措辭上仍多隱晦，且不一定是其內心的真實想法。因此本文將致力於發掘中共看待國際秩序的思維，作為在往後一定時期內分析中共外交戰略的依據。

（二）藉由中共對國際秩序的企圖，判斷中共對「和平崛起」成功的滿足標準，為中國的崛起做出明確的定義。

（三）綜合中共的國際秩序觀及對崛起的追求內容，推測中共未來的外交走向，並進而評估中共和平崛起戰略成功的可能性及侷限因素。

第二節 文獻探討

一、中共關於「和平崛起」的官方論述

西方學界早在冷戰結束之初便開始熱議「中國崛起」這一牽動國際關係變化

的動態事實。然而，在作為被討論對象的中國大陸，則雖有學者閻學通首先在 1998 年出版對中國崛起的研究，但官方卻一直未提及自身的崛起，¹²直到以胡錦濤為首的第四代領導人上台後，中共才首次向世界承認中國正在崛起。2003 年，中共提出了「和平崛起」戰略的構想，先是由時任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學者鄭必堅發表論述，再經溫家寶、胡錦濤先後重申，最後於 2004 年後漸被「和平發展」的說辭取代。¹³然而，雖然「和平崛起」的說辭淡出了中共官方的宣傳，但學界仍繼續廣泛地使用這個說法，至於官方的相關論述，則傾向將「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視為是同一概念。

關於 2003 年至 2004 年間中共高層對「和平崛起」的相關發言及其政治意義，筆者整理如下表：



¹² 閻學通是中國大陸第一位提出中國崛起研究的學者。關於當年他的研究，見閻學通，**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¹³ 「新聞背景：『中國和平崛起論』的誕生和發展」，**新華網**，2004 年 4 月 23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4/23/content_1436993.htm〉（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5 日）。

表 1：中共高層對「和平崛起」的相關發言

發言者	重要發言內容	發言場合	政治意義
鄭必堅	「在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的過程中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樣一條和平崛起新道路。」	在博鰲亞洲論壇的演講：「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2003/11/3)	首次提出「和平崛起」一詞。鄭必堅作為中共智庫學者，有其半官方的色彩。
溫家寶	「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	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把目光投向中國」(2003/12/10)	大陸官方向國際社會首次提出「和平崛起」，且選在美國宣示。
胡錦濤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要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在中共中央紀念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03/12/26)	中共中央總書記首次親自宣示「和平崛起」，有將之確立為黨的指導路線的味道。
胡錦濤	「要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的講話(2004/2/23)	中共中央總書記向黨的高層領導幹部宣導「和平崛起」。
溫家寶	闡述中國「和平崛起」五要義	大陸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閉幕記者會上答記者問(2004/3/14)	大陸官方最後一次使用「和平崛起」一詞。
胡錦濤	以「和平發展」替代「和平崛起」的說辭	博鰲亞洲論壇開幕致詞：「中國的發展亞洲的機遇」(2004/4/24)	論壇以「中國和平崛起與經濟全球化」為主題，但胡錦濤演說中已不見「和平崛起」。

資料來源：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在 2003 年博鰲亞洲論壇的講演」，新華網，2003 年 11 月 2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1/24/content_1195240.htm〉(瀏覽日期：2012 年 3 月 2 日)；「新聞背景：『中國和平崛起論』的誕生和發展」，新華網，2004 年 4 月 23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4/23/content_1436993.htm〉(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5 日)；「中國的發展 亞洲的機遇——胡錦濤在博鰲亞洲論壇 2004 年年會開幕式上的演講」，新華網，2004 年 4 月 26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4/26/content_1439621.htm〉(瀏覽日期：2012 年 3 月 2 日)。筆者根據以上資料整理製表。

由上述可知，中共提出「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最先是由鄭必堅在 2003 年的博鰲論壇上首發。由於鄭必堅曾執筆 19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草案，並曾任中共第十四、十五屆的中央委員，因此他的宣示帶有濃厚的官方色彩。¹⁴其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的演講稿，通篇即為後來官方表述的和平崛起戰略提供了大體的綱領。整體而言，綜合鄭必堅的演講與溫家寶在大陸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閉幕記者會上的闡釋，以及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 2005 年 12 月及 2011 年 9 月分別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及《中國的和平發展》兩份白皮書，便可掌握中共和平崛起戰略的大體內容。

鄭必堅的演講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1. 怎樣看中國的發展問題；2. 怎樣看中國的崛起道路；3. 怎樣看中國崛起同亞洲的關係。¹⁵就第一個問題，鄭必堅主要強調中國「人口多、底子薄」，說明中國的發展還要一段艱困的過程，並提出中國目前正致力於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希望在本世紀中葉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國家發展目標。關於第二個問題，則仍先就自身發展的層面，說明中國將在「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遵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國內建設。鄭必堅稱其為「和平崛起新道路」，表示就對外影響的層面來說，中國既不閉關自守，也不會依賴國際社會，更不會走過去幾個崛起大國爭奪霸權的老路。最後，在第三個問題上，鄭必堅塑造出中國和亞洲其它國家同為命運共同體的概念，闡述中國的發展是整個亞洲發展的關鍵部份，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溫家寶在大陸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閉幕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則又提出了「和平崛起五要義」，總體來說，即就鄭必堅演講中的前兩個問題再做宣示。而在該場記者會上，時任大陸外交部長的李肇星又補充說，中國發展的最大特點就是不使用過去殖民主義強國或帝國主義列強那種「掠奪別人、欺負別人、剝削別人」的作法，而是在建設自身市場的同時積極地參與全球化貿易，為世界帶來

¹⁴ 文正仁著，李春福譯，**中國崛起大戰略——與中國知識精英的深層對話**（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頁 2。

¹⁵ 見「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在 2003 年博鰲亞洲論壇的講演」，**新華網**，2003 年 11 月 2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1/24/content_1195240.htm〉（瀏覽日期：2012 年 3 月 2 日）。

機遇而非威脅。¹⁶李肇星的說法，為鄭必堅所說的「不爭霸」提供了更明確的定義。

準此，中共對和平崛起戰略的宣示，首先是對中國威脅論進行駁斥，其次則將「崛起道路」與「發展問題」結合在一起，淡化國際關係話語中與「崛起」相關聯的軍事、政治意涵。簡言之，和平崛起戰略雖是為對外宣示而提出，但其實際表述的內容卻大大偏重於中國內部的發展需要，迴避對外在國際秩序表達批判或期許。從鄭必堅的演講到溫家寶、胡錦濤提到「和平崛起」的幾次發言，皆將「發展」與「崛起」兩個概念混在一起，幾乎視為是同義。鄭必堅後來受訪時也表示，「和平崛起」就是「和平發展」。¹⁷但是，「和平發展」是中共既有的措辭，「和平崛起」卻是由鄭必堅首創，如果意涵相同，為何要換個說法？¹⁸再者，鄭必堅宣稱中國將走「和平崛起新道路」，所謂新者，應有與過去不同之處；然就其演講觀之，「和平崛起新道路」更像是承繼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並沒有整體戰略上的改變。顯然，和平崛起戰略仍有諸多尚待釐清之處，必須再綜合更多官方、學者的論述及中共的實際作為，才能釐清其中的確切思維。

中共後來將「和平崛起」的官方說辭修改為「和平發展」，正凸顯了上述的問題。關於說辭改變的緣由，有報導稱是因為江澤民派系反對「和平崛起」的提法，甚至暗藏有胡錦濤、江澤民兩派人馬政治角力的意味。¹⁹對於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筆者無從確知，但「崛起」在字面上確實比「發展」更具相對、比較性，有「超越」他國的涵義，容易引起外界的疑慮。如此，本是要降低國際社會「中國威脅論」而提出的「和平崛起」，卻反倒有更加誤導國際視聽之虞。

¹⁶ 「新聞背景：『中國和平崛起論』的誕生和發展」，新華網。

¹⁷ 「鄭必堅：『和平崛起』同『和平發展』是一回事」，新華網，2007年9月21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9/21/content_6765487.htm>
 (瀏覽日期：2012年3月8日)。

¹⁸ 「和平發展」的說辭最早由鄧小平於80年代初提出，核心概念為：和平與發展是國際關係的主題，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沒有外部和平穩定的環境，任何國家都難以全力發展；沒有全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也就沒有持久的世界和平與穩定。中共十四大據此提出政治報告稱：「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十五大報告再明確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這個觀念後為江澤民、胡錦濤繼承，一直見諸於各種官方的宣示文件中。見吳建民，「把握時代特點 走和平發展道路」，*外交評論*(北京)，2005年第5期(總第84期)。

¹⁹ 汪莉娟，「胡江權鬥『和平崛起』路崎嶇」，*聯合報*，2004年9月13日，A13版。

2005 年 12 月及 2011 年 9 月，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分別發表了《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及《中國的和平發展》兩份白皮書，對於中共所走的和平發展道路進行更完整的論述。綜觀兩份白皮書的內容，彼此之間的差異不大，其所言的「和平發展」，實際上也不脫 2003 年至 2004 年間大陸高層提出「和平崛起」的論述架構，只是對於和平發展道路的背景、目標及作法做出更詳盡的補充。²⁰其呈現的要點如下：

(一) 向世界說明中國人民自近代以來受列強壓迫，無數仁人志士乃致力尋求救亡圖強之道，以爭取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富強。中共自建政以來歷經曲折，確認了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終極目標是追求現代化和富民強國，為世界文明的進步做出貢獻。白皮書並特別強調：「這已經上升為中國的國家意志，轉化為國家發展規劃和大政方針，落實在中國發展進程的廣泛實踐中。」

(二) 中國發展的戰略重心主要放在國內，目前正全力主攻經濟戰略的結構性調整，追求在 2020 年達到全面小康社會的發展水平。為了實現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必須繼續提升綜合國力，將對內的改革和對外的開放結合在一起，維護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和平穩定環境。

(三)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積極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及義務，將自身定位為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推動國際社會和平解決爭端。中國捍衛聯合國在世界事務中的核心地位，堅持國際關係民主化，各國內部事務必須由其本國人民參與，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自己也絕不會重蹈「國強必霸」的覆轍。中國將繼續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更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四) 中國目前面臨複雜多樣的傳統和非傳統安全挑戰，受到分裂勢力和恐怖主義等威脅，因此為了捍衛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並保障國家發展利益，中國必須投入更多資源以發展軍隊現代化。中國秉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

²⁰ 見「《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新華網，2011 年 9 月 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6 日);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中國網，2005 年 12 月，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book/1069230.htm>>(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6 日)。

防禦性國防政策，發展軍隊現代化並非和他國進行軍備競賽，而是基於發展屏障的需要。

（五）中國自我定位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認為只要把自己的事辦好，就是對世界負責任最重要的體現。中國並將自己的發展和周邊國家的發展結合在一起，認為區域內各國應共同形成同舟共濟的「亞洲精神」。中國特別強調，這並不是在謀求區域霸權或劃定勢力範圍，而是歡迎各國加入到區域發展的建設，不排擠包括區域外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

從以上幾點可以看出，中共官方在繼續強調中國不爭霸、堅持以和平方式崛起之外，也提出了若干較為強硬的要求：反對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強調社會主義政經制度是中國認為最適合的發展道路；點出當前國際秩序有其不合理的地方，帶有與西方世界搶奪國際秩序話語權的味道；說明中國提升軍力是提供自我發展的需要，並非要破壞國際秩序的穩定；揭示中國和區域國家共存共榮的關係，隱約有從亞洲漸進突破美國霸權領導的意涵。

然而，即便透過這份白皮書，中共就其對國際秩序提出了比以往更為具體的訴求，但當中論及的不少概念，仍舊缺乏明確的定義。比如，所謂「不爭霸」，是不追求霸權主義式的領導風格，還是也不追求國際秩序的領導地位？中共宣稱發展軍力是要保障「國家發展利益」，那麼所謂利益的範圍及內涵又是如何？強調「亞洲精神」，則對美國在亞洲的勢力，中國採取怎樣的態度？

因此，透過對中共官方論述的梳理，雖可歸納出其和平崛起戰略的基本原則，但對其確切的國際秩序觀，仍只能得出若干隱晦的概念。要深究其具體企圖的內容，尚須從更多官方的外交政策宣示和作為，大陸學者的政策建議，以及中外學者的相關研究中尋找答案。

二、從國際秩序的角度觀察中國崛起

冷戰結束之初，西方學界摸索未來的國際秩序，逐漸注意到經濟快速成長的

中國將是冷戰後的新興強國，對區域及全球政治的影響力正日益增強。1992年，美國學者孟儒(Ross H. Munro)在〈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的真正威脅來自中國〉(Awak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一文中更預言，中國會先成為亞洲的區域霸權，並日漸威脅美國的國家利益。²¹90年代中期，中共與菲律賓、日本分別就美濟礁、釣魚台發生領土衝突，此外又與美國共同涉入台海危機，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討論乃更趨向對「中國威脅」的評估。這種討論的視角，即從國際秩序的角度觀察中國崛起，爭辯中國崛起對國際秩序可能帶來的衝擊。2003年中共宣示和平崛起戰略後，西方學界仍延續以此種視角觀察中國。

筆者綜合各家從國際秩序的角度觀察中國崛起的研究，歸納出以下三種類型的評斷：1.認為中國必然威脅國際秩序；2.認為中國不會威脅國際秩序；3.認為中國可能威脅國際秩序，但可避免。必須說明的是，由於國際秩序的話語權長期由西方學界掌握，故依循此種角度做出的各類論述中，其所指涉的「威脅」也無可避免地帶有西方本位思考的價值判斷。

(一) 中國必然威脅國際秩序

關於主張中國必然威脅國際秩序的論述，最鮮明者就是依循權力取向的現實主義所做出的研究。前面提到的孟儒即是典型的例子，他藉由對中國的經濟及軍事能力進行推估，預言中國控制國際秩序的野心也將愈來愈大，最終成為繼蘇聯之後對美國的最大威脅。²²此外，攻勢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也以同樣的取向得出與孟儒相同的結論，認為國際政治即大國政治，大國的生存意志就是將自身權力極大化，追求成為世界唯一的區域霸權。²³對於中國的崛起主要是追求自身經濟發展的說法，米爾斯海默駁稱：中國將與歷史中的新興大國一樣，隨著經濟的成長擴張軍事能力，待能力充足時，便會追求在區域稱霸；中國的崛起將威脅美國作為世界唯一區域霸權的地位，兩國

²¹ Ross H. 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²² Ibid.

²³ See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的爭霸區域就在亞洲，而台灣正是最大的熱點。²⁴

其他則尚有從制度及價值取向思考者，同樣得出中國必然威脅國際秩序的結論。持「民主和平論」者認為，民主國家偏向以和平解決爭端，而非民主國家則容易發起戰爭。無疑地，這種思維雖以歷史事實作為佐證，但明顯帶有濃厚的意識型態偏好。在西方自由派人士及不少流亡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眼裡，中共堅持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專制的代名詞，剝奪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基於這樣的價值判斷，他們認為中共主政下的中國大陸國力愈趨強大，便會愈加肆無忌憚地挑戰國際秩序。²⁵換言之，中國的崛起之所以對國際秩序產生威脅，並非其權力上升的必然結果，而是因為其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使然。此種邏輯基本上可視為是冷戰反共思維的遺緒。

美國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根據其文明衝突論認為中國將威脅國際秩序的主張，則在抽象層次上又高於對政治意識型態的偏好。杭廷頓認為，文明是一套看待宇宙、人生的哲學體系，不同的文明比起不同的政治意識型態更難相互融和。他在冷戰結束之初就預言，文明的衝突將是此後世界最大的不穩定因素，且中國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將結成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死敵，對當前的國際秩序產生強烈威脅。²⁶不過，杭廷頓的論述實際上仍隱含權力取向的思維，其認為中國儒家文明促成東亞經濟整合的說法，便透露出權力仍是對國際秩序產生影響的動力來源。²⁷此種邏輯可被理解為是將文明視為一種輔助物質能力的權力資源，並由此來詮釋「崛起」與「威脅」間的因果關係。

(二) 中國不會威脅國際秩序

和主張中國必然威脅國際秩序的論述一樣，認為中國不會威脅國際秩序者，同樣包含有權力取向及制度、價值取向等不同的研究途徑。其中，依循權力取向

²⁴ John J. Mearsheimer,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06, pp. 160-162.

²⁵ 鈕維敢，「偏見和對立——當代『中國威脅論』透視」，*馬克思主義研究*(北京)，2010年第1期，頁132-138；劉曉波，*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台北：允晨文化，2009)；Minxin Pei, "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6, pp. 32-40.

²⁶ See Samuel P. Huntington, "Clashes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p. 22-49.

²⁷ *Ibid.*, p.28.

認為中國不會威脅國際秩序的研究，其實並非真正反對中國崛起將威脅國際秩序的觀點，而是否定中國的實力正在崛起的事實。美國學者陸伯彬(Robert S. Ross)就認為，中國雖經由軍事現代化大大提升軍事能力，但美國仍在全球權力體系中占據絕對領先的地位，尤其在海權上擁有絕對的優勢。在現實主義對國家行為者基本理性的假設下，陸伯彬認為中國也自知沒有足夠的條件挑戰美國，因此不至於非理性地去破壞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²⁸換言之，中國既無意願、也無能力去威脅國際秩序。

美國前總統卡特(James Earl Carter)執政時期的國家安全助理、著名國際戰略學者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經和米爾斯海默於 2005 年時就中國的威脅進行論辯，其論點同樣是根據中國的實力做判斷，認為中國關注的仍是經濟發展，無心也無力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²⁹2011 年，他在其出版的論著《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中，依舊指出中國在許多現代化水平及綜合國力的人均指標方面，不僅遠遠落後於美國，而且也落後於歐洲及日本。布里辛斯基維持一貫的主張，認為維護和平穩定的外在環境、致力於自身的現代化發展，在未來的幾十年間將持續是中共最關注的核心利益。中共尚未做好取代美國領導位置的準備，並且相信美國地位如迅速衰落，將會引發全球權力動盪的危機，進而損害中國自身的發展前景。³⁰布里辛斯基的看法，和中共官方和平發展的論調基本一致。

美國學者奈伊(Joseph Nye)和貝克利(Michael Beckley)也認為，中國的經濟及軍事能力被過度高估，其國內的現代化建設仍需要至少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完成。此外，他們還將「軟實力」(soft power)納入對綜合國力的判準，認為美國從結構面宰制了全球的制度及價值體系，其政治體制、文化創意、科技研發的素質都在

²⁸ Robert Ross, "Assessing the China Threa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81 (Fall 2005), pp. 81~87.

²⁹ Zbigniew Brzezinski, John J. Mearsheimer,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Policy*, Issue 146 (Jan/Feb 2005), p. 46.

³⁰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洪漫、于卉芹、何衛寧譯，**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頁 83~85。

中國之上，對國際秩序的掌控顯然不是中國所能挑戰的。³¹他們的研究顯然認為中國威脅論是杞人憂天，因為中國的實力並沒有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知的那樣強大。

值得注意的是，布里辛斯基和奈伊雖都認為中國不會對國際秩序造成威脅，但也指出未來幾十年間的國際秩序確實將面臨動盪的危機。布里辛斯基認為，西方對世界的長時間統治確實在不斷減弱，然而新興的亞洲國家也還不及領導世界的條件；而隨著國際結構中的權力同時分散到更多的非國家行為者手上，全球領導階層雖愈趨廣泛，但也愈加地缺乏凝聚力。因此，「到 2025 年後將不是中國而是渾沌。」³²奈伊則除了注意到權力分散，還發現權力的性質正在起變化，軟、硬實力間的轉換變得更為複雜，國際秩序的不穩定因素也隨之升高。³³簡言之，國際秩序面臨的威脅已非傳統所言新興強國取代現有霸權的「權力轉移」，而是全球化下的「權力分散」及「權力轉型」。

美國學者依肯伯里(John Ikenberry)則提供了從制度取向論述中國不會威脅國際秩序的觀點，認為就算中國的實力真的崛起，達到與美國匹敵甚至超越美國的水平，當前的國際秩序仍將可以得到維持。依肯伯里主張，冷戰後的國際秩序實際上是由「主權國家體系」及「自由貿易制度」兩大支柱組成，目前在現實權力結構下由美國主導，而即便美國權力衰退，新興的強權也會繼續支持這套秩序，因為它既維護了各國的繁榮與安定，也能幫助新興強權免於被其它國家聯合制衡。³⁴這種論述明確地將國際秩序中的權力格局及國際制度區分開來，認為中國的崛起可能改變國際秩序的權力格局，但並不會改變國際制度的內容。

還有以價值取向看待中國崛起的英國學者克萊格(Jenny Clegg)，作為一名長

³¹ Joseph S. Nye, "China's Rise Doesn't Mean War," *Foreign Policy*, Jan/Feb 2011, Issue 184, p. 66;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Dec, 2010), pp. 2-12; Michael Beckley,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Issue 3 (Winter 2011/12), pp. 41~78.

³² 見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洪漫、于卉芹、何衛寧譯，**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

³³ 見約瑟夫·奈著，劉華譯，**美國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³⁴ See John G.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3 (May/ June 2011), pp. 56~68.

期反戰的新左派，提出與西方主流意識型態截然不同的論述：直接批判當前西方自由主義主導的國際秩序，才是阻礙人類進步的力量。克萊格指出，崛起中的中國內心有一套全球戰略，即是將當前美國霸權統治的單極世界逐漸推向多極世界，而西方自由主義雖聲稱維護世界的和平穩定及公平正義，最後卻淪為美國霸權主義圖利自身利益的藉口。中國的崛起非但不是威脅，而且還將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反倒是當前被美國單極壟斷的國際秩序，才是世界最大的威脅。³⁵克萊格的觀點，和同樣從價值取向出發、認定中共的極權專制為世界威脅的自由派，恰好是取向相同、立場對立的兩個極端。

（三）中國可能威脅國際秩序，但可避免

在「中國必然威脅國際秩序」及「中國不會威脅國際秩序」這兩個對立的立場之外，尚有一類學者持相對中立的立場，即認為中國可能威脅國際秩序，但其威脅可以避免。70年代為美國打開與中共政權交往大門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2011年出版的《論中國》(*On China*)一書中預言，中國的崛起將使世界權力結構再次「兩極化」，中美關係將進入「新冷戰」，甚至不排除熱戰的可能。準此，季辛吉相信中國的實力將在未來幾十年內與美國分庭抗禮。季辛吉並進一步分析現實的權力結構，認為中美兩國都是大國，大到不能為了對方犧牲本國利益，大到不能讓對方主宰自己，一旦擦槍走火，只能是兩敗俱傷。不過，和米爾斯海默不同，季辛吉仍相信經由精心的外交手段安排，雙方可以一起找到共同利益，並據此從夥伴關係上升到「共同發展」，進而仿歐美「北大西洋共同體」的模式，共建「太平洋共同體」。³⁶也就是說，季辛吉反對國際結構中只容許得了一個區域霸權的攻勢現實主義論點，主張中美兩國仍可在亞洲共建彼此都接受的權力平衡。

英國學派學者巴里·布贊(Barry Buzan)對中國是否威脅國際秩序，則給了相對模糊的答案。他認為中共在面對當前的國際秩序時，既有對現實權力的理性計

³⁵ 見珍妮·克萊格(Jenny Clegg)著，葛雪蕾、洪漫、李莎譯，*中國的全球戰略：走向一個多極世界*(*China's Global Strategy: Toward a Multipolar World*)(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³⁶ See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1).

算，也有純粹對價值的心理認同。因此，在他的眼裡，中共確實自 80 年代起就試圖融入國際社會，與過去如德國、日本、蘇聯這些新興強國相較是和平的；但是，對於西方世界為國際秩序所制定的文明標準，卻又想另外開闢一套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用巴里·布贊的話說，就是一種擺盪於「全球化」與「後殖民」兩套思維之間的國際秩序觀。³⁷在這一點上，巴里·布贊的觀察和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是相近的，只是杭亭頓對於非西方文明國家發展出一套非西化的現代化道路並不樂觀，而巴里·布贊則認為可以透過國際社會化的過程化解激烈的衝撞。

同樣結合現實結構及心理認知做分析，美國學者沃爾伏(William Wohlforth) 聚焦在崛起的中共內心對「地位」的滿足感，認為中共在冷戰結束之初，由於外在環境及自身實力的變化，一度不願承認美國單極霸權的地位，而提出「多極化」的國際秩序觀，追求一個沒有任何國家稱霸的世界。在沃爾伏看來，中共甚至將此種心理落實為競爭性的外交政策，希望將崛起的經濟和軍事能力轉化為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直到 1995~1996 年間爆發台海危機後，中共才體認到要改變美國單極秩序所須付出的代價過高，方逐漸調整為維持現有秩序的策略思維。³⁸沃爾伏的觀點，可以說是採用權力取向的論述，但又將心理認知這一中介因素補充進來。事實上，前面所提及各種權力取向的研究，無論認為中國必然威脅國際秩序抑或持相反立場，皆假設驅使崛起中的中國對國際秩序進行挑戰的動因，乃出自對現實層面的安全或權力本身的需要。而沃爾伏則另外提出了心理層次的需求，主張對地位的滿足感亦是影響一個國家國際秩序觀的因素之一。

三、從中國崛起的角度觀察國際秩序

中國大陸學者多以中國為中心，探討中國在自身權力上升的過程中，對於國際秩序應採取怎樣的作為。總體而言，由於西方學界長期瀰漫中國威脅論及中國

³⁷ 見巴里·布贊，「中國能和平崛起嗎」，收於陳琪、劉丰主編，**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33~69。

³⁸ William Wohlforth, "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Dec 2008), pp. 54~55.

崩潰論的論調，大陸學者在進行研究時，亦經常被動地對這些西方學界的主流思想進行回應。而隨著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愈來愈解放思想，大陸學者雖不至於和官方論調大相逕庭，但在官方宣示的基本原則下，也提出了不少對官方政策戰略及戰術上的批評，進而逐步地對決策者的觀念產生作用。

受文化背景及政治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大陸學者進行論述時，與西方學界著重於權力或制度、價值取向不同，更多地透過近代中國的發展脈絡、傳統中國的哲學觀或中共官方的指導思想來表達。以葉自成和蔣立群合撰的〈新中國國際秩序觀的變遷〉一文來說，通篇即對中共建政以來的國際秩序觀變遷梳理得極為清晰。文中將之分作「改革開放之前」、「改革開放初期」、「90年代以來」三個階段，如歸納起來，大致包含有「排斥與抵抗」、「適應與融入」、「主動提出創見」三種態度。³⁹以下便借用這樣的分析架構，分別探討大陸學者對這三種態度的見解。

（一）排斥與抵抗

秦亞青是大陸著名的建構主義學者，特別擅長從認同層面論述中共對國際秩序的觀感。在他看來，中國與世界秩序的互動關係是一條從抗拒到融入的過程。秦亞青認為，中國原本有自己的「天下觀」，即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稱的「朝貢體系」，用現代國際關係的語言來說，就是中國制定、主導、認同的一套國際秩序。不過，這樣的國際秩序僅適用於中國周邊的區域，當西方帝國主義興起後，產於歐洲的國際體系及國際秩序便隨著船堅砲利擴張到全球。⁴⁰準此，近代中國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中，從排斥到被迫接受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

而自中共建政後，中國又從被迫接受轉為排斥這種國際秩序。起先，中共於建政之初採行「一面倒」的外交戰略，認為世界上同時有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

³⁹ 見葉自成、蔣立群，「新中國國際秩序觀的變遷」，*黨的文獻*(北京)，2011年第6期，頁72~78。

⁴⁰ 秦亞青，*國際體系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頁83~85。另關於費正清的朝貢理論，見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杜繼東譯，*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0)。

秩序及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秩序，宣布中國只認同、遵行社會主義的國際秩序，不承認以往受帝國主義壓迫所簽定的所有國際條約。⁴¹50年代初期，又逐漸對蘇聯主導的國際秩序有所不滿，對西方的國際秩序產生部分認同，故而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尋求調和。⁴²只是在60年代中期爆發文化大革命後，中共在意識型態高度掛帥的政治氛圍下，變成比建政之初的「排斥」更為激烈的「抵抗」，不僅在論述上提出「三個世界」以否定蘇聯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更以實際行為干預周邊國家的內政，企圖建立中共主導的國際秩序。⁴³直到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經過整體且深刻的反思，中共才決定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又要到90世代，才承認「一個世界」的觀念，認同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⁴⁴

對於這樣曲折的國際秩序觀轉變，秦亞青以建構主義的途徑，指出當中的主要變因是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自我身份認同。秦亞青認為，自近代以來，中國在心理上感覺從中心淪落到邊緣，甚至連國際社會的成員都不是，所以產生了一種很深的被剝奪感；當中共建政後，國際社會對中國充滿了懷疑和敵視，傳統的民族文化使中國認為「西方主導的體制無法接受中國這樣的傳統大國。」⁴⁵因此，中國展開了很長一段對國際秩序的反覆思索，直到改革開放後，才確立了自身發

⁴¹ 陶文釗，**中美關係史上卷：1911—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349。

⁴² 見葉自成、蔣立群，「新中國國際秩序觀的變遷」。另關於「和平共處五原則」，乃由周恩來在1953年12月接見印度代表團時首次提出，並在1955年4月萬隆會議上重申，內容大致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處。中共希望藉由「和平共處五原則」在美蘇兩大集團間爭取外交自主性。見「中國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mfa.gov.cn/chn/pds/ziliao/wjs/t8987.htm>〉(瀏覽日期：2012年7月14日)。

⁴³ 見葉自成、蔣立群，「新中國國際秩序觀的變遷」。另關於「三個世界」，乃由毛澤東在1974年2月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時首次提出，此一概念將世界分為三個部份：第一世界是指美國和蘇聯兩個具有最強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在世界範圍內推行霸權主義的超級大國；第二世界是指處於這兩者之間的已開發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第三世界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毛澤東認為，第一世界爭奪霸權地位是世界局勢動蕩的主要根源；第三世界是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主要力量；至於第二世界則具有兩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鬥爭中可以爭取或聯合的力量。見「1974年毛澤東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2/22/content_10839608.htm〉(瀏覽日期：2012年7月14日)。

⁴⁴ 秦亞青，**國際體系與中國外交**，頁83~87。

⁴⁵ 同前註，頁85。

展與外在環境的連繫，找到了自我在國際體系中的定位。

事實上，秦亞青對於中共國際秩序觀變遷的論述，顯然淡化了中共意識型態變化的因素。回顧歷史，20、30年代中國國民黨統治大陸時，中國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態度是相當正面的，因此所謂民族文化導致對西方國際秩序不認同的說法，在理論上其實站不住腳。以中共建政之初的「一邊倒」戰略而言，多數學者認為是出自意識型態及現實生存需要的綜合考量，而後來文革時對美、蘇兩大陣營國際秩序的全面抵抗，就明顯是意識型態主導下的結果。事實上，秦亞青自己也承認，中國自80年代開始接受西方的國際秩序，與中共「解放思想」有直接的關係。⁴⁶這正說明了此前中國對國際秩序的排斥與抵抗，在現實國際權力結構的制約下，主要還是受中共意識型態的影響。

(二) 適應與融入

由於中共「解放思想」，所以才能開始適應與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而也因為「解放思想」的緣故，大陸學者在看待此後中共的國際秩序觀時，幾乎也就較少從中共的意識型態理解，而是多了些西方所慣用的權力或制度、價值取向的詮釋。

在權力取向的詮釋方面，賈慶國提出「順勢」的說法，即認為因為在短時間內，美國的單極霸權地位很難動搖，中共的戰略只能繼續以降低美國敵意為主，而表現在行為上就是適應當前的國際秩序。⁴⁷此外，相對於賈慶國這種比較被動的「適應」說，孫學峰則更坦白地指出新興強國要崛起所必須通過的「合法化」過程，也就是先融入霸權國的國際秩序，再伺機而動改變國際權力結構及制度體系。⁴⁸由此可以得知，不僅西方學界認為中國將隨著實力的上升擴張其改造國際秩序的企圖，大陸學界同樣也期待中共能伴隨自身國力的上升，爭取對世界秩序更深更廣的影響力。

⁴⁶ 同前註，頁 101。

⁴⁷ 見賈慶國，「單極體系與中國崛起」，收於朱雲漢、賈慶國主編，**從國際關係理論看中國崛起**(台北：五南，2007)，頁 3~22。

⁴⁸ 見孫學峰，**中國崛起困境：理論思考與戰略選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70~106。

在制度取向的詮釋方面，信仰自由主義制度的王逸舟則是典型代表，他所提出的「創造性介入」策略，便是先打從心裡認同以自由主義為主軸的國際秩序，確信中國的發展與全球化的自由貿易是相互依存的關係，然後才藉由「搭便車」融入到國際秩序中，進而減低美國霸權主義的勢力。⁴⁹也就是說，王逸舟認為，中國並不須要去改變國際權力格局，而只須要對美國違反自由主義制度的霸權行徑進行制衡；在方式上則應以西方的話語讓國際社會理解中國的立場，並完善自身的政治制度改革，從而增加軟實力，追求在國際事務上「有所作為」的可能。

至於面對西方學界總愛爭辯的所謂中國是「修正主義」抑或「維持現狀」的問題，秦亞青則從中國哲學的角度提出解套的論述。秦亞青指出，中國的哲學觀不同於西方黑格爾辯證法的「非黑即白」，而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的太極思維。準此，中國既融入國際秩序，同時也努力推動國際秩序更為公正，這種在「全球化」與「後殖民」之間擺盪的國際秩序觀並不具有「融入」與「抗拒」這樣的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和諧思想。⁵⁰如此的觀點，為大陸學界因應中國威脅論的論述提升了思想層次。

（三）主動提出創見

除了「排斥與抵抗」及「適應與融入」之外，中共自建政後也曾主動對國際秩序提出自己的創見，如改革開放前就發表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及「三個世界」論述，便是針對國際秩序宣示堅持的底線及期待的願景。到了 90 年代初期，因應冷戰結束造成的國際秩序大洗牌，鄧小平在大時代的轉捩點上提出要追求「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核心概念為反對霸權主義，認為世界秩序的制定須經由更多元參與的民主協商。⁵¹就整體而言，此一主張仍是較為守勢的要求「獨立自主」，且建立在 50 年代「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對於西方設定的秩序

⁴⁹ 見王逸舟，**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新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⁵⁰ 秦亞青，**國際體系與中國外交**，頁 127~181。

⁵¹ 游博，「和平崛起：鄧小平的治國理念」，**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武漢），2005 年 2 月（第 1 期），頁 63~64；「中國對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19/content_696057.htm〉（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7 日）。

框架，並沒有較攻勢的挑戰乃至顛覆。其後江澤民的「和而不同」以及胡錦濤的「和平崛起」與「和諧世界」，也都是同一脈絡的擴展和延伸。不過，中共官方畢竟在字面上用了「國際新秩序」的說法，因此仍透露出其有意改變國際秩序的企圖心。

近年由於發生國際金融海嘯，西方自由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開始受到中外廣泛質疑，大陸輿論界一時間對中國崛起的信心大大提升，對建立「中國模式」的呼聲也強烈起來。其中，大陸國防大學教授、現役解放軍大校劉明福所著的《中國夢》一書便是代表，書中旗幟鮮明地宣稱「中美世紀對決，軍隊有主張」，主張中國要勇敢地和美國爭奪世界秩序的領導地位，包括追求軍事崛起、發展海權力量、與美國一較長短。且除了權力之外，在制度及價值觀方面，劉明福也指出，美國以「霸道」主導世界秩序，不但無法服人，還會為世界帶來災難，因此中國必須發揚傳統的「王道」思想，以仁政令天下順服，爭取成為世界的「冠軍國家」。⁵²此類的想法，雖帶有濃厚的民族情感，不如一般學者所展現的邏輯縝密與條理分明，但卻真實地反映出近代以來中國仁人志士振興中華的熱切心願。尤值得注意的是，劉明福帶有執行國家對外武力的軍人身份，而剛剛上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會主席習近平，也同樣使用「中國夢」一詞宣示中共的奮鬥目標。

和大陸學界頻繁互動的新加坡學者鄭永年，與大陸學者徐牧也同樣主張中國必須更主動地提出中國版本的國際秩序，只是他們並未像劉明福那樣認為要在軍事上與美國爭雄，而是先發展軟實力，改變美國主導國際制度及價值體系的局面。鄭永年認為，中國要真正崛起，必須在知識上扮演一個有力的角色，為世界提供一個知識體系，如同當年的英國首倡古典自由主義一樣。⁵³徐牧則認為，未來的國際秩序將同時是中國模式的崛起與西方模式的衰落，金融海嘯說明西方模式已走到盡頭，中國模式將引領人類文明的未來。⁵⁴兩者同樣主張，此時對中共

⁵² 見劉明福，**中國夢**(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

⁵³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 216~217。

⁵⁴ 見徐牧，**大變局：中國模式的崛起與西方模式的衰落**(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而言，發展經濟及文化實力比擴展軍力更為重要。

總而言之，大陸從官方到學界，皆不同程度地為建立「中國模式」的國際秩序做出嘗試，且主要偏重於對制度、價值層面的論述工作。但是，在目前可見的論述中，皆只是概括性地提出中國傳統「王道」與「霸道」的不同，強調中國的「和諧」思想，及預言西方模式的衰退。至於究竟中國能提出怎樣的「中國模式」，能與目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有何種顯著的不同，則迄今仍缺乏答案。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關於國際關係的研究途徑，存在有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兩大典範，前者認為權力是制約國家行為的最主要因素，後者則更偏重制度及價值對國家行為的影響。透過上一節中的文獻探討，本文發現中外學界在研究中國崛起和國際秩序之間的關係時，幾乎也就是從這兩種典範中擇一作為論述基礎。然而，如認真探究起來，即便是制度、價值取向的研究，前提仍是出自對權力變化的關照，即因為中國的權力確實發生急遽的變化，所以才認為中國對國際秩序的作用有被研究的意義。

準此，本文認為，權力取向的現實主義途徑仍較適合用來理解中國崛起和國際秩序之間的關係。但是，除了中國威脅論的絕對支持者米爾斯海默外，多數研究在探討此問題時，亦不直接將大國的權力上升作為其必然挑戰國際秩序的依據。不論其對於中國將如何影響國際秩序持怎樣的立場，亦不論其採取的是怎樣的分析取向，多數研究在關注中國權力的同時，皆論及中國對自身權力及外在環境的認知，並藉此做出對中國外交戰略的分析。其中，關於中國對內外情勢的觀感，又包含國際權力格局及國際制度兩個方面。

所以，要了解爭取「和平崛起」的中共會對國際秩序做怎樣的因應，固然必須在國際權力結構下理解，但更重要的是深入中國內心的認知。事實上，透過文

獻探討所得出的這個結果，正好也就是本文所認定值得研究的焦點。綜觀現實主義典範下的各種流派，或將權力視為國家追求的終極目標（如古典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或將權力視為國家追求安全的手段（如結構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皆忽略國家對權力的認知才是當中的關鍵。而唯有晚近發展出的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研究途徑，才以「認知」作為「權力結構」和「國家行為」之間的中介，建立起一套新的分析架構。⁵⁵本文有鑒於此，乃決定採用新古典現實主義作為研究途徑，並對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內涵略作介紹如下。

簡言之，「新古典現實主義」是由美國學者羅斯(Gideon Rose)最先提出的名詞，專指在古典現實主義的單元層次理論和結構現實主義的體系結構理論之間尋求一種「中庸模式」的外交政策研究途徑。作為 90 年代以來在現實主義典範中發展出一個新的理論分支，新古典現實主義結合了體系結構與單元層次，在研究外交政策時，既強調國際權力結構的制約，也重視決策者的認知在外交決策中的作用。⁵⁶具體而言，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其它現實主義流派相較，有以下幾點特色：

〈一〉新古典現實主義同意權力是決定國家行為的基礎，但兩者並非等號，亦即權力並不等於外交利益和行動。⁵⁷權力與外交政策行為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傳輸帶，而是以決策者的感覺為媒介，權力結構只有經過決策者的認知才能轉變為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⁵⁸

〈二〉新古典現實主義和結構現實主義一樣，都認為國際權力結構是主導國際關係運作的核心力量。但是，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權力結構的概念，則除了包含客觀的國際權力格局外，也重視各國對權力格局的主觀認知。基本上，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一國如擁有較多能力資源，自有助於其對外行動能力，因此當

⁵⁵ 見李少軍，**國際政治學概論（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37~58；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Oct 1998), pp. 144~172.

⁵⁶ See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⁵⁷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2005 年 12 月)，頁 125。

⁵⁸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p. 147.

一國在國際體系相對權力增加時，該國在國際社會的外交活動及企圖心也會增加。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的目標是設法在國際無政府狀態的不確定環境下，塑造有利於該國利益發展的環境。⁵⁹

〈三〉新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際權力結構不會自動轉化為外交政策行為，必須透過決策者和國內政治的承接傳送。因此，國家內部其實存在多樣的變化與特色，不能單純以掩蓋「黑盒子」的方式處理之。新古典現實主義特別指出，國家權力能否轉化為國際行動力量，尚決定在國內政治結構，特別是在「政府能力」(state power)方面，必須和國家能力(national power)有所區分。⁶⁰

本文採取新古典現實主義途徑進行研究，將在權力取向的現實主義架構下，遵循以上特點，建立本文的研究範圍與架構。

二、研究方法

本文遵循傳統現實主義的研究前提，將「中國」視為是國際體系中單一的行為者，其內部雖有多方勢力參與及影響決策，對外則是獨立的個體。換言之，在國際關係的語境下，本文將國家的概念等同於一群政府及學界菁英的集體。準此，為了解這樣一群人在面對國際秩序時所形成的共同觀念，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並首重大陸官方的文件，包括其所簽訂的國際條約、高層領導人的發言、政府的宣示（如中共會議的文件、發言人的講話、白皮書、新聞稿）等等。再者，亦參考大陸智庫及主要學校、機構的學者的論著，以及大陸幾家有一定影響力、在政治光譜上有其代表性的媒體言論，如人民日報、環球網、南方網、鳳凰網等等。

此外，本文也輔以歷史研究法來補其不足。自 60 年代起，行為主義逐漸取代傳統主義成為國際關係研究方法的主流，其中的弊病，就在於少了歷史、人文的深度與廣度。中國擁有悠久的文化底蘊，其占據唯一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尤

⁵⁹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頁 125。

⁶⁰ 同前註，頁 126。

重視歷史及哲學性的思考，故仍須加入傳統文、史、哲的分析，才能對中國的戰略思維得出足夠深刻的結論。本文將特別留意中國與國際體系間互動的歷史脈絡，關注中共在若干外交事件中的處理態度，並參考歷史學家對中國哲學文化的研究，以期認識中共國際秩序觀之全貌。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一、研究範圍

(一) 時間範圍的界定

中共「和平崛起」的戰略雖是在 2003 年才被正式提出，但透過前面的文獻探討，可知「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乃承自鄧小平思想，甚至包含毛澤東時代便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就國際上而言，一般從 90 年代初冷戰結束後開始關注中國的崛起；而中國大陸學者則在官方提出「和平崛起」後，將中國的崛起追溯到 1978 年改革開放開始之時。⁶¹因此，本文在研究中共和平崛起戰略下的國際秩序觀時，將不限縮於 2003 年以後的時間範圍，而是在論述上顧及和平崛起戰略的歷史發展脈絡，對中共過往的國際秩序觀變遷有所著墨。

當然，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國家的認知乃受其內外環境變化的影響，故中共在和平崛起戰略下的國際秩序觀，也不可能永遠維持不變。自中共十六大起，在 2020 年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就被宣示為是中共的國家戰略目標，這個目標並在十七大、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中得到重申；⁶²而延續美國高盛公司關於中國將於 2027 年在 GDP 方面超過美國的預言，各種對於中國在進入 2020 年後經濟總量將達世界第一的評估也紛紛出爐。⁶³準此，本文將 2020 年視為是中共崛

⁶¹ 姜長斌，「論中國和平崛起與美國國際戰略」，*國際經濟評論*（北京），2005 年第 1 期，頁 15；「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在 2003 年博鰲亞洲論壇的講演」，*新華網*。

⁶²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3】」，*人民網*，2012 年 11 月 18 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3.html>〉（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31 日）。

⁶³ 「經濟學人：中國將在 2019 年超越美國」，*多維新聞*，2010 年 12 月 20 日，〈<http://economics.dwnews.com/news/2010-12-20/57214306.html>〉（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31 日）；「《瞭望》：中國 2020 年全面趕超美國」，*多維新聞*，2011 年 1 月 5 日，〈<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1-01-05/57264171.html>〉（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起另一進程的開始，假定自 2003 年到 2020 年的這段時間，中共的國際秩序觀不會起根本性的變化，並在此基礎上理解、推測中共的外交政策傾向，以提供學界可茲參照的分析架構。

（二）空間範圍的界定

本文的研究主體為中共，意指實際上形塑「中國」此一國際體系中的成員看待國際秩序的觀感的決策者集體。至於對其所處之外在環境，在分析上則區分「世界」及「區域」兩個層次，前者指涉影響力涵蓋整個世界的權力格局及制度，後者則是在地緣上和中國國家利益更為密切的區域秩序。依循現實主義的思維，本文認定大國是影響國際秩序的主要行為者，故在研究中國所處之外在環境時，將重點放在大國及大國主導之國際組織。

（三）概念的界定

1. 「中共」與「中國」

中國目前處於尚未統一的局面，中共政權和中華民國政府在海峽兩岸分治，但雙方都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主權完整未分裂的中國，並在法理上都主張自己在國際社會代表中國、主權涵蓋對方。

本文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在指涉大陸當局時，以「大陸」、「中國大陸」、「中共」、「中共政權」稱之，其中「中共」多指涉國際關係中「政府」的概念，某些地方則專指中國共產黨。此外，中國大陸雖以黨領政，體制上仍區分「黨」和「國家」兩套系統，故本文在提及「國家」系統的官銜時，即稱「大陸」而不稱「中共」（如「大陸國家主席」），以免混淆。

本文所稱的「中國」則指在國際體系中的概念，亦即主權國家體系中的一員，是國際關係中的獨立行為者。目前在國際社會中，主要由中共政權代表「中國」這一國際成員行使外交行為，故本文在研究中國的崛起戰略時，即就中共官方的論述及作為進行分析。

2. 國際秩序

國際關係學者普遍認為，當今的國際秩序建立在兩大支柱之上，一是主權平等的國家體系，一是世界經濟中的自由貿易制度。以上皆形成於歐洲，於戰後逐漸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並隨著全球化成為國際社會的基礎。⁶⁴

然而，此兩大支柱主要是各國在歷史中相互接觸而形成的國際共識，彰顯的是各國對國家互動關係的規則和追求，是一種理想的世界秩序，在現實中並不能夠完全實現。關於現實的世界秩序，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各有不同的詮釋。現實主義者認為，國際關係為無政府狀態，國家之間並不存在具有權威性的國際機構，所謂的秩序就是透過外交手段達成的權力平衡或霸權穩定，即等同於權力結構；自由主義者則主張，可以依靠制度來創造秩序，國際秩序不僅侷限於權力結構，還有制度。而無論是權力結構或是制度，皆是以相對實力為基礎的現實秩序，經過各國的運作，使原先的理想秩序產生某種程度的扭曲與偏離。⁶⁵

準此，本文認為權力結構與制度並非分離的兩種秩序，兩者的關係乃是由前者創建、維護後者，而後者所揭示的制度內容，則完善了無政府狀態下的權力結構，使之得到法理權威的穩定力量。換言之，本文對國際秩序的界定與現實主義的思維相同，即認為國際制度本身也是國際權力結構的產物。不過，為了掌握中共對國際秩序觀的整體觀感，在論述上亦不可忽略中共對國際制度內容的評價與期待，因此本文在研究中共的國際秩序觀時，將先就無政府狀態下決定國際權力結構的「國際權力格局」進行探討，然後再論國際權力結構所主導的「國際制度」，以期從兩方面呈現中共完整的國際秩序觀。

二、研究架構

(一) 研究假設

本文經過相關文獻探討，依循新古典現實主義之研究途徑，對於中共和平崛

⁶⁴ See John G.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⁶⁵ 秦亞青，國際體系與中國外交，頁 49~55。

起下的國際秩序觀研究有以下假設：

1.相信中共對中國大陸之一黨專政能持續保持穩定，其國際秩序觀能直接轉化到中國的外交政策上。影響中國外交的國內因素相對於其它西方式民主國家來得簡單，決策者及學術菁英的認知能直接體現於國家對外的戰略思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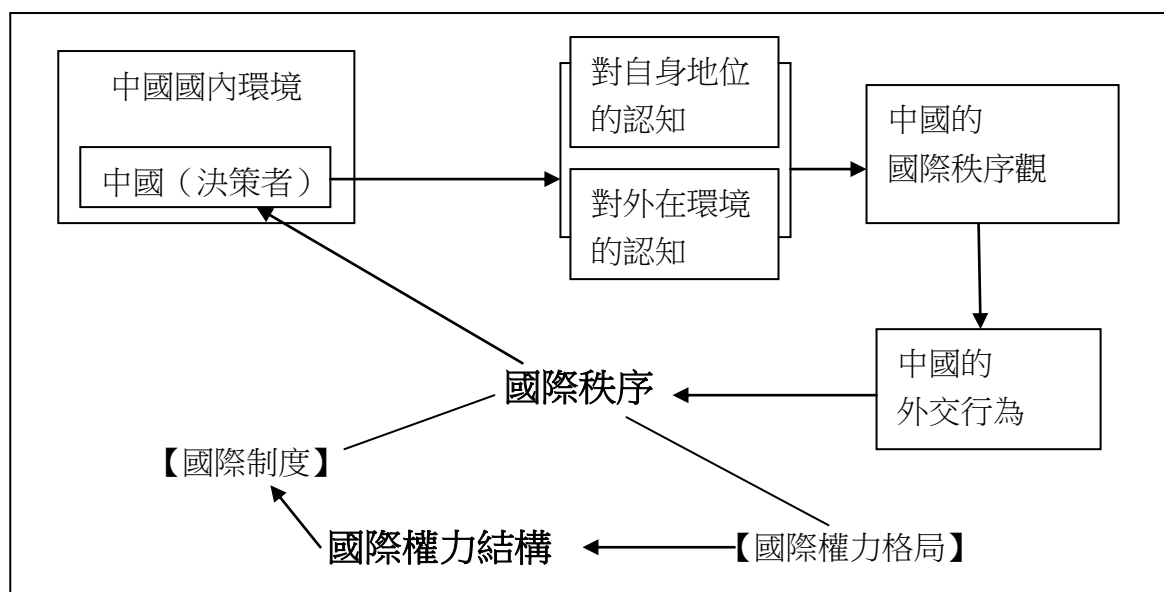
2.中共一直企圖對其國家發展建立一套「大戰略」，其戰略目標的設定皆在幾十年以後，故對於國際秩序亦有一套宏觀的戰略思維，雖曾經國內外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調整，但不至於在短時間內發生劇烈轉變。

3.按照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隨著一國權力地位的提升，其主動影響外在環境的積極度將提高，心中企圖影響的範圍也將擴大。

(二) 分析架構

本文經由文獻分析及歷史研究，探討中共對於中國自身地位及外在環境的認知，並藉此歸納出中共看待國際秩序的觀感；進而再透過中共的國際秩序觀，推測其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對國際秩序可能產生的影響。準此，中共和國際秩序之間呈現的乃是一種互動的關係，國際秩序影響了中共的外交行為，而中共的外交行為也反過來影響國際秩序。下面特以架構圖來說明其中的因果邏輯：

圖 1：分析架構圖



說明：

1. →表示前者對後者是「因→果」關係。
2. 外在的國際秩序和國內的環境決定中國的認知，而中國的認知形塑其國際秩序觀並決定其外交行為，中國的外交行為再反過來對國際秩序產生影響。
3. 國際權力格局決定國際權力結構，國際權力結構再主導國際制度。國際權力格局和國際制度是國際秩序的一體兩面。
4.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三）章節安排

本文共有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先就本文之研究動機及目的進行介紹，再藉由相關文獻之回顧，決定本文之研究方法及途徑，從而擬定本文之研究範圍及架構，完成本文之研究計畫。

第二章則就中共「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進行探討。首先，回顧和平崛起戰略的思想淵源，包含近代以來中國的仁人志士對救亡圖強、復興中華的追求，以及中共幾代領導人對於「和」的思想傳承。之後，再對 2003 年中共官方提出的和平崛起戰略進行分析，了解決策者的整體戰略設計。最後，加入大陸具代表性的幾位學者對和平崛起戰略的批評，以掌握中共對該戰略可能的修正方向。

在了解中共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後，本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便展開對中共在和平崛起戰略下的國際秩序觀的分析。第三章聚焦的是中共對國際權力格局的觀感，包含對自身權力地位和外在權力格局的判斷，對現有權力格局的滿意程度，

以及企圖達成的理想狀態。當中將區分世界和區域兩個層次進行分析，並論及中共內心的觀感所引發的外交策略。

第四章聚焦的是中共對國際制度的觀感，包含其對全球政經制度、區域政經制度及所謂「普世價值」的看法。為與第三章進行區隔，本章將重點放在國際制度的內容，對主導國際制度的權力結構不做過多探討。與第三章一樣，本章在分析時分為世界和區域兩個層次，並同樣會論及中共對國際制度內容的應對策略。

第五章則綜合前面的研究成果，點出中共和平崛起戰略的目標及侷限。在中共官方對外宣示的戰略構想中，雖也提出若干中共「和平崛起」的戰略目標，但仍多語帶保留，尤其迴避對外在環境的企圖。因此，經過對其國際秩序觀的分析後，本章將判斷中共真心認定的「和平崛起」應達到那些目標，以及達到這些目標所可能面臨的國內外侷限因素。

第六章為結論，將綜合上述各章所曾探討及分析的內容，總結出本文的研究發現與建議。

第二章 中共「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

自 90 年代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學界便高度關注中國的崛起，但中共官方卻一直避談「崛起」的字眼，直到 2003 年才向世界提出自身的「和平崛起」。這樣的宣示，除首度承認中國國力確實在急遽增長外，也說明中共正企圖研擬一套戰略構想，當中既有濃厚的對外宣示的意味，同時也包含對內凝聚方向的作用。

——本章就中共官方宣示的「和平崛起」戰略構想進行梳理，以掌握中共提出和平崛起戰略的背景、內容及目的。事實上，「和平崛起」的說辭雖是在 2003 年被首度提出，然其概念並非無中生有，而是有其歷史的傳承。因此，本章首先回顧和平崛起的思想淵源，包含近代以來中國仁人志士對救亡圖強的盼望，以及中共幾代領導人對「和」的思想論述。然後，再聚焦於以胡錦濤為首的提出和平崛起戰略的決策者，深究他們的戰略構想，以及 2003 年後官方論述的延續。最後，則歸納大陸學術菁英中具代表性人物對和平崛起戰略的批評，以找出值得進一步探究的關於深層思維的問題。

第一節 「和平崛起」戰略的思想淵源

一、近代中國救亡圖強的盼望

2012 年 11 月 29 日，甫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兩週的習近平，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的展場上，做出了這樣一段講話：「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¹多數觀察家認為，這是習近平的一種就職宣示，而「中國夢」一詞的提出，也

¹「習近平：承前啟後 繼往開來 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奮勇前進」，新華網，2012 年 11 月 2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29/c_113852724.htm〉（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4 日）。

讓各界不免揣測，習近平掌政後的中國，是否會更加強勢地爭取對國際秩序的影響，以滿足自身民族發展的需要。

事實上，在中共官方關於國家發展目標的論述中，除了「發展」、「現代化」等西方語境下的說辭外，尚有早年經常使用的「振興中華」，以及晚近在各種場合反覆提及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²顯然，無論是「振興」還是「復興」，其概念都緊扣著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的大時代，和習近平所稱的「中國夢」一樣，必須從近代中國的歷史中理解。因此，要掌握中共的國家戰略思維，便免不了得先從歷史的脈絡中探尋。

美國學者安德森(Eric C. Anderson)和中國大陸學者秦亞青在對於中共崛起戰略的研究中，皆參考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論著，先就中國在19世紀中葉以前所處的國際關係進行探討。在他們看來，那時的中國並未與西方的國際體系接觸，而是自己在東亞發展出一套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也就是所謂的「朝貢體系」。在這種體系下，中國以貿易權交換「外夷」對其「支配地位」的承認，以及對中國主導的制度與價值觀的認同。³安德森認為，此種傳統賦予中國領導人一種「歷史決定的抱負」，這種抱負的內涵便是要「居天地之中」，亦即在一定區域內取得支配的地位。⁴必須注意的是，這種支配地位並不同於西方帝國主義式的軍事掠奪及經濟剝削，而是在區域中顯示「優越性」並獲得相應的尊重。⁵準此，當19世紀中葉後中國屢遭帝國主義侵略，致使國際地位

² 「振興中華」最早由孫中山於1894年成立興中會時提出，後一直被中國的領導人所沿用，見李文海，「『振興中華』口號的由來」，[中華文史網](http://www.qinghistory.cn/magazinefree/html/31/200/content/228.shtml)，〈<http://www.qinghistory.cn/magazinefree/html/31/200/content/228.shtml>〉(瀏覽日期：2013年1月2日)。至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則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報告中首次被提出，並從此比「振興中華」更常見於中共官方的論述，見「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4/29/content_1447509.htm)，2004年4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4/29/content_1447509.htm〉(瀏覽日期：2013年1月2日)。

³ 埃里克·安德森(Eric C. Anderson)著，葛雪蕾、洪漫、李莎譯，*中國預言：2020年及以後的中央王國(China Restored: The Middle Kingdom Looks to 2020 and Beyond)* (北京：新華出版社，2011)，頁1~6；秦亞青，*國際體系與中國外交*，頁83~85。

⁴ 埃里克·安德森(Eric C. Anderson)著，葛雪蕾、洪漫、李莎譯，*中國預言：2020年及以後的中央王國(China Restored: The Middle Kingdom Looks to 2020 and Beyond)*，頁3。

⁵ 同上註，頁4。

一落千丈，中國的知識分子內心自然會產生強烈的被剝奪感，從而激發出救亡圖強的熱切盼望。

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認為，從 1890 年代到 1980 年代這段期間，中國大半的時間都遭受著內部的分崩離析及外國勢力的攻擊，幾代的知識分子皆在探尋振興中華的救國道路。⁶他們心裡所盼望的，不僅是要「救亡」，而且還要「圖強」。梁啟超在清末呼籲變法時，便疾呼「中國無可亡之理，而有必強之道」，⁷他並認為中國人有高超的文化傳統，「中國人於來世紀必為世界上最有力之人種，此非吾夸誕之言也。」⁸孫中山更直言，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目的，即「欲使中國為世界最強之國、最富之國、又政治最良之國」。⁹孫中山期許，中國能效法日本那樣學習外國的長處，恢復過去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獨強」的地位，但在強大以後，則不可如日本加入帝國主義的行列，而是濟弱扶傾，維護世界的和平與正義。¹⁰

之後中國共產黨成立，經歷與中國國民黨的幾次分合，最終在 1949 年成功取得對中國大陸的執政權。事實上，中共革命推翻國民黨政權的論述，同樣是為了要救亡圖強，建立一個「光明、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以有別於國民黨統治下「半殖民半封建的、分裂的、貧窮的中國」。¹¹而自中共建政後，各種追求「強國」的論述被不斷地提出來，同時也開始出現「現代化」的說法。1964 年 12 月，周恩來在大陸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提出，在 20 世紀內將中國建設成一個具有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和現代化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¹²約自 1980 年代初期後，進入

⁶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台北：時報出版，2007)，頁 16~20。

⁷ 梁啟超，「論中國之將強」，收於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一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99~101。

⁸ 梁啟超，「論中國人種之將來」，收於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二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259~262。其中所稱之「來世紀」指的是二十世紀。

⁹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三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頁 196~198。

¹⁰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一冊*，頁 45~54。

¹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 1025~1028。

¹² 陳述，「『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提出」，*中國網*，

到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則開始不再將「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強國」連在一起論述，而是轉趨強調「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以及「三步走」的發展目標。¹³中共關於國家戰略的說辭，從著重「強大」改為較保守、帶有量化意涵的「發展」。

1997年鄧小平逝世後，江澤民在對中共十五大的報告中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種較為強勢的宣示重新出現於官方的主旋律。¹⁴到了2002年，江澤民又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宣示「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強國」二字再次浮現於中共文告中。¹⁵隨著中國國力的持續增長，終於在2003年，由胡錦濤提出了「和平崛起」，並一直持續到習近平時代，以充滿濃烈情懷的「中國夢」一詞來抒發幾代中國人對救亡圖強的熱切盼望。

綜上所述，近代中國救亡圖強的夢想，無疑是中共和平崛起戰略的重要思想淵源。而值得思考的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至聯合國成立的這段時間，以及後來1971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森與中共重啟接觸的時候，美國都曾在表面上承認中國的超強地位。¹⁶然而，中國的領導人及知識分子顯然並不認為，中國確實達

〈http://big5.china.com.cn/news/60years/2009-09/25/content_18603838.htm〉(瀏覽日期：2013年1月13日)。

¹³ 鄧小平時期中共此種論述的變化，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1~4；「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通過)」，**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5/65448/6415129.html>〉(瀏覽日期：2013年1月7日)。其中鄧小平所提出關於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發展目標，則是第一步先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準；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見「『三步走』戰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56/64157/4509545.html>〉(瀏覽日期：2013年1月7日)。

¹⁴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

¹⁵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江澤明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534。

¹⁶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以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所代表的中國在美國主導下，參與開羅會議及聯合國的組建過程，與英、美、蘇平起平坐，當時中外官方文件即以「四強」(the four powers)稱之，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第三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之後中國因國共內戰而導致兩岸分治，美國直到1971年才和實質控制大陸的中共政權接觸，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森(Richard Nixon)稱中國將可能是未來最強的國家，中美兩大「超級強國」(these two great superpowers)必須協商，見Richard Nixon,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1971年4月4日，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3100&st=china&st1>〉(瀏覽日期：2013年1月7日)。

到了他們心中「強國」的地位。究竟中國滿意的強大程度為何？關於此問題的解答，尚須經由本文第三、四章對中國國際秩序觀的研究方能知曉。

二、中共幾代領導人對「和」的思想論述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表演上，幾十名表演者共同向全世界觀眾排出了一個「和」字，大陸官方媒體稱，這正是向全世界傳達出中國人從古到今的人生觀和世界觀。¹⁷事實上，就在三年前，胡錦濤才在聯合國成立六十週年的各國領袖高峰會上提出「和諧世界」；¹⁸而在更早的五年前，中共官方首次向世界宣示了「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準確地說，「和平崛起」四個字同時就蘊含有「和平」與「崛起」兩個概念，而前面既已對「崛起」的思想淵源做過探究，下面便再就「和平」的思想演化進行追溯。

回顧中共黨史，從中共建政以來幾代領導人提出的重要思想觀之，可以發現當中對「和」的論述有其傳承及引申。基本上，多數學者在談及中國的和平崛起時，皆傾向於將其起始點推回改革開放開始之時，因此也就很自然地提到鄧小平在當時所提出對世界主題已由「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的論斷。但是，如要再精確地掌握「和平與發展」的思想基礎，則又不得不了解更早之前由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所謂「和平共處五原則」，乃是周恩來在1953年12月接見印度代表團時首次提出，並在1955年4月萬隆會議上重申的外交戰略原則，內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處」。¹⁹一般認為，「和平共處五原則」的提出主要是因應史達林去世後中、蘇共關係產生裂痕，以及朝鮮半島停戰談判出現突破，使得中共決定主動提出倡議以更廣泛地團結區域內的各民族國家，調整建政之初「一面倒」

¹⁷ 「奧運開幕式：『和』字裡的大智慧」，人民網，2008年8月10日，
〈<http://www.022net.com/2008/8-10/463028202913896.html>〉(瀏覽日期：2013年1月7日)。

¹⁸ 「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全文)」，新華網，2005年9月1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6/content_3496858.htm〉(瀏覽日期：2013年1月7日)。

¹⁹ 「中國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靠向蘇聯的外交戰略，嘗試在美、蘇兩大陣營外走出一條自己的路。²⁰以國際秩序觀的角度來說，這顯示了中共逐漸對蘇聯主導的國際秩序有所不滿，並對西方的國際秩序產生部分認同。而後到了文革期間，毛澤東又提出了「三個世界」戰略，但同時也與美國開始接觸，走上聯美反蘇的路線。

可以說，到此為止，雖然中共提出過「和平共處五原則」，企圖在美、蘇兩大集團間爭取外交自主性，但實質上仍不脫「聯合」的外交思想，也就是傳統拉幫結派的外交策略。然而，「和平共處五原則」卻為後來鄧小平提出的獨立自主外交提供了論述基礎。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並據此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鄧小平提出了世界主題已由「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的論斷，以及中共外交必須走「真正的不結盟」的原則。²¹簡而言之，鄧小平認為中共過去的戰略，是「立足於早打、立足於大打、立足於明天就打」，建立在世界大戰隨時可能發生的假設上；但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後，中共不應再以這種極端的鬥爭思維看待國際形勢，而必須轉而注意到二戰以來國家間的經濟互賴及發展不均才是核心問題。²²此一核心問題既需要和平穩定的世界環境才能解決，其本身同時也決定了世界能否維持和平，因此，世界的主題應該是「和平與發展」。顯然，鄧小平會提出這樣的新認識，和「改革開放」此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有密切的關聯。換言之，中共在此一時期在外交戰略上發生重大改變，主要乃出自於國內政治的因素，受國際局勢變化的影響並不顯著。

在建立這樣的認識後，鄧小平進而延續「和平共處五原則」的獨立自主精神，宣示了「真正的不結盟」的原則，亦即「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充滿強烈的反對霸權主義的精神。²³此後到 1989 年至 1991 年間，中國自身經歷天安門事件的政治風波，國際上則陸續有東歐劇變及

²⁰ 劉楊鉞，「從『三個世界』到『和諧世界』」，*理論觀察*(黑龍江)，2007 年第 4 期，頁 44。

²¹ 同前註。

²² 秦亞青，*國際體系與中國外交*，頁 129。

²³ 劉楊鉞，「從『三個世界』到『和諧世界』」，頁 44。

蘇聯解體的震盪，面臨如此國內外的變局，鄧小平又提出具有高度哲理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²⁴以上這段被簡稱為「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和「和平共處五原則」及「和平與發展」一起形成 90 年代以來中共外交的最高指導原則，同時也成為後來「和平崛起」的重要思想淵源。

江澤民及胡錦濤即繼承了這種「和」的外交戰略思維，並在各自所處的環境下為之賦予更廣、更深的涵義。關於江澤民對「和」的思想闡釋，其提出的「和而不同」便是代表。90 年代冷戰結束之初，西方開始盛行中國威脅論的論調，除了從傳統權力格局的角度呼籲圍堵中國者，更有文明衝突論出現，給予了西方自由派鼓吹將西方價值觀擴張到全球的理論基礎。面臨此種比傳統軍事遏制更具戰略高度的「和平演變」，江澤民於 1993 年會見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William Clinton)時即指出：「各國人民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應該受到尊重……各國之間，各種文化之間可以相互交流、取長補短，共享人類文明的成果。」²⁵之後自 2002 年起，江澤民開始用中國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來說明上述的宣示，亦即將「和」解釋為各種不同乃至對立的東西構成的統一體，彼此之間在保持主體性的同時相互補充、協調，從而形成新的狀態；至於「同」則意指完全沒有不同的因素，純粹是相同事物的簡單相加。²⁶簡言之，就是說明世界的和平應立足於不同文明的協調發展，必須是求同存異而非定於一尊。

胡錦濤時代延續上述鄧小平及江澤民對於「和」的論調，官方宣示的內容與前人並無太大差異，但在說辭上則更具強勢及對外性，2003 年首度提出「和平崛起」後，於 2005 年在聯合國又有「和諧世界」的宣示。可以說，「和諧世界」的內涵其實就是江澤民時代就提過的「和而不同」，但在姿態上則更具有對國際

²⁴ 「冷靜觀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2/1028/c350803-19412863.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1 月 7 日)。

²⁵ 徐世強，「中國和平形象的構建：和平共處 和而不同 和平崛起 和平發展」，**社會科學論壇(學術研究卷)**(石家莊)，2008 年第 10 期，頁 48。

²⁶ 黎紅雷，「和諧哲學：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哲學基礎」，**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07 年第 6 期，頁 37~43。

秩序提出倡議的主動意味。²⁷因此，雖然胡錦濤主政下的中共官方有意將「和平崛起」等同於較為內向性的「和平發展」，但也可看出中共仍企圖對外在的國際秩序「有所作為」。

綜觀來看，中共幾代領導人對「和」的思想論述是一脈相承的，其源頭來自於周恩來首提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主幹則是鄧小平以「和平與發展」為前提所建立的獨立自主外交戰略。究其背後的深層思想底蘊，則同時包含中國傳統思想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哲學，兩者經過交揉後，形成三組既矛盾又相契的關係：

「內部與外部」、「和平與鬥爭」、「同與不同」。就「內部與外部」而言，中共自改革開放後就始終強調其國家發展戰略是內外一體的，亦即為了自身的發展需要，必須致力維護外部和平穩定的環境；而當中國逐漸地崛起，同時也是為世界提供一份和平穩定的力量。²⁸而所謂「和平與鬥爭」的關係，則是馬克思主義藉由鬥爭以求和平的理論邏輯，認為圍繞著中國的崛起，必然有正義與非正義、既得利益與新興力量間的鬥爭。²⁹可以說，中共官方有意淡化、隱藏這樣的潛在思維，但其仍可見於中共反霸及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張。值得注意的是，鬥爭不見得透過戰爭來表現，因為戰爭已是鬥爭的最高形式。以儒家思想來詮釋，即是「文事與武備」間相輔相成的關係，在求和的同時保有武力鬥爭的準備，但又避免使「武備」激化為「黷武」，所以要「亢龍有悔」，以避免「龍戰於野，其血玄黃」。³⁰最後，因為有此種中國傳統太極的觀念，所以能超脫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使其論述達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的境界，將「和諧」定義為各種「同與不同」的事物的和平共處。

因此，中共所謂的「和」並非不作為，而是帶有對霸權壟斷國際秩序的反抗。

²⁷ 胡錦濤所提「和諧世界」的核心內容，即中國主張國際關係應在政治上堅持多邊主義及共同安全，在經濟上實現互利合作與共同繁榮，在文化上倡導包容精神及文明的多樣性。見劉楊鉞，「從『三個世界』到『和諧世界』」；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 60 周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全文)，新華網。

²⁸ 秦亞青，*國際體系與中國外交*，頁 131~133。

²⁹ 王兵、張光成、石紅聚，「文事與武備——中國和平崛起的內在辯證關係」，*社會科學論壇（學術研究卷）*（石家莊），2007 年第 12 期，頁 34。

³⁰ 同前註，頁 33~37。

事實上，中共關於「和」的論述便幾乎是建立在「反」的基礎上，雖提出了其反對的概念，但對於自身要建立的秩序則仍比較抽象地表達。以中國傳統思想來說，所謂的「和而不同」亦建立在等級次序分明的禮教制度上，但中共關於「和」的論述卻迴避了由誰主導國際秩序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正是中外諸多研究中國崛起的人士最為關切的。

第二節 決策者對「和平崛起」戰略的設計

一、中共提出「和平崛起」的背景

2003年，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向世界正式宣示了「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為深入了解中共決策者對「和平崛起」戰略的設計，首先必須對該戰略被提出的背景有所掌握。按照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國際情勢仍是決定一國外交行為的結構性因素，然而該國之決策者對國際情勢的認知，則起到了中介的關鍵作用。新古典現實主義相信，決策者所處的國內政治環境將影響其對國際情勢的認知。因此，以下便就2003年提出「和平崛起」戰略的決策者——亦即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做一番探究。

（一）國際情勢

先就國際情勢而言，當時冷戰已結束十餘年，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沒有任何單一國家的實力足以與之分庭抗禮，且各國亦未如權力平衡論所言組成反美聯盟，或僅以「軟制衡」(soft balancing)對付之。³¹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加深了各國間的互賴關係，各國順應時代變遷不再受限於冷戰時期「黨同伐異」的兩極體系，轉而更關注自身內部的國內事務，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從「革命與戰爭」轉移到「和平與發展」的主題。進入到後冷戰時期的世界，國際權力結構雖仍是決定國際關係的宰制因素，但「權力分散」(the diffusion of power)及權力性質的轉變已然超越了傳統的軍事同盟對抗。「權力」變得愈來愈難衡量，其指標、內

³¹ 關於後冷戰時期各國對美「軟制衡」的理論，見 T.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71.

涵愈來愈多元化；而各種軍事技術、武器裝備（包含核武）也更加容易跨國界散播，並落入許多政府失靈的開發中國家內部的非政府好戰團體、恐怖組織手中。

³²基於這樣的情勢，非傳統安全問題乃為之叢生，各國非經由國際合作無法解決，遂更加倚賴各種國際制度來安排國際關係。然而，必須注意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仍占據國際制度的主導地位，在中國及其它開發中國家看來，這樣的國際制度體系充滿著許多不公義處須要改革。

再就世界超強的美國之對華政策觀之，柯林頓政府雖於 1997 年宣布與中共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但美國許多學者仍主張中國是美國最主要的威脅，中美終將發生衝突。³³2000 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就任美國總統後，便開始調整外交政策，更大地將重心放在維持美國的軍事優勢，以此捍衛美國的價值觀在國際關係中的主導地位。配合這樣的思維，小布希對中共的定位從「建設性戰略夥伴」改變成「戰略競爭對手」(strategic competitor)，企圖在東亞以軍事圍堵中國。³⁴不過，隨著 2001 年「911 事件」無預警地爆發，美國的國家戰略遭受重大衝擊，小布希乃決定以多邊主義的方式，與盟邦及其它國家合作進行反恐戰爭，而中共也因此和美國找到了共享利益，雙方建立起一定的戰略互信。³⁵2003 年，美國聲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以此為藉口對伊拉克發動攻擊，此種未經聯合國安理會同意的片面強勢行為引發法、德等歐陸國家的不滿，西方陣營內部產生裂痕，而中共則在國際法理及道德上與歐陸國家站在一起。

此時期的美國為反恐的需要，其「中國威脅論」暫時偃旗息鼓，雖仍持續在東亞對中共進行軍事圍堵，但其注意力也因中東有戰事而有所分散。中共乃趁這

³² Barry R. Posen, "Emerging Multipolarity: Why Should We Care?,"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2009, p. 351.

³³ 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0), p. 199; Richard Bernstein &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pp. 3~21.

³⁴ 吳安家，「論小布希政府的對華政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3 卷第 3 期(2002)，頁 140~143。

³⁵ 趙建民、胡志嘉，「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和諧世界觀』：理論與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0 卷第 1 期(2009)，頁 5。

一階段在東亞站穩腳跟，逐漸地擴展影響力，並更為主動地提出論述來回應「中國威脅論」，以求爭取西方陣營中反對美國霸權行徑的力量，營造對華友善的國際環境。

（二）國內政治環境

中國大陸快速的經濟發展，給予了中共第四代領導人提出更具主動性的外交戰略與國際秩序觀的動力。自改革開放到 2003 年中共提出「和平崛起」之間，中國大陸的經濟產量成長了數十倍，其平均經濟成長率高達 9.3%，名列世界各國之首。³⁶而在足以表現一國參與國際分工之深度的對外貿易總額方面，更從改革開放之初的 206.4 億美元上升到 2003 年的 8509.9 億美元，且在此後仍不斷上升。關於 1978 年至 2003 年間中國大陸的 GDP 及對外貿易總額，詳見表 2-1：



³⁶ 門洪華編，**中國：大國崛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頁 10。

表 2-1：中國大陸 GDP 及對外貿易總額(1978~2003 年)

年份	GDP(億人民幣)	對外貿易總額(億美元)
1978	3624.1	206.4
1979	4038.2	381.4
1980	4517.8	381.4
1981	4862.4	
1982	5294.7	
1983	5934.5	
1984	7171	
1985	8964.4	696
1986	10202.2	738.5
1987	11962.5	826.5
1988	14928.3	1027.9
1989	16909.2	1116.8
1990	18547.9	1154.4
1991	21617.8	1357
1992	26638.1	1957
1993	34634.4	1655.3
1994	46759.4	2366.2
1995	58478.1	2808.6
1996	67884.6	2898.8
1997	74462.6	3251.6
1998	78345.2	3239.5
1999	82067.5	3606.3
2000	89468.1	4742.9
2001	97314.8	5096.5
2002	105172.3	6207.7
2003	117390.2	8509.9

資料來源：

筆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出版的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整理製表。

(網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查無 1981~1984 年的對外貿易總額。

而從 2003 年到 2012 年，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持續增長。這段時間正是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執政時期，同時也是中共提出「和平崛起」戰略後

的時代。關於 2004 年到 2011 年間中國大陸的 GDP 及對外貿易總額，詳見表 2-2：

表 2-2：中國大陸 GDP 及對外貿易總額(2003~2012 年)

年份	GDP(億人民幣)	對外貿易總額(億美元)
2004	136875.9	11545.5
2005	183084.8	14219.1
2006	210871.0	17604.0
2007	249529.9	21737.3
2008	300670.0	25632.6
2009	340506.9	22075.4
2010	401202.0	29740.0
2011	472881.6	36418.6

資料來源：

筆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出版的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整理製表。

(網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事實上，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增長，中共對自身在國際社會的定位也開始轉變。改革開放以前，中共基本上認為自己是具有革命性的體制外國家，以抗拒甚至衝撞的態度來面對國際秩序。改革開放以來，雖逐步適應、融入到國際社會中，但對於全球化的趨勢，直到 90 年代都還存在極大的爭辯。³⁷2001 年底，中國大陸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此後並一直維持穩定升高的對外貿易總額，使 90 年代中期開始提出的「做國際社會的負責任大國」得到深化。³⁸以胡錦濤為首的第四代領導人繼承中共官方這樣的思路，得以更堅定、自信地面對國際秩序，提出與國際社會共同成長、進步的「和平崛起」發展道路。

此外，自中共改革開放「解放思想」以來，意識型態對其外交戰略的影響大大降低，中共從「革命外交」逐漸轉為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國益外交」。由於「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已被丟棄，中國大陸決策者及相關學者對國家利

³⁷ 珍妮·克萊格(Jenny Clegg)著，葛雪蕾、洪漫、李莎譯，**中國的全球戰略：走向一個多極世界**(*China's Global Strategy: Toward a Multipolar World*) (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頁 76~82。

³⁸ 邱坤玄、黃鴻博，「中國的負責任大國身份建構與外交實踐：以參與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53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73~74。

益的認知，不再像過去帶有階級性的思維，而是更近於以民族國家為核心思考的民族發展利益。³⁹延續鄧小平對世界主題為「和平與發展」的判斷，安全問題也不再如過去幾乎主宰中共的外交決策，獲取經濟利益的大小成為衡量對外政策合理性的主要標準。⁴⁰這種對國家利益的強調及判斷，給予了「和平崛起」戰略立論基礎，以此合理化中國以和平方式追求崛起的抉擇。

2003年中共提出「和平崛起」戰略時，以胡錦濤為首的第四代領導人才剛在2002年舉行的中共十六大後接班。第四代領導人幾乎都是技術官僚出身，基本上沒有革命建政的經驗，但卻是改革開放政策的主要執行者，這樣的背景使他們在看待外交問題時有比較強烈的務實世界觀。⁴¹因應中國大陸綜合實力的上升，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也大大提高，這種心態體現於對適應於中國實力的國際地位的追求，從而對甫上任的第四代領導人產生壓力。⁴²在傳統的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已然淡化的中國大陸，愛國民族主義成為中共最主要的執政正當性來源。因此，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必須積極向國際社會表達更為主動的企圖，以回應、滿足人民對國際地位格外敏感的心理。

最後，則是按照中共傳統，中共每一代領導人都必須提出一套其專屬的思想論述來鞏固權力基礎，以期路線政策的正當化。由於對外政策在中共內部的爭議性相對較少，要達成共識的阻礙相對較少，因此剛剛上任的第四代領導人便選擇由此建立論述。⁴³後來雖傳出江澤民派系對「和平崛起」的提法表示反對，因而官方在說辭上又修改為「和平發展」，但「和平崛起」仍被學者廣泛使用，且已成為胡錦濤時代的標誌。2005年胡錦濤又提出「和諧世界」，其內涵不僅延續「和平崛起」的論調，而且雖然在說辭上看似比「崛起」含蓄，但實質的內涵則從自身的發展擴及到對世界的關照，更為具體地提出中國對國際秩序的期望。

³⁹ 秦亞青，「國家身份、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三種假設」，*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3年第1期，頁11。

⁴⁰ 見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⁴¹ 趙建民、許志嘉，「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和諧世界觀』：理論與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0卷第1期(2009年1月)，頁1~2。

⁴² 同前註，頁6。

⁴³ 同前註，頁6~7。

總體而言，「和平崛起」戰略的提出帶有頗重的功能性色彩，既是回應國際盛行的中國威脅論，同時也是領導人滿足人民期待、確立在中共黨內權力地位的工具。而此工具所承載的內涵，則實際上乃繼承中共前人的思想而來，只是冠以「和平崛起」之名，以表現一種更主動的政治姿態。

二、論述內涵及作為規畫

在前面所述的國內外環境下，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形塑了其「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以 2003 年正式提出「和平崛起」為起點，經 2004 年在說辭上改稱「和平發展」，2005 年提出「和諧世界觀」，再到 2005 年 12 月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及 2011 年 9 月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兩份白皮書，一系列的官方宣示其實皆在闡述同樣的一套戰略內涵，只是在主動性及外向性上有深有淺而已。因此，決策者關於「和平崛起」戰略的論述內涵及作為規畫，也就表現在這段期間的各種官方講話及文書之中。其中，鄭必堅的角色尤須注意，他作為公開提出「和平崛起」說辭的第一人，其對於「和平崛起」戰略的論述並不只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帶有濃厚的官方代表意涵。據悉，中共官方啟動「和平崛起」論述計畫的直接影響因素，便是因為鄭必堅在 2002 年訪問美國諸多政要後，發現「中國威脅論」已瀰漫美國政、學界，遂將此情況報告中共中央，促使剛上任的胡錦濤授命由鄭必堅領導理論小組全力建構一套新的國家戰略論述，並以 200 萬人民幣特別資助此項計畫。⁴⁴準此，鄭必堅對於「和平崛起」戰略的闡釋，實際上可以視為是一種官方論述的體現。

（一）論述內涵

關於中共和平崛起戰略的論述內涵，首先在其論述的方式上，便有著深厚的戰略考量。鄭必堅稱，「和平崛起」是一種超越中國威脅論及中國崩潰論的思維，⁴⁵簡言之，就是展現出一套與西方傳統思維截然不同的世界觀。然而，為了能與

⁴⁴ 魯世山，「中國和平崛起理論研究綜述」，*理論建設*(合肥)，2006 年第 2 期，頁 40。

⁴⁵ 文正仁著，李春福譯，*中國崛起大戰略——與中國知識精英的深層對話*，頁 2~12。

西方世界在同一語境下對話，中共實際上使用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語言來建立和平崛起戰略的論述。整體而言，和平崛起戰略的論述偏向以理想主義色彩濃重的論調來反駁傳統現實主義所提之「安全困境」、「能力決定論」等對國際關係的悲觀判斷，強調中共自身對國際關係的認知會影響其外交行為。此種邏輯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亦即一國之外交行為雖受國際權力結構的宰制，但仍須經由一國之認知為中介方能轉化，基本上是一致的。

只不過，中共為了更有力地駁斥新興強國必然挑戰既有霸權的「霸權興衰論」，並且說服國際社會中國可以走出一條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和平崛起」道路，乃借用了大量的自由主義語言，強調在經濟全球化的年代，中國只有利用各國間互賴的關係創造「共同利益」，才能夠同時完成自身的崛起。此外，中共也引用晚近於西方興起的建構主義理論，說明中國已從早年體制外的革命者適應、融入到國際社會中，期盼主導國際秩序的西方國家，也能學習建構主義共享理念、共享知識、共享文化的共識觀，破除以衝突、對抗看待國際關係的思維，接受不同的文明和諧共處，共同建構新的國際秩序。

然而，在上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語言包裝下，中共仍不時以現實主義合理化自身外交戰略的選擇。溫家寶在說明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時便指出：「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是由中國的傳統文化、發展需要和國家利益決定的。」⁴⁶也就是說，中國仍是優先以自身利益的需要為考量來決定外交政策，只是剛好和平這條路對中國較有利。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中共更直接表明：「中國目前面臨複雜多樣的傳統和非傳統安全挑戰，受到分裂勢力和恐怖主義等威脅，因此為了捍衛國家主權、安全、領土完整，並保障國家發展利益，中國必須投入更多資源以發展軍隊現代化。」⁴⁷現實主義的觀點無疑是「和平崛起」戰略的重要論述內涵。

⁴⁶ 「溫家寶總理答中外記者問實錄」，新華網，2006年3月14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3/14/content_4301180.htm)
(瀏覽日期：2013年2月19日)。

⁴⁷ 見「《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新華網。

準確地說，自從中共改革開放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後，看待國際關係的觀點便愈來愈不具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轉而以現實主義強調的國家利益作為外交決策的主要考量依據，這樣的思維到了以胡錦濤為首的第四代領導人執政時已基本確立。和平崛起戰略的論述基礎也建立在中國的國家利益上，只是由於中國威脅論長期壟斷了以現實主義觀察中國的研究，中共乃另外以自由主義及建構主義的語言來加強其崛起對國際秩序沒有威脅的合理性。換言之，現實主義是和平崛起戰略的真實思維，而自由主義及建構主義則是用來做政策宣傳的論述工具。

從鄭必堅 2003 年在博鰲亞洲論壇上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的演講，溫家寶、胡錦濤多次在公開場合對「和平崛起」、「和平發展」的闡釋，再到 2005 年「和諧世界」的提出，以及《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中國的和平發展》兩份白皮書的宣告，一言以蔽之，中共和平崛起戰略的論述內涵，核心就是將和平與崛起連在一起，引用各種理論、實例來證明：只有以和平的手段才能完成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崛起需要和平的環境，中國的崛起必將有利於世界的和平。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的「和平崛起」論述迴避了「和平」與「崛起」孰為手段、孰為目標的問題，或者如曾任大陸國防部長的曹剛川在任內時對和平崛起的闡釋，認為「和平」與「崛起」是同時要完成的目標。⁴⁸

（二）作為規畫

至於到底中共認知的「崛起」具體又要達到那些目標，顯然已不直接見於中共對外宣示的文書中。不過，由於和平崛起戰略強調中共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為內政建設的需要而服務，因此中共經好幾屆全國黨代表大會所確立下來的國家發展目標，即在 2020 年建設全面小康社會，以及 2050 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便可視為是中共官方承認的和平崛起目標。胡錦濤曾指示：「維護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爭取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睦鄰友好的周邊環境、平等互利的合作

⁴⁸ 魯世山，「中國和平崛起理論研究綜述」，頁 41。

環境和客觀友善的輿論環境，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是當今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務，也是基本目標。」⁴⁹這段話充份展現了中共以國內建設為中心的外交戰略論述。

就中共和平崛起戰略下的政策作為規畫，可分作內政、外交及軍事三方面來梳理。在內政方面，由於本文主要就中共國家戰略的對外部分做研究，因此僅說明其中和國際關係相關聯之處。基本上，中共將國內的經濟建設和外部的經濟全球化連繫在一起，認為全球化降低了國家必須為爭奪資源及生存空間而發動戰爭的機率，使得中國可以不像過去帝國主義國家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方式成就自身的發展。⁵⁰在這樣的認知下，胡錦濤繼承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所提出的「戰略機遇期」預判，確認中國在更大程度地參與經濟全球化後，可以利用全世界的資金、市場及先進的技術與管理資金來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⁵¹中共所強調的「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在不脫離全球化的同時保持獨立自主，亦即從自己的國情出發，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避免透過對外掠奪及擴張，或者以犧牲環境和過度消耗資源為代價的傳統工業化模式。

在外交方面，根據「和平崛起」戰略，主要體現為大國外交、多邊外交、睦鄰外交、發展中國家外交這幾項政策。事實上，自 90 年代中期起，大陸學者便開始認識到「大國關係就是世界格局的基礎」，⁵²只是因為中共多年來高舉反霸旗幟，深怕提倡大國外交會令人誤解為剝削小國利益的強權政治，故有很長一段時間迴避大國外交。隨著中國國力的持續上升，中共終於在十六大政治報告中將「大國外交」刊出，並放在外交議程上最優先的項目；⁵³而後至 2003 年正式承認自身的崛起後，更直接明確「大國外交」為中共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宣示必

⁴⁹ 「第十次駐外使節會議在京舉行」，人民網，2004 年 8 月 30 日，
〈<http://zg.people.com.cn/BIG5/33832/33852/2748368.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1 月 14 日）。

⁵⁰ 見「《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新華網。

⁵¹ 陳先奎、辛向陽，「中國和平崛起的基本含義」，學習時報，2004 年 3 月 25 日，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607808.htm>〉（瀏覽日期：2013 年 2 月 19 日）。

⁵² 俞邃，「當今大國關係與世界格局」，國際政治研究（北京），1994 年第 3 期，頁 1。

⁵³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3 期（1999 年 7 月），頁 23~38。

須致力於在自己已經是個大國的基礎上，處理好與其它大國的關係，以求中國發展所需要的和平穩定環境。⁵⁴

關於多邊外交，則同樣是在明確自身為大國的立場上，為促進國際秩序更完善盡相應的責任。本來中共因為歷史的原因，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有疑懼，且擔憂參與其中極容易傷及自身的主權完整。在和平崛起的戰略指導下，則不僅主張以更積極的心態參與各種國際組織及機制，並相信透過多邊外交，可以讓中國在國際場合站上道德的制高點，從而對美國日趨單邊主義的霸權作風產生制衡。⁵⁵睦鄰外交則將傳統地緣政治的考慮以「共同發展」的語言包裝，強調中國崛起是亞洲崛起的一部分，中國的發展同時將為亞洲帶來繁榮。⁵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說明中國選擇先從與自身利益相關性較高的周邊區域著手，從這裡尋找崛起的出路。至於發展中國家外交，乃是中共仍持續以發展中國家的成員自居，雖不直接挑戰既有的國際秩序，但也不放棄改革當中存在的不公義，為發展中國家發聲。⁵⁷有學者認為，中共的發展中國家外交其實亦可用傳統的權力平衡理解，⁵⁸也就是在表面的「和諧」說辭背後，隱含有團結發展中國家以對抗國際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的權謀。

最後是軍事方面。雖然在官方論述中，為強調中國「和平崛起」的「和平」訴求，中共刻意淡化對自身軍事建設的說明，但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則仍重申了中國為捍衛其國家主權及發展利益，必須全力發展軍事現代化。⁵⁹面對西方學界批評中國軍事規模過大、軍事預算不明，中共也始終堅稱這只是相應其基本需求的「防禦性國防」措施。⁶⁰值得注意的是，面對台獨、藏獨等分裂主義勢力，中共認為其乃侵犯國家主權的威脅，因此如使用武力鎮壓之，並不算是

⁵⁴ 「第十次駐外使節會議在京舉行」，**人民網**。

⁵⁵ 門洪華，**中國：大國崛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頁13。

⁵⁶ 關於中國與亞洲共同發展的論述，見「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在2003年博鰲亞洲論壇的講演」，**新華網**。

⁵⁷ 見「國際觀察：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屬性沒有改變」，**新華網**，2010年9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9/19/c_12587652.htm〉（瀏覽日期：2013年2月19日）。

⁵⁸ 見趙建民、許志嘉，「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和諧世界觀』：理論與意涵」，頁14~15。

⁵⁹ 見「《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新華網**。

⁶⁰ 同前註。

違背「和平崛起」的軍事侵略。中共也多次強調，國家統一是中國和平崛起的重要條件之一，⁶¹而當今的中國仍處於海峽兩岸分治的狀態，如以和平方式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則使用軍事完成統一亦是「和平崛起」戰略所允許的一個選項。

第三節 學術菁英對「和平崛起」戰略的批評

一、對「崛起」的含義提出不同主張

——中共官方在 2003 年正式提出「和平崛起」後，又於 2004 年 4 月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將說辭改為「和平發展」，其中最主要的爭論點，就在於部分人士認為「崛起」一詞容易使國際社會誤解，反倒更助長中國威脅論的氣燄。事實上，官方的論調始終迴避對「崛起」一詞做明確的定義，其相關的論述皆將「和平崛起」引導到內向性的國家發展，而在官方修改修辭後，鄭必堅更表示「『和平崛起』同『和平發展』是一回事」。⁶²然而，「和平崛起」的提法畢竟是中共首次承認自身的崛起，既然以「崛起」取代傳統鄧小平使用的「發展」，難免令人感覺背後另有一些不見於文字的思維。

後來中共內部發生的「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間的爭辯，正凸顯了官方論述沒有解釋的問題。相較之下，學術菁英雖也遵循官方論述的架構，但仍能有更多空間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也就是說，對於「崛起」的含義提出不同的主張。大陸學者胡宗山認為：「崛起指一個國家在其原有的國家行列中迅速地脫穎而出或與最強國縮小差距，達到另一個國家定位，如從一般國家成為地區強國，由地區強國成為世界強國，由世界強國躍為超級大國的動態過程。」⁶³俞新天則認為：「崛起是指一個國家的經濟迅速發展，社會不斷進步，比較側重於內部的變化。而談到和平崛起，則更加強調及對外戰略。」⁶⁴門洪華則說：「所謂崛起，是一

⁶¹ 劉建飛，「和平崛起是中國的戰略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6 年第 2 期，頁 39。

⁶² 鄭必堅：「『和平崛起』同『和平發展』是一回事」，*新華網*。

⁶³ 胡宗山，「和平崛起是否可能？——歷史與理論的思考」，*勸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湖北)，2005 年第 4 期，頁 2。

⁶⁴ 俞新天，「認識和避免當今的衝突與戰爭——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選擇」，*國際問題研究*(北京)，2004 年第 6 期，頁 38~43。

種興盛的景象，但又不是一般的興盛，而是一個大國從落後轉向興盛的景象；崛起是一種發展，但又不是一般的發展，而是一個大國改變世界政治生態和國際格局的發展。」⁶⁵綜合以上幾種說法，大致可歸納出以下幾點：1.「崛起」和「發展」的概念不盡相同；2.「崛起」具有比較性，包括和其它國家比較，以及和自身原本的地位比較；3.「崛起」具有外向性，比「發展」更具有國際關係的意義。

閻學通、潘維、徐堅、樊體寧四位學者也都強調「崛起」與「發展」不同，指出「崛起」的參照系是全世界，必須相對於其它國家在國際權力格局中的地位而言。⁶⁶其中，閻學通尤其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語言，精準地對「崛起」做出定義。閻學通指出，「崛起」決不等於「發展」或是「富有」，而是高於「發展」、「富有」的概念；「崛起」同時是一個僅適用於大國、不適用於小國的概念。在他看來，「崛起」是指成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國家，重要到成為少數幾個國家之一或甚至是最重要的唯一國家，而這個過程勢必會挑戰到既有霸權的地位，此乃實力變化的必然結果，與崛起國的主觀意願無關。⁶⁷在這一點上，潘維和閻學通有一樣的想法，而且還說得更直白，那就是必須成為世界上最強的國家，不管國際權力格局是一極、兩極還是多極，所謂的崛起，就是必須和世界上存在的「極」平起平坐、甚至超越。⁶⁸因此，「崛起」便是愈來愈不接受別國領導的過程，努力地使自己的地位能因應實力的增長而提升。

而在閻學通關於「崛起」定義的論述中，尤其指出「地位」這一概念的內涵。他表示，「地位」同時又包含了「排序」和「差距」這雙重含義，「排序」指的就是單純按國家間綜合國力的大小排出的名次，而「差距」則是國家間綜合國力性質的差異。舉例而言，今天的美國和任何一個位居其次的國家，在排序上雖是第

⁶⁵ 門洪華，**中國：大國崛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頁5。

⁶⁶ 見樊體寧，「論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國際關係學院學報**（北京），2005年第3期，頁16~20；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陳琪、劉丰主編，**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3~32；徐堅，「和平崛起是中國的戰略抉擇」，**國際問題研究**（北京），2004年第2期，頁1；潘維：關於『中國的和平崛起』，**新法家**，〈<http://www.xinfajia.net/789.html>〉（瀏覽日期：2013年2月19日）。

⁶⁷ 閻學通，「對『和平崛起』的理解」，**教學與研究**（北京），2004年第4期，頁5~6。

⁶⁸ 「潘維：關於『中國的和平崛起』」，**新法家**。

一和 second，但在差距上則是超級大國(super great power)與普通大國(great power)的差別。所謂的崛起，便是必須達到在差距上的全盤改變。⁶⁹閻學通並指出，常說的「權力」一詞，其實必須區分為「權」和「力」兩個概念，「力」指的是軍事實力、經濟實力、文化實力等資源性實力，「權」則是如政治實力這樣的操作性實力。以中國大陸今天的經濟實力而言，理應在主導國際財經制度的相關組織中擁有更大的投票權及發言權，但目前顯然還不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在閻學通眼中，中國的「權」與「力」還不相稱，不能算是真正的崛起。⁷⁰

給人強烈鷹派印象的軍事問題專家羅援，由於本身具有解放軍少將軍銜，其對於「崛起」含義的看法尤具有代表性。羅援表示，崛起要分三步走：一是營造階段，營造安全的周邊環境，這是一種維護型的，標誌是主權領土不再分裂；二是塑造階段，塑造對我有利的安全環境，這是一種主動型的，標誌是收復失地；三是經略階段，經略對我有利、國際社會又能普遍接受的政治經濟新秩序，達成戰略平衡和穩定。在羅援看來，目前的中國還只在第一階段。⁷¹顯然，羅援對中國的崛起有很高的期望，其終極的目標是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關於中共內心對這套新秩序的願景，尚有待本文第三、四章的研究，但至少能確定的是：綜合羅援及前面多位學者的看法，可知在關於「崛起」含義的問題上，大陸學界有與官方論述不同的聲音。

鄭必堅對於「崛起」的詮釋，則遵循官方一貫的論調。他指出，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便依循改革開放的路線，提出了一直到 21 世紀中葉為止的發展戰略，而這套經鄧小平、江澤民再到胡錦濤一脈相承的國家發展方向，其實質就是在追求和平崛起。鄭必堅並說明，擺脫落後、改善民生、給人民提供有品位的生活，就是和平崛起的目的。⁷²準此，按鄭必堅的說法，「和平崛起」幾乎不具外向性，唯一有的就是同時為其它發展中國家提供機遇。鄭必堅一再強

⁶⁹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收於陳琪、劉丰主編，**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

⁷⁰ 文正仁著，李春福譯，**中國崛起大戰略——與中國知識精英的深層對話**，頁 18~19。

⁷¹ 「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環境與國際戰略」，**學習時報**。

⁷² 文正仁著，李春福譯，**中國崛起大戰略——與中國知識精英的深層對話**，頁 4。

調，「和平崛起」並不是什麼新概念，它和傳統所講的「和平發展」是一樣的。然而，隨著中國國力的上升，大陸學界及人民紛紛賦予「崛起」更多的期許，而官方有意讓學界繼續討論「和平崛起」的表現，亦隱含著在國際舞台上加大力度「有所作為」的企圖。鄭必堅此種嚴守官方立場的論述，更多地是為了避免中國威脅論的質疑，並不能完全反應決策者內心真實的想法。

學術菁英對「崛起」的要求，無疑會對決策者的外交戰略產生影響，而為了凝聚民心鞏固統治正當性，中共亦必須適度地滿足人民對民族強盛的願望。中共一方面壓制過度民族主義情緒的自大心態，一方面也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號召團結的旗幟。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後，又提出更具濃烈情懷的「中國夢」一詞，而這其實正是官方對「崛起」的另一種說法。因此，部分大陸學者乃主張，中國人認知的「崛起」就是「恢復」中國昔日的地位。此種定義雖顯得十分主觀，卻也凸顯了研究決策者內心認知的重要性。

二、「和平」是目標還是手段的論辯

學術菁英對和平崛起戰略的另一個爭點，就在於「和平」究竟是目標還是手段。此一問題的解答還免不了和「崛起」形成一種互相辯證的關係，亦即「和平」到底只是中共完成「崛起」的工具，抑或「和平」本身也是目標之一。關於這個問題，官方的論述一直是以淡化的態度處理，盡可能地將「和平」與「崛起」混在一起表述，強調這是一種有別於傳統霸權國的戰略。然而，當和平崛起戰略開始被當作學術研究的課題，「和平」與「崛起」的關係也就免不了嚴格的邏輯檢視，各方對「和平」究竟是目標還是手段的問題便呈現眾說紛紜的情況。

帶有官方代表性的鄭必堅，以籠統的論述方式將「和平」同時視為是目標及手段。他開宗明義地表示，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是依託於全球化的外部環境及改革開放的國內政治環境，由於有這樣的條件，中國得以不透過犧牲他國利益的方

式完成自身的崛起，使得和平崛起的最終目標是「共同的發展和繁榮」。⁷³準此，鄭必堅揭示了「和平」是一種目標。而從另一個層面而言，鄭必堅也強調了「和平共存」是中國崛起的先行條件，只有維護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中國才能順利地完善自身的發展。如此，在鄭必堅看來，「和平」同時又是一種為達成崛起而使用的手段。

事實上，除了鄭必堅外，不少大陸的官員及權威學者也都持這樣的觀點，也就是將「和平」當成既是目標也是手段。其中，秦亞青習慣以建構主義來詮釋中共的和平崛起戰略，主張改革開放後的中共已逐步融入到國際社會，對於自身的定位已從「體系的抗拒者」轉變為「參與者」；因此，中共從心理上接受了現行國際秩序的制約，即便有若干不滿意處，也會選擇在體制內進行漸進的改革。⁷⁴準此，如換成現實主義的語言，就是中共在國際的現實環境下，出於理性的判斷，選擇以和平的方式尋求崛起；而如再以自由主義的語言詮釋，便是國際制度的作用使各國得以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創造共同利益，最終在一國崛起的同時也促進和平。本身就信仰自由主義的王逸舟，也強調中共需要在和平的環境下才能完成崛起，他自創「創造性介入」的外交理論，就是建議中共應該在體制內多用西方的語言，以西方的國際法理及價值觀念來反擊美國的霸權主義言行。⁷⁵從這個角度理解，王逸舟亦傾向於支持中國能在「韜光養晦」之餘加強力度在「有所作為」之上，但是這不但不代表中國將對現有秩序有所挑戰，而且還是使現有秩序更加地符合聯合國憲章及相關國際法的精神，更加地保障世界的和平與安定。換言之，王逸舟認知的和平崛起戰略，仍是將和平同時視為是目標及手段。

綜上所述，如要將和平同時視為是目標及手段，則「和平」與「崛起」在作為「目標」上的地位便是相當的。然而，一旦「和平」與「崛起」發生衝突時，亦即如不使用非和平方式就無法達到崛起，或者一旦崛起便勢必帶來不和平，那

⁷³ 同前註，頁 7。

⁷⁴ 秦亞青，「國家身份、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三種假設」，*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

⁷⁵ 見王逸舟，*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新取向*。

麼「和平」與「崛起」究竟孰輕孰重？關於這個問題，依循上述幾位學者的邏輯，似乎是斬釘截鐵地判定，和平與崛起必然同時發生，中國的崛起一定離不開和平。學者郭震遠對此即回應：中國的崛起需要和平，中國的崛起也將為世界帶來和平，「和平」與「崛起」之間不存在矛盾。⁷⁶曾任大陸國防部長的曹剛川在概括「和平崛起」的要義時，也表達同樣的概念，他所指出的「中國決心以和平的手段完成崛起」、「中國崛起的最終目標是和平」便說明了他將和平同時視作目標與手段的想法。⁷⁷值得注意的是，所謂「中國崛起的最終目標是和平」，似乎還把「和平」作為目標的地位抬到「崛起」之上，這樣的論調顯然充滿太強烈的理想色彩，無法為強調「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者接受；而就算是自由主義者，也只是將「和平」當成一國崛起的同時創造出的「共同利益」，未必會認同「和平」是在「崛起」之上的終極目標。

閻學通便直接挑戰「和平」與「崛起」孰輕孰重的問題。在他認為，一個大國用三十年時間崛起為世界強國，和其經過三百年時間而成為世界強國，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因為「前者是人為的，需要戰略」，而「後者是天定的，需要運氣」。因此，他開宗明義就表示，一國當然是要用盡所能去爭取在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完成崛起，據此以制定外交戰略，否則就不具政治意義。⁷⁸換言之，閻學通很明確地認為，只有「崛起」才是唯一的目標。在認定這個目標後，閻學通乃進一步質疑：和平是否是達成崛起的唯一方式？維持了和平就能實現崛起嗎？他並以2004年時陳水扁推動法理台獨所造成的台海危機為例，指出一旦台獨在美國支持下成真，還能夠不動用武力壓制嗎？⁷⁹顯然，閻學通的論述亦隱含有一個假設，那就是如果中國主權發生分裂，中國的崛起就不可能實現。

閻學通對「和平」與「崛起」之間關係的論證，首先是確定了這兩者必只有

⁷⁶ 此為2012年8月13日郭震遠於台北市兩岸人民交流服務協會主辦之「中華兒女文史體驗營」中的一場講座上所言，當時是回應筆者在現場關於「和平與崛起孰為目標」的提問，講座地點為北京富驛時尚酒店燕莎店。

⁷⁷ 魯世山，「中國和平崛起理論研究綜述」，頁41。

⁷⁸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陳琪、劉丰主編，**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頁3。

⁷⁹ 閻學通，「對『和平崛起』的理解」，**教學與研究**(北京)，2004年第4期，頁5~6。

其一是終極目標，而他主張應為後者。其次，則對於「和平」是否是「崛起」的必要條件有所質疑。關於這一方面，實際上涉及了不同學者對國內外情勢的主觀判斷，近乎於一種無法實證的意識型態。從官方的表態中，可以確信中共對世界大勢的整體認知是和平與發展，同時也認定 21 世紀的頭二十年是中國崛起的「戰略機遇期」，必須更穩健地利用全球化的和平時代來完善自身的發展。但是，中共對外宣示的「防禦性國防」，也強調保有以非和平手段捍衛國家主權及發展利益的權利。換句話說，國家主權及發展利益即是比「和平」位階更高的「崛起」條件，「崛起」理應是比「和平」更高的目標。事實上，官方對外的宣示雖都將「和平」與「崛起」混在一起談，但「和平」作為一種手段或者目標，都只是出於當下對時局的判斷。作為可長可久的國家戰略，勢必要能在各種情況的變化下立於不敗之地，因此一言以蔽之，一旦和平的環境無法維持，便須放棄和平而另謀崛起之道。

綜上所述，閻學通乃直接指明，「和平」與「崛起」不能本末倒置，和平是手段，崛起才是目標。此外，閻學通還深入討論「和平」的定義。在他看來，當崛起國的國力上升，其和霸權國之間就必然發生權力衝突，而這種矛盾是很難以意志克服的，因此所謂的「和平崛起」，便是盡可能透過外交策略的安排，避免這種衝突激化到戰爭的程度。⁸⁰言下之意，閻學通認為，即便中國與他國發生小規模的軍事衝突，只要沒有釀成大規模的戰爭，亦不算是違反「和平崛起」的宣示；至於使用武力以壓制台獨、藏獨、疆獨等分裂行為，則根本算是內政，不在「和平崛起」的指涉範圍之內。相較之下，潘維則更為強烈地認為，根本不會有現存的霸權國會「自殺」放棄獨大的地位，因此「和平崛起」只是一場迷夢，必須「丟掉幻想，準備鬥爭」。⁸¹以上的觀點，雖不見於官方主流的論調，卻可能反映了一大部分人乃至於決策者的真實想法。

總的來說，在決策者心裡，「和平」充其量是比「手段」更高階的一種「條

⁸⁰ 同前註。

⁸¹ 「潘維：關於『中國的和平崛起』」，新法家。

件」，而「崛起」才是終極的目標。面對當下的情勢，決策者將「和平」視為是達成「崛起」的重要條件，維護這個條件，可以幫助中國更安穩地完成崛起。以新古典現實主義觀之，這便是決策者對自身所處的環境的認知，而這樣的認知很可能與其所擁有的實力有密切關聯。不論是官方、主張和平是目標的學者或主張和平只是手段的學者，都認為中國當前的實力是不足的，而和平作為崛起的重要條件的判斷也建立在這樣的認知。換言之，如果中國的實力足夠、強大了，則和平還會是中國堅持的條件嗎？這恐怕是和平崛起戰略最深層的問題。

第四節 小結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救亡圖強的盼望，以及中共建政以來幾代領導人關於「和」的論述，為和平崛起戰略提供了思想基礎。回顧歷史，從孫中山、梁啟超到中國共產黨，近代中國不同派別的政論家皆提出將中國建設成「最強之國」的理想，然到底「最強之國」的具體標準為何，則未有較直白的宣示。同樣地，中共幾代領導人雖都對「和」提出論述，但主要是以「反霸權」的負面表列方式詮釋，究竟其想建立怎樣的一套符合「和」的秩序，希望國際社會由誰領導、怎麼領導，則多以較籠統的言辭迴避。

2003年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正式提出和平崛起戰略，其箇中內涵多繼承中共既有的論述、少有創新，而真正重要的意義乃在於政治考量。除美國因反恐戰爭給予中國更大的發展空間外，第四代領導人官僚出身的背景也使他們更能跳脫意識型態的桎梏，從國家利益的需要出發思考外交戰略。更重要的是，中共的領導人一向有提出一套專屬的思想論述的傳統，2003年胡錦濤剛剛接班，乃著眼於大陸社會對國際地位的心理需求，以和平崛起戰略企圖強化自身的權力正當性。而深究和平崛起戰略的構想，則實際上是以權力為核心的現實主義思維，只是外表用帶有理想色彩的自由主義、建構主義語言來包裝，以期超越中國威脅論的論調。後來「和平崛起」的說辭雖因黨內有異議而改為「和平發展」，

但主要論述基本不變，且為後來胡錦濤的「和諧世界」及習近平的「中國夢」所繼承。

學界菁英對於「和平崛起」的爭辯，則聚焦在崛起的定義，以及「和平」與「崛起」孰輕孰重的問題。關於這兩個問題，官方說法是模糊以對，將「崛起」與「發展」混為一談，將「和平」與「崛起」視作將同時達成的目標。筆者綜合各家意見，則認為中共決策者內心認定的「崛起」必然與「發展」有層次之別，前者更具與他國的比較性，也是中共真正追求的的國家目標；至於「和平」與「崛起」之間的關係，則「和平」充其量是中共在現階段研判要達成「崛起」必需的條件，當中國自身的實力及國際權力結構發生一定變化時，該條件的必要性便將隨之消長。



第三章 中共「和平崛起」對國際權力格局的觀感

國際權力格局乃是國際無政府狀態下決定國際權力結構的最主要力量，並間接制約了國際制度的形塑與運作。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國際權力結構雖是制約國際秩序的核心因素，但一國看待國際秩序的觀感卻對其外交戰略起到關鍵作用，從而倒過來影響國際秩序。（有關國際權力結構、國際秩序、國家認知之間的因果關係，可參見本文圖1。）因此，本文第三、四章分別就中共對國際權力格局及國際制度的觀感進行探討，以總結出中共在「和平崛起」戰略下的國際秩序觀。

本章採用由大到小的分析層次來觀察中共對國際權力格局的觀感。就全球層次而言，大陸多數學者認為當今的世界乃是「一超多強」的權力格局，但中共官方自冷戰末期即提出「多極化」的外交戰略，其中既有對當下世界權力格局的判斷，顯然也包含對未來的期待。就區域層次而言，中國自古在東亞就是「中央之國」，如今則優先關注自身認定的核心利益，進而爭取成為美國之外區域內的權力最高位者。最後，綜合前面的觀察，發現中國無論在世界還是區域權力格局中，都難逃位處「一超」的美國掣肘，因此再針對中共對美國權力地位的觀感進行分析，判定對美外交將是中共「和平崛起」戰略的重中之重。

第一節 促進多極化的世界格局

一、對世界形勢的認知

不同實體在一定範圍內彼此影響，自然就會產生權力關係，進而形成權力格局。二戰結束以來，一個擴及世界的權力格局逐漸確立，各國在其中佔據不同的位置。無庸置疑地，各國的權力地位是不平等的，少數強權國家佔據了上層席位，決定了這樣一個世界權力格局的基本組合。對中國而言，追求躋身那些「少數強

權國家」之一，一直是清末以來就懷抱的熱切盼望。¹抗戰結束前後，中國一度成為四強之一，但旋即就因國共內戰而地位大跌。即便如此，剛剛建政的中共很快地又在韓戰中成為左右美、蘇強權的關鍵力量。中國天生擁有的地理及人文條件，賦與了其成為強權的潛力；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的外交政策很自然地擁有世界性的格局。

在這樣的客觀現實下，中共自建政以來的外交戰略，一直離不開對世界權力格局的判斷，而當中首重的就是對世界整體形勢的分析，用中共的話語表達，即為「時代主題」。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中共決策者對「時代主題」的認知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毛澤東時代，無論是建政之初的「一邊倒」、50年代中期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乃至文革時提出的「三個世界」，「戰爭與革命」始終是中共對時代主題的認識，用後來鄧小平的話說，就是「立足於早打、立足於大打、立足於明天就打」，認為世界大戰隨時會發生。²鄧小平時代開啟後，改革開放成為主旋律，「和平與發展」成為對世界形勢的新認識。雖然這樣的新認識，亦受到中（共）美關係改善、歐洲及日本經濟崛起等國際因素的影響，但主要仍得力自中共國內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新思維。

大體而言，自鄧小平確立「和平與發展」為新的時代主題後，中共決策者對世界形勢的判斷便沒有太大的改變，即維護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全面致力於經濟發展。然而，外部環境的變化卻不操縱於中共之手，因此當外部環境出現可能傷害到中國發展的威脅時，國內菁英便會對外部環境的「安全」程度做出不同的評估，從而影響決策者的認知。

根據台灣學者陳牧民的研究，中共在確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後，實際上又經歷了「韜光養晦」、「全球化」、「新安全觀/和平崛起」這些不同的對外部環境的安全評估。³客觀來看，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主要是為了應對 1989

¹ 關於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救亡圖強的理想，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

² 秦亞青，**國際體系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頁 129。

³ 陳牧民，「當和平崛起遇上台灣問題：菁英認知下的中國安全戰略」，**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4 期（2006 年 12 月），頁 10~14。

至 1991 年間所發生的東歐巨變、天安門事變、蘇聯解體這一連串的國內外衝擊，而當時中共內部也因此對外部環境的安全評估轉為悲觀，將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企圖視為主要威脅，甚至激起對改革開放是否持續的爭辯。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確立了改革開放的路線不變，但各方對於全球化的爭論仍沒有休止，一直到 1997 年中共十五大報告才算定調。⁵相對於「韜光養晦」的保守態度，「全球化」的思維則是對外部環境的樂觀表現，認定只要不急著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便能利用全球化的環境完善自身的現代化。

然而，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國際上「中國威脅論」的論調日益高漲，中國大陸的菁英對外部環境的評估又轉趨審慎，而有「新安全觀」、「和平崛起」這種偏重於反駁中國威脅論的概念提出。⁶總的來說，近十年來的中共，對世界形勢的判斷還是較為正面的。自 2003 年中共發表十六大報告後，21 世紀的頭二十年就被官方認定為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⁷這種認知為胡錦濤及甫任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所接受。⁸中共官方顯然相信，外部環境中對中國發展的威脅處於可控制的範圍，中國的崛起仍主要決定於自身的現代化進程。

二、「多極化」的戰略內涵

中共對世界形勢的認知可見於官方的宣示，然其對自身地位的認知就沒有這樣直白地表述了。事實上，要探究中共如何看待自身在世界權力格局中的地位，首先還是得先了解其對世界權力格局的判斷。自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後，起初對世界形勢的判斷還是較為審慎，僅是認為戰爭爆發的機率降低

⁴ 邢賁思，「風雲驟變後的思索」，*科學社會主義*(北京)，1992 年第 2 期，頁 8~11。

⁵ 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共內部對全球化的態度仍不一致，一直到 1997 年江澤民將「高舉鄧小平理論大旗」及全球化的概念納入中共十五大對外關係的論述中，世界全球化的趨勢才為中共肯定。見陳牧民，「當和平崛起遇上台灣問題：菁英認知下的中國安全戰略」，頁 14；珍妮·克萊格(Jenny Clegg)著，葛雪蕾、洪漫、李莎譯，*中國的全球戰略：走向一個多極世界(China's Global Strategy: Toward a Multipolar World)*(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頁 76~82。

⁶ 陳牧民，「當和平崛起遇上台灣問題：菁英認知下的中國安全戰略」，頁 10~14。

⁷ 「戰略機遇期可求更可為」，*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3 年 3 月 4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304/c49156-20664870.html>> (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5 日)。

⁸ 金燦榮、段皓文，「重要機遇期的變與不變」，*新華網*，2013 年 2 月 2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26/c_124388840.htm> (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5 日)。

而已，但到了冷戰末期，則愈來愈傾向認為美蘇兩極的對立已出現鬆動，世界權力格局將會在經濟集團化（日本、西歐等經濟集團形成）、經濟整合、第三世界逐步發展的浪潮下產生大變動。⁹1988年2月，鄧小平指出：「現在看來，完全由兩個超級大國主宰的時代已經過去。」¹⁰同年6月，時任外交部長的錢其琛公開表示世界將走向「多極化」，而且這樣的趨勢是「積極的發展」。¹¹「多極化」成為中共官方對世界權力格局前景的預言。

1989年後，美蘇兩極對立的鬆動似乎更為明朗，但中共卻因為發生天安門事件，而受到西方國家的圍堵。此時大陸的菁英多對外在環境的安全評估轉為悲觀，鄧小平乃在此時提出了著名的「韜光養晦」策略，強調「不當頭」。然而，即便在這樣的環境下，鄧小平仍在1990年3月明確表示：「美蘇壟斷一切的情況正在變化，世界格局將來是三極也好，四極也好，五極也好，蘇聯總還是多極中的一個……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麼樣也算一極。」¹²中共對世界將走向多極化的判斷，並未因外在環境轉趨不友善而改變。

中共所說的「極」究竟意涵為何？大陸學者在這方面意見基本一致，認為「極」意指對國際政治有較大影響力的力量中心，可以是一個國家，也可以是經過一定整合的國家集團。¹³那麼，到底當今的世界是不是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呢？冷戰結束二十餘年來，大陸學者大多承認，美國對國際政治明顯有其它強權所不及的支配能力，而且是在層次上的根本差異，他們稱美國這樣的特殊地位為「一超」，其它幾個強權則是「多強」。¹⁴準此，大陸學者多認定，這種「一超多強」的格局還不到中共所稱的「多極化」，因為它實際上是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或者也只是朝多極化世界發展的過渡階段而已。綜合中外學者的看法，中、歐、俄、日是公認的多強，而按大陸學者普遍的認知，它們「都具有成為一極的實力，但

⁹ 李岱、周陽，「略論當代的戰爭與和平問題」，*國際問題研究*（北京），1986年第3期，頁5。

¹⁰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29。

¹¹ 「世界多極化是個積極的發展」，*人民日報*，1988年6月2日，第6版。

¹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53。

¹³ 葉自成，「對中國多極化戰略的歷史與理論反思」，*國際政治研究*（北京），2004年第1期，頁9。

¹⁴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收於陳琪、劉丰主編，*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14~20。

都還不是一極。」¹⁵

其實，1991年美國在波灣戰爭中展示絕對優勢的軍事實力後，中國大陸對多極化趨勢的判斷便轉趨保守。沃爾伏(William Wohlforth)和克萊格(Jenny Clegg)兩位西方學者都認為，1995~1996年的台海危機是影響中共判斷很大的分水嶺。美國學者沃爾伏(William Wohlforth)認為，本來崛起的中共對美國建立的單極秩序是不滿意的，但經過台海危機後，中共承認、容許了美國單極領導的現狀。¹⁶對此，英國學者克萊格(Jenny Clegg)則有不同觀點，她認為不能以此就認定中共默認了美國的單極地位，因為中共考慮了主要大國的綜合國力，並對所處的權力格局做了認真評估，然後才改以一些新手法來推動多極化。¹⁷

以後來中共的宣示來看，「多極化」仍是中共所相信的世界趨勢，1997年中共十五大報告中，便將多極化確立為全黨對未來世界局勢的判斷。¹⁸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中共所稱之多極化，顯然除了對形勢的判斷，更多的是一種主觀的價值期待。此外，對中共而言，多極化也成為一種可實踐的外交策略。在十五大報告中，中共同時提出了「新安全觀」，也就是要以合作安全的手段來推動多極化。¹⁹「新安全觀」為中共的多極化戰略提供了論述，同時也幫助中共迴避了對自身權力企圖的表態。本來，「多極」這一說辭就帶有濃厚的權力政治色彩，放在現實主義的話語體系中理解，很容易就令人聯想到大國協調的權力平衡；但為了取得道德制高點以「軟制衡」美國，中共刻意淡化多極化戰略的權力重組意涵，而強調追求國際政治的民主化，反對霸權，建立公平正義的世界新秩序。這種考量，和後來中共將「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混為一談是同一種邏輯。

¹⁵ 葉自成，「對中國多極化戰略的歷史與理論反思」，頁9~10。

¹⁶ William Wohlforth, "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Dec 2008), pp. 54-55.

¹⁷ 珍妮·克萊格(Jenny Clegg)著，葛雪蕾、洪漫、李莎譯，*中國的全球戰略：走向一個多極世界* (*China's Global Strategy: Toward a Multipolar World*)，頁47。

¹⁸ 李忠杰，「怎樣認識和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人民網*，2006年5月16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1038/4376706.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13日)。

¹⁹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97年9月12日)」，*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4/29/content_1447509.htm〉(瀏覽日期：2013年3月13日)。

準此，中共在關於多極化的論述中，實際上繼承毛澤東時代「和平共處五原則」、「三個世界」當中蘊含的反霸精神，運用左派對已開發國家如何透過結構優勢剝削第三世界國家的理論，高舉反對強權壟斷國際政治的大旗，藉此爭取更多的自主性。²⁰有些大陸學者繼續深究這樣的理論，乃再提出「非極化」的論調，認為應該消除強權政治。²¹但是，國際政治中失去強權領導，顯然是極為不現實的想像。中共自己也說，中國是要爭取做其中一極的，轉換成更白話來講，就是要努力躋身強權之列。因此，準確來講，中共對世界權力格局的判斷及期待，應是美國的一超地位逐漸消滅，而達到另外一種新局面。

三、對自我地位的認知

剖析了中共多極化戰略的論述理路及實質目標，則下一步便可以來探索：中共對自我地位的認知為何？

前面已經提到，中共自冷戰結束以來，一直對涉及權力政治的話語十分謹慎，而對於自己權力地位的描述則更是隱晦。毛澤東時代，中共還經常以「大國」、「強國」自勉，然自改革開放以來，則有很長一段時間保持低調。90年代中期後，一種較為高調的自我定位才開始又出現在官方文書，即所謂「負責任的大國」。²²那麼，到底這樣的「大國」是指在世界權力格局中怎樣的地位呢？

為了更精確地分析，這裡採用美國學者在論及世界權力政治時常用的地位分級，將各國大略劃分為「超級大國」（或稱超級強權，英文：superpower 或 great power）、「普通大國」（或稱強權，英文：major power）及「小國」（英文：minor power）三種等級。準此，各國的權力排序除了有權力大小的差異，還有權力等級本質的不同。也就是說，兩個權力大小懸殊的國家，有可能是位列同一等級；

²⁰ 克萊格(Jenny Clegg)著，葛雪蕾、洪漫、李莎譯，**中國的全球戰略：走向一個多極世界(China's Global Strategy: Toward a Multipolar World)**，頁 98。

²¹ 劉建飛，「論世界格局中的『非極化』趨勢」，**現代國際關係**(北京)，2008 年第 4 期，頁 5。

²² 1990 年代中期起，中共開始提出「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大國」的外交理念。見邱坤玄、黃鴻博，「中國的負責任大國身份建構與外交實踐：以參與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53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73-74。

而兩個權力大小相近的國家，也可能分屬在不同等級。目前為止，中外學者公認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

自中共宣示自己是「負責任的大國」乃至「和平崛起」以來，中共官方及大陸的主流輿論，無疑都認為中國已經是個大國，擁有處理熱點問題及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實力。²³有些學者主張中國「是地區大國而非世界強國」，主要著眼於中國對亞洲以外的地區缺乏國際影響力，²⁴但如真要對世界方方面面的事務皆能影響才可稱「大國」，則當前世界的大國恐只有美國，故這樣的標準實際上已是「超級大國」。另有些主張中國算不上大國的觀點，則源於對大陸內部的政、經、社制度的不滿，這種論述已偏離客觀權力的分析，在國際政治上並沒有太大意義。

而在我們繼續探究中國是個「大國」還是更高位階的「超級大國」之前，或可先思考一下中共如何看自身在世界各國中的權力排序。近年來，「綜合國力」的觀念已大大影響大陸菁英的思考，使他們偏向以「總體能力」和「貫徹戰略的意志」兩者交叉來計算一國的實力。²⁵學者閻學通更進一步提出，以「政治動員力」、「軍事能力」、「經濟能力」作為總體能力的三項指標。²⁶

然而，由於以下兩種原因，大陸官方對中國國力在世界的排序仍著墨較少，而學界的判斷也相當分歧：

（一）基於政治考量，既害怕高估自身地位將被「捧殺」、助長「中國威脅論」，又不滿於國際社會「唱衰」中國的發展、助長「中國崩潰論」。²⁷在這種矛盾的處境下，大陸學者對中國權力的評估不僅充滿了政治考量，而且還經常出現高低懸殊的判斷。

²³ 中共在對外宣布的白皮書中稱，中國「積極參與處理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與主要大國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合作關係」、「為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為周邊地區穩定發展作出了貢獻」。見「《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新華網，2011年9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²⁴ 王國富，「論中國的國家定位」，《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山東），第28卷第6期（2006年11月），頁59。

²⁵ 胡鞍綱、門洪華，「中美日俄印綜合國力的國際比較：兼論中國大戰略（代譯序）」，收於阿什利·泰利斯等著，門洪華、黃福武譯，《國家實力評估：資源、績效、軍事能力》（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頁19。

²⁶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頁16。

²⁷ 同前註，頁5~6。

(二)對國力不同的評估標準很難統一。就「政治動員力」、「軍事能力」、「經濟能力」三項指標而言，即缺乏客觀的衡量標準。以政治動員力觀之，該概念存在相當抽象的成份，每個人的主觀認定可能都不一樣。至於軍事能力，也存在「國防開支」、「核力量」、「軍隊規模」、「武器品質」等多個衡量標準。就連經濟能力，也有「按匯率計算」的 GDP(國內生產總值)、「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 GDP、人均 GDP 三種不同的數字標準。

此外，對中國國力排序的判斷，有時還會涉及心理層面的主觀感受。比如，閻學通認為當前中國的實力已達美國以下的「多強之首」，就算歐盟成功整合成國際政治中的單一行為者，中國也位居世界第三。²⁸對於這樣的判斷，很多人本能地覺得過於高估。又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曾於 2010 年發佈的《國際形勢黃皮書》中，判斷中國綜合國力排行世界第七、軍事能力排行第二，結果這種研究結果因為和一般民眾的感知有誤差，而被不少輿論譏為是笑話。²⁹

準此，所謂超級大國與大國的分別，更多的也是基於心理感受，即閻學通所言：「美國作為超級大國是人們普遍的認知，是一種常識。」³⁰目前看來，即便外國媒體開始有認為中國將成為超級大國的判斷，但這種認知顯然還不為中國多數人接受。³¹ 2011 年 12 月，閻學通在大陸官方媒體《環球時報》上發表文章，宣稱世界權力格局將從「一超多強」轉變為「中美兩超多強」，中國正處於從大國上升為超級大國的過渡階段。³²隨後，學者朱啟超撰文駁稱，中國目前僅是「經

²⁸ 同前註，頁 27。

²⁹ 「中國軍力第二 綜合國力第七 社科院黃皮書淪為笑話」，**香港商報**，2010 年 1 月 6 日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0-01/06/content_2457664.htm) (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13 日)。

³⁰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頁 17。

³¹ “China: one step closer to 'superpower' status,” *The Voice of Russia*, Mar. 4 2013,
(http://english.ruvr.ru/2013_03_04/China-one-step-closer-to-superpower-status) (Accessed Mar. 28 2013); “A Point of View: What kind of superpower could China be?” *BBC*, Oct. 19 2012,
(<http://www.bbc.co.uk/news/magazine-19995218>) (Accessed Mar. 28 2013); “China: The Other Superpower,”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special/world/china_superpower) (Accessed Mar. 28 2013).

³² 閻學通，「一超多強走向中美兩超 多極化式微」，**環球網**，2011 年 12 月 23 日，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12/2315255.html>) (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13 日)。

濟塊頭較大」(指總體 GDP)，面臨的問題仍很多，短期內很難成為超級大國。³³時殷弘和王建偉則認為，中國成為超級大國的速度快慢很難預期，但閻學通在此時做出這樣的宣示是不利於中國的。³⁴大陸官方媒體「環球網」的網路民調顯示，有近九成的大陸網民不認同閻學通的觀點。³⁵

面對這些質疑，閻學通表示，中國人主觀認為中國是否將成為超級大國是一回事，中國在客觀上是否將成為超級大國是另一回事。³⁶閻學通的回應有其道理，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從官方到民間顯然都還沒做好要做超級大國的準備。

因此，總的來說，中共爭取要改變美國「一超」的壟斷局面是可以確定的，但這到底是要取代美國(中國成為一超)、與美同為「兩超」、還是在多強之上不再存在超級強國，則目前還不在中共和平崛起戰略的考量範圍內。

第二節 衝擊核心利益的區域格局

一、對區域形勢的認知

90年代中期以前，中共並未特別將周邊區域視為一個整體來制定戰略。雖然中共建政以來對外的幾次戰役，諸如韓戰、中印邊境戰爭、中俄珍寶島戰役及中越戰爭皆發生在周邊區域內，但當時的中國並未有很強的區域觀念，而是將這些衝突視為是中、蘇、美三邊關係下的次級產物。進入到90年代中期後，一方面因為中國國力的增強，二方面則是亞洲多個大國的同時崛起，促使中共開始將所處的區域視為是一個體系。冷戰結束以來，中國、日本、印度等逐漸成為亞洲

³³ 朱啟超，「駁閻學通『超級大國』論」，中國評論新聞網，2012年1月6日，〈<http://mag.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81&docid=101967904&page=1>〉(瀏覽日期：2013年3月13日)。

³⁴ 邱震海，「全球格局是否真的迎來中美兩超並列時代(鳳凰衛視2012年7月8日《寰宇大戰略》節目文稿)」，鳳凰博報，〈<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698982.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13日)。

³⁵ 「網民指中國未達『超級大國』」，多維新聞，2012年1月1日，〈<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2-01-01/58469656.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14日)。

³⁶ 邱震海，「全球格局是否真的迎來中美兩超並列時代(鳳凰衛視2012年7月8日《寰宇大戰略》節目文稿)」。

的權力中心，該區域從冷戰時的「無極」轉變為「多極」體系。³⁷而諸如東海、南海主權爭議，朝鮮半島核武，台灣海峽情勢等西方世界所認知的國際熱點問題，不僅通通發生在東亞，而且都影響到中國的切身安全，這使得此區域內的權力格局愈加複雜、動盪，並和崛起中的中國息息相關。

深究中共建政以來的外交戰略，雖在表述上迴避國家間的權力鬥爭，但實際上卻一直是以自身所處的權力格局做考慮，尤其是具有密切地緣關係的周邊區域。³⁸在 90 年代中期提出「負責任的大國」前，中共最主要的自我定位就是「發展中國家」，而這個定位正是繼承自毛澤東時代「和平共處五原則」、「三個世界」的反霸思想。表面上，這樣的反霸思想企圖擺脫權力鬥爭的調性，訴諸於國際正義；但實際上，它仍是著眼於美、蘇兩大霸權對中國地緣安全造成的威脅，所以才試圖用「反霸」的旗號聯合其它發展中國家共抗美、蘇。

然而，以反霸思想包裝、實著眼於地緣權力格局的「發展中國家」的定位，經過長期地宣傳、表述，卻反過來遮蔽了「地緣權力」這一本質。尤其在冷戰期間，亞洲並不存在美蘇兩極體系下的次級體系，所以中國只要處理好與美國、蘇聯的雙邊關係，就是處理好和周邊區域的權力關係。³⁹冷戰結束後，隨著國力的上升，中共開始從被動應付外部的威脅，進一步到主動改善周邊的環境。1997 年 3 月，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的場合上宣示了「新安全觀」；同年 9 月發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中，第一次提到要重視周邊關係。2002 年的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更宣示「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台」的中國全方位外交戰略。⁴⁰自此，中共明確地將周邊區域格局視作一個整體，而這樣的思維轉變，明顯與中國國力的崛起有極大的關聯。

任何國家的外交戰略，皆是以自身所處的地緣環境作為核心部分，因為周邊

³⁷ 潘忠岐、黃仁偉，「中國的地緣政治與安全策略」，*社會科學*(北京)，2011 年第 10 期，頁 9。

³⁸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 87。

³⁹ 文正仁著，李春福譯，*中國崛起大戰略——與中國知識精英的深層對話*(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頁 106。

⁴⁰ 同前註，頁 106~107。

區域的權力格局將直接影響國家生存的基本利益。⁴¹對中國而言，其所處的地緣環境遠不如美國的地理位置單純。美國本土的鄰國僅有北邊的加拿大和南邊的墨西哥，東、西則有兩大洋作天然屏障；而中國的陸上、海上鄰國卻相當之多，尤其是美國的勢力還介入其中，區域內可說是危機四伏。⁴²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奉行服務於發展的外交戰略，亦即盡力去維護一個有利於發展的穩定環境，如此一來，中共只有竭盡所能地讓中國周邊的陸地和海洋成為保障自身安全、發展的「生命區」。⁴³當中國的國力愈趨強大，這個「生命區」的範圍也會因外在的制衡壓力而須要擴大。

當前中共認知的區域威脅，主要來源有二：一是美國和其它傳統盟國組成的反華力量，二是區域內其它大國對中國崛起可能的掣肘。冷戰結束後，美國很快就興起中國威脅論，將中國視為是另一個蘇聯，2000年911事件爆發後，中國與美國就反恐上找到了共同利益，但這並沒有消除美國對中國威脅的疑慮。2005年，美國和日本制訂了新的《美日安保條約》；2007年，日本又與澳洲簽署了《日澳安全聯合聲明》。這兩份文件被中國大陸的學者普遍視為是構成了亞洲版「北約」，即以美、日、澳為軸心的反華勢力。⁴⁴此外，美日還積極佈署飛彈防禦系統，而深受北韓核武威脅的南韓也多次考慮加入。對中共而言，這將使得南韓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的前哨基地，因此對之相當反對。大陸戰略學者朱峰就表示，飛彈防禦系統是中韓友好的「馬其諾線」，一旦南線參加飛彈防禦系，就是「把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逼到了牆角」。⁴⁵

而除了美國、日本之外，在區域內尚有俄國、印度等足以影響東亞權力格局變遷者。⁴⁶對中共而言，與俄國存在持久和全面的戰略伙伴關係，短期之內是共同利益最穩固者，較不具威脅。而中國與印度尚存有邊境領土爭議，且由於過去

⁴¹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頁 87。

⁴² 同前註，頁 91。

⁴³ 阿倫·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著，洪漫、張琳、王宇丹譯，*中美亞洲大博弈(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頁 135。

⁴⁴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頁 64~65。

⁴⁵ 文正仁著，李春福譯，*中國崛起大戰略——與中國知識精英的深層對話*，頁 136。

⁴⁶ 蔡東杰，「當前東亞霸權結構的變遷發展分析」，*全球政治評論*，2005年第9期，頁 116。

兩國間的衝突，使得印度對中國的崛起懷有戒心，採取一種周旋於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制衡策略。⁴⁷這種對中國防範的心態，也同樣存在於越南、菲律賓等國家，並都被美國利用來作為遏制中國崛起的棋子。事實上，不少東協國家都和中國在南沙群島等問題上有歷史性矛盾，因此對中國的崛起抱持疑慮。1990年代初，中國威脅論一度在東協國家間甚囂塵上，然而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中共主動提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後，東協國家開始更看重與中國的經濟利益。⁴⁸這讓中共更加察覺，如能使亞洲趨向以經濟為主體的新格局轉變，則將可有效地化解中國崛起面臨的制衡壓力。

客觀而言，亞洲區域格局既有可能向以軍事為主軸、帶有冷戰色彩的格局演變，也有可能變成後冷戰時期以經濟為重心的區域化格局，目前看來似乎還沒有定向。隨著中國國力的上升，愈來愈多國際觀察家認為中國在亞洲區域格局的轉變過程中將發揮關鍵作用，而中國自身也愈來愈有這樣的信心。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繼承鄧小平的睦鄰友好政策及江澤民的新安全觀，正式提出以「睦鄰、安鄰、富鄰」作為周邊政策的指導原則，即反應了中國將亞洲區域格局的重心往經濟利益導引的主動企圖。

二、對核心利益的捍衛

雖然在「和平崛起」的大戰略下，中共企圖將亞洲區域格局的重心往經濟利益的方向導引，但在地緣政治中仍有諸多國際爭點，被中共視為是國家核心利益的所在，必須堅決維護不可退讓。根據大陸國務院在2011年9月發佈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國的國家利益包括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⁴⁹換言之，這幾項利益串連成了一條紅線，劃定出中國必須直接掌握

⁴⁷ 關於印度對中國崛起抱持的心態，見司樂如，「印度學者對中國的安全認知」，收於陳琪、劉丰主編，*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頁301~328。

⁴⁸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頁67~68。

⁴⁹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新華網*。

的範圍。事實上，美國學者經常拿來指摘中共違背「和平崛起」的證據，即是中共對以上這些「核心利益」的捍衛，如其在南海、東海主權爭端上的強勢作為。⁵⁰然而，如從中國的立場理解，則這些本就是其國家主權的範圍，亦即中國的「國內」事務，所謂的「和平崛起」是指對外，並不能限制中國對自身內政的處置。有些西方學者懷疑中共將會在亞洲行使一套中國版的「門羅主義」，⁵¹如僅以中共在涉及主權的爭端上的表態為證，則中國根本只是在「守護家園」的層次，還達不到門羅主義那種「擴充後院」的地步。

但是，即便在道理上完全說得通，由於國際政治並不存在一個單一合法的壟斷者，因此當中國認定的核心利益不被他國肯定，進而還為之與中國發生衝突時，中國仍必須拿捏對這份利益的「捍衛」程度。理論上，所謂的核心利益同時也是中國完成和平崛起的必要條件，但若為了捍衛核心利益而提早引發各國制衡，破壞了和平崛起的機遇，則對於「和平崛起」這一戰略目標仍舊是傷害。因此，如何適度地維護核心利益，以達到其宣稱的「防禦性國防」之效，便是一門極深的戰略藝術。

國際關係學者一般認為，領土爭端是國家之間起衝突的最主要起因。⁵²雖然進入後冷戰時期的世界趨勢是以經濟利益作為國際關係的重心，但在多強林立、發展中國家集中的亞洲地區，傳統的領土主權之爭仍是焦點。從實際行為來看，中共對海上領土紛爭的態度較陸地強硬，總是強力交涉不輕言妥協，寧可等到國力較穩固後再來解決。⁵³中外學者普遍認為，這是因為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中國作為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及高度依賴資源進口的大國，必須掌握對周邊海域的控制權。相較於中國對陸地領土的基本掌握，中國的海上疆域則充斥多國勢

⁵⁰ John G.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3 (May/ June 2011), pp. 56~68.

⁵¹ Stephan M. Walt, "Dealing With a Chinese Monroe Doctrin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 2012, <<http://www.nytimes.com/roomfordebate/2012/05/02/are-we-headed-for-a-cold-war-with-china/dealing-with-a-chinese-monroe-doctrine>> (Accessed Mar. 28 2013).

⁵² 卜睿哲(Richard C. Bush), *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台北：遠流，2012)，頁 84。

⁵³ 同前註。

力，且由於現行國際海洋法在海上主權的認定上有許多未定之處，使得宣稱「和平崛起」的中國仍無法避免因海疆問題而與他國發生衝突。

綜觀近年來中共在區域內的核心衝突點，主要有南海、釣魚台列嶼和台灣，這三者皆與海疆有密切關聯，且都蘊含複雜的歷史糾葛。尤其是後兩者，更牽動中日恩怨、中美權鬥及國共內戰的記憶。

（一）南海

中國要建立出一個自身發展需要的安全區，就一定得走向海洋；而要成功地走進海洋，南海便是唯一的出路。中國大陸的決策者很清楚，以當前的區域格局來看，東海已有極為牢固的美、日、韓同盟，作為世界唯一超強的美國守在這裡，中國很難突破。而中國的西南面則是印度洋，這裡無庸置疑是印度認知的勢力範圍，中國亦不容易掌握。因此，中國要成為海洋國家，南海就成了唯一的出口。

2010 年下半年左右，西方媒體發出了消息，指大陸官方宣布將南海視為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然而，大陸的一些戰略學者立即就澄清說，這樣的說法並非官方正式的表態，只是大陸官員和美國官員在私下的閉門會議中提及的一句話，且原文說的是南海「涉及」而非「是」中國的核心利益。⁵⁴即便如此，許多關心中國戰略的人士皆已將南海視為是中國的「生命線」。⁵⁵2012 年中國與菲律賓就黃岩島發生對峙衝突後，中共的官方媒體及官方相關人士開始放出將南海視為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消息，不過至今仍未得到正式的定調。⁵⁶

事實上，南海主權爭端是極其複雜的歷史問題，且爭端國幾乎都是東協國家。中共一貫的立場是，希望南海問題優先以雙邊外交處理，避免多邊協商，更

⁵⁴ 「少將：『南海是中國核心利益』非官方表態」，中國評論新聞，2010 年 10 月 12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7/2/1/10147217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47217>〉(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專家稱『中國將南海升級為核心利益』提法極不明智」，人民網，2010 年 8 月 24 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2531874.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⁵⁵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頁 82。

⁵⁶ 「劉賜貴：維護中國在南海的權益事關國家核心利益」，*華夏經緯網*，2012 年 10 月 26 日，〈<http://big5.huaxia.com/xw/dlxw/2012/10/3054997.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反對將南海問題國際化。⁵⁷然而，在中國既不要「多邊」又反對「國際化」的情況下，南海情勢的演變就愈來愈趨向「大國政治化」，亦即美國的介入。因此，中共在 2002 年與涉及南海爭端的東協十國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承諾以聯合國憲章、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平共處五原則等國際法來解決南海爭端，但成效不高。⁵⁸近年來，隨著美國宣佈並實行「重返亞洲」策略，⁵⁹一些親美的東協國家開始利用東協區域論壇的場合逼迫中國將南海問題放入議程，也就是使南海問題國際化，對中國造成了極大的壓力。⁶⁰

2012 年 4 月，菲律賓海軍護衛艦企圖逮捕在黃岩島海域捕魚的中國漁船，而與中國大陸國家海洋局派出護漁的海監船、漁政船對峙。直到 2013 年 1 月，菲律賓官方承認中國實質控制黃岩島，但仍堅持要將黃岩島爭端送交聯合國仲裁。⁶¹大陸官方媒體評論稱，菲律賓之所以在這次事件中態度強硬，主要是因為菲律賓總統有意藉此轉移國內民意對政府的不信任壓力，以及「重返亞洲」的美國在後面撐腰。⁶²在中國看來，菲律賓顯然想藉由美國制衡中國的需要及中國忌

⁵⁷ 「外交部：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多邊化、擴大化」，*鳳凰網*，2010 年 9 月 21 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9/21/2602293_0.s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⁵⁸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b_602314/zjzg_602420/yzs_602430/dqzz_602434/nanhai_602576/t848051.s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⁵⁹ 2008 年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後，開始調整小布希時期過度重視反恐的外交戰略，於 2009 年由其國務卿希拉蕊首度宣示了「重返亞洲」(return to Asia)，後於 2011 年在說辭上調整為「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又在最近改成「亞洲再平衡」(rebalance toward Asia)。中外觀察家普遍認為，雖然修辭有所改變，但皆是以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為戰略目標。見「『再平衡戰略』能否更加平衡」，*華夏經緯網*，2013 年 3 月 14 日，

〈<http://hk.huaxia.com/thjq/jszw/2013/03/3247864.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張登及：美重返亞洲 離岸制衡中國」，*中國評論新聞*，2012 年 11 月 27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3/1/8/4/102318431.html?coluid=5&kindid=23&docid=102318431&mdate=1127111922>〉(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Kenneth Lieberthal,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 *Foreign Policy*, Dec. 21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2/21/the_american_pivot_to_asia〉(Accessed Mar. 28 2013); Robert S. Ross,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 *Foreign Affairs*, Nov./Dec. 2012, pp. 70~82.

⁶⁰ 吳明彥，「美中較勁下之東亞峰會」，*國政基金會*，2012 年 11 月 28 日，〈<http://www.npf.org.tw/post/3/11687>〉(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⁶¹ 關於中菲 2012 年黃岩島對峙爭端始末，詳見「中國漁船黃岩島遭菲軍艦侵擾」，*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8221/72028/242209/>〉(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⁶² 「菲律賓在中國黃岩島海域製造事端」，*央視網*，〈<http://big5.cctv.com/gate/big5/news.cntv.cn/special/zfjcnhhyddz/shouye/index.s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憚美國介入的心理，壓制中國的氣燄。

準此，「大國政治化」將是南海問題演變的方向。最新的消息是，歐巴馬已表態將在今年 10 月登場的東亞高峰會上再談南海問題。⁶³美國聲稱其用意是在促進區域衝突和平解決，對主權歸屬不持特定立場，但看在中國眼裡，顯然不是這麼一回事。

（二）釣魚台列嶼

無獨有偶，就在中菲黃岩島對峙發生的同時，日本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提出了要以東京都名義「購買」釣魚台列嶼之議。幾個月後的 8 月 15 日，即二次大戰日本投降的紀念日，香港的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台，插上了代表兩岸中國政權的五星紅旗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⁶⁴9 月 11 日，日本內閣宣布將釣魚台「國有化」，並向中共解釋，此乃避免讓東京都「買下」釣魚台後會採取更激進的行為，是對中國的「善意」。⁶⁵

1972 年，美國宣佈將二戰以來代聯合國執行託管的琉球行政權歸還給日本，當中同時含蓋了釣魚台，釣魚台主權之爭由此引爆。雖然釣魚台的地理價值主要得自於聯合國 1968 年指出釣魚台海域蘊藏大量石油的報告，但釣魚台對中國人的意義，始終是民族尊嚴大過於能源利益。⁶⁶追本溯源，釣魚台落入日本之手即因為中國甲午戰敗，而之所以在二戰結束後仍無法光復，則是因為國共內戰、中國由兩個政權隔海分治所致。70 年代中國人的保釣運動即在美國發起，

⁶³ 「奧巴馬要在東亞峰會插手南海」，新華網，2013 年 3 月 14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14/c_124455829.htm〉（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⁶⁴ 「豪勇 7 壯士登釣島 共插兩岸國旗」，中時電子報，2012 年 8 月 16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1741/112012081600079.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⁶⁵ 「野田稱『購買釣魚島』為維持穩定管理 望中方理解」，鳳凰網，2012 年 9 月 8 日，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diaoyudaozhengduan/content-3/detail_2012_09/08/17454385_0.s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⁶⁶ 聯合國報告指稱，釣魚台周邊海域的大陸礁層可能有一百億至一可千億桶的石油。見卜睿哲 (Richard C. Bush)，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 (*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頁 91。

最後卻因分裂成左右兩派而功敗垂成。⁶⁷90年代日本右翼份子在釣魚台建燈塔，一度又再激起大陸、香港、台灣三地中國人的抗爭。釣魚台對中國人來說，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是否真正走出恥辱、走向復興的標誌。

由石原慎太郎發起的「購島」行動，有其國內政治的背景，主要是欲藉此贏得在日本的人氣。⁶⁸但是在日本內閣宣佈「國有化」之後，中共官方立即就定調這是對現狀的破壞，並正式發表聲明，稱這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公然否定」、「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嚴重挑戰」。⁶⁹大陸學者也認為，日本在「國有化」的招牌下，有著更深遠的陰謀。呂耀東認為，日本在國家發展戰略方面近年來已發生了很大變化，追求政治軍事大國化目標日趨明確。⁷⁰王曉鵬指出，日本此舉最終的目的是要推翻二戰對日的處理結果，擺脫戰敗國地位，成為「正常國家」。⁷¹馮昭奎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日本乃藉釣魚島問題刺激中國，打亂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部署。⁷²

弔詭的是，其實日本所破壞的「現狀」，更多是法理層面的意涵，因為日本實質控制釣魚台已有多多年。然而中國正好藉日本此舉，得到一個「調整現狀」的正當性理由，派出海監船定期巡航。而美國則在當中扮演真正決定大局的「影武者」，其一方面向中國允諾不會介入主權爭端，⁷³一方面又向日本表示釣魚台屬於美日安保的範圍，「反對以威嚇或片面步驟來威脅這個地區的穩定」。⁷⁴

⁶⁷ 有關 70 年代保釣運動的興衰及左右兩派的對立，見任孝琦，**有愛無悔：保釣風雲與愛盟故事**（台北：風雲時代，1997）。

⁶⁸ 時殷弘，「日本『購島』緣於其國內政治競選大背景」，**中國青年網**，2012 年 9 月 17 日，〈http://d.youth.cn/shrgh/201209/t20120917_2444413.htm〉（瀏覽日期：2012 年 9 月 17 日）。

⁶⁹ 「中國外交部就日本宣佈『購島』發表聲明（全文）」，**新華網**，2012 年 9 月 1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9/10/c_113026288.htm〉（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⁷⁰ 呂耀東，「日本攫取釣魚島圖謀不會得逞」，**瞭望**（北京），2012 年第 38 期，頁 14~15。

⁷¹ 王曉鵬，「日本到底要在釣魚島釣什麼『魚』」，**人民網**，2012 年 9 月 10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0910/c1002-18969321.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⁷² 「馮昭奎：日本最怕中國和平崛起 圖謀打亂中國戰略部署」，**人民網**，2012 年 9 月 14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0914/c159300-19013754.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⁷³ 「美國防部長會習近平 盼滅火」，**中時電子報**，2012 年 9 月 20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3/122012092000173.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⁷⁴ 「美挺安倍：反對威脅區域穩定」，**自由電子報**，2012 年 2 月 23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feb/23/today-t2.htm>〉（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無庸置疑，中國真正忌憚的是日本後面的美國。周永生即坦率地指出，中國的軍力還沒有強大到可以和美日聯軍作戰的程度，「等十年以後中國強大了，自然會隨意拿回釣魚島。」⁷⁵而目前可以確定的是，伴隨中國國力的上升，對釣魚台「擱置爭議」的忍耐程度正在降低，藉由日本的主動生釁，中國反而對釣魚台成功地達到戰略突破。

(三) 台灣

90 年代之初，冷戰剛剛結束之際，大陸學者王逸舟在評估中國周邊區域的安全性時，將焦點放在日本、朝鮮半島、中亞等地，而台灣「民進黨等台獨勢力的崛起」及香港人民抗拒回歸的心態，則僅被當成是可能影響中國外交的難題。⁷⁶然而，當 1995~1996 年間發生台海危機後，大陸學界逐漸將台灣視為是牽動中國安全的關鍵。改革開放後的中共第一次與美國瀕臨軍事衝突因台灣而起，這使得大陸學者開始調整對台灣在中國外交戰略中的重要性評估。從法理上看，台灣當屬於中國主權下的內戰遺留問題，但在政治層面，台灣問題必然與國際關係牽連。隨著中國國力的持續上升，各種主動改善周邊環境的戰略討論開始浮現，而台灣也開始被大陸學者納入中國安全利益中的重要環節。

第一個開啟中國崛起議題的大陸學者閻學通，在 1996 年時就將台獨勢力視為對中國戰略利益的重大威脅，而一旦台灣海峽開打，中國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和平環境將受到嚴重破壞。⁷⁷2000 年台灣舉行總統大選前夕，學者時殷弘也將台灣納入中國重大安全利益的範圍，並指出對台灣必須以軍事壓力及政治、外交手段雙管齊下，才能迫使台灣堅守「一個中國」主權，進而認真談判統一。⁷⁸2003~2004 年陳水扁大搞「公投制憲」的那段時間，台獨成為了中國是否能「和平崛起」的一大挑戰，中共中央黨校發行的刊物即宣稱：雖然「和平崛起」是對

⁷⁵ 「日本政府一意孤行意欲何為？」，**中國評論新聞**，2012 年 9 月 14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2/3/3/1/102233139.html?coluid=4&kindid=20&docid=102233139&mdate=0914092254>) (瀏覽日期：2013 年 3 月 28 日)。

⁷⁶ 王逸舟，「中國國家安全環境」，**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1993 年第 6 期，頁 34~37。

⁷⁷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 154~160，172~178。

⁷⁸ 時殷弘，「關於台灣的幾個必須正視的大戰略問題」，**戰略與管理**(北京)，2002 年 3~4 月，頁 27~32。

外不搞侵略擴張，但如果有任何國家以武力干涉中國的國家統一，那就是破壞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的和平崛起之路必須以國家統一為前提，以武力手段解決台灣問題與和平崛起之間並不矛盾。」⁷⁹

準此，按中共的思路邏輯，台灣獨立將使得中國的崛起化為泡影，但為了台獨問題在台海開戰，也會嚴重破壞中國崛起需要的環境。面對這樣的困局，中共的策略就是儘可能地爭取兩岸和平統一，避免情勢惡化到武力統一的地步。客觀來看，唯一可能以軍事介入台灣問題的就是美國，這來自於美國國內《台灣關係法》對美國必須提供台灣安全援助的要求，以及美國長期對台的軍售。在1995~1996年的這場台海危機中，美國和中共雙方實際上都展示了在台灣問題上容許的底線——美國要求台灣問題必須以和平手段解決，中共藉由高度自制的飛彈演習表達反對台獨的堅決立場。⁸⁰中共後來在2005年頒布的《反分裂國家法》，更直接以法律條文界定中國在台灣問題上使用非和平手段的條件。⁸¹

在發覺可能和美國因台灣發生衝突後，大陸學者除了強調台灣問題對國家主權完整性的重要性，更從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國際格局角度評析台灣的戰略地位。地緣學者張文木指出：「台灣是中國進入太平洋的門戶，是日本南下必經之途。控制一個與中國分離的台灣，美國就可北遏制日本、南威懾東盟、西可堵截中國。從美國的亞太地緣政治需求來看，使台灣、南沙、甚至西藏地區與中國事實分裂，符合美國與其盟國繼續稱霸世界的長遠戰略」。張並指出：「中國在台灣問題上與西方國家的鬥爭，不僅僅是中國為維護自身主權的鬥爭，還是中國為維護自身發展權的鬥爭」⁸²中共軍方的戰略家也認為：「如果台灣脫離中國，不僅我們天然的海上防衛系統會失去縱深、海上門戶對外洞開，一大片的海域亦將落入他國手

⁷⁹ 陳先奎、辛向陽，「中國崛起是否可能」，*學習時報*，2004年3月25日，
(<http://www.studytimes.com.cn/chinese/zhuanti/xxsb/648323.htm>) (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⁸⁰ 張廖年仲，「從1995~96年台海危機論冷戰後中共的安全政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6卷第2期(2005年4月)，頁212。

⁸¹ 長年研究兩岸關係的台灣學者邵宗海，認為中共實際上是透過反分裂國家法列出對台使用非和平手段的條件，為海峽兩岸提供了一種安全閥。見邵宗海，*兩岸關係*(台北：五南出版，2007)，頁253~256。

⁸² 張文木，*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頁72~73。

中。」⁸³

當然，和釣魚台一樣，台灣本身就凝結了中國近代史上外國勢力入侵及國共內戰的愛恨情仇，成為中國是否真正終結百年國恥的標的。某個程度來說，釣魚台爭端的解決也有賴於兩岸的合作乃至統一。如果中共無法有效壓制台獨勢力，將無法安撫廣大人民的民族情感，進而危及其自身的統治基礎，而這同樣也是中共聲稱的國家核心利益。

2005年，美國和日本修訂新的《美日安保條約》，將台灣海峽納入安保的範圍，這對中共又是一大挑戰。⁸⁴觀察家據此指出，美國涉台軍事政策已成為中美戰略互信的「總開關」。⁸⁵不過，同樣也就在此時，中、美兩國成功地透過外交手段聯合壓制了台獨氣焰。⁸⁶和其引導區域格局往經濟重心發展的作法相似，中共也成功地在經濟上「統合」台灣。⁸⁷以當前趨勢來看，法理台獨已不可能發生，台灣雖很難在短時間內和大陸展開統一談判，但經濟上與大陸的統合正在快速進行。只要台灣不偏離「一個中國」的法理主權，對中共來說，兩岸治權的統一終將水到渠成。

第三節 東亞稱雄與美國霸權

一、東亞稱雄的目標

中國國民黨尚有效統治中國大陸之時，其所採用的中華民國國旗歌，歌詞中即有「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世胄，東亞稱雄」的字句，充分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定位及期待。相對於日本自許的「脫亞入歐」或藉由侵略鄰國以

⁸³ 卜睿哲(Richard C. Bush)，*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頁 105。

⁸⁴ 尹懷哲，「綜合分析美日安保共同戰略目標對台灣的影響」，*海峽評論*，2005年4月號(總 172 期)。

⁸⁵ 陳之涯，「塑造中美軍事關係」，收於理查德·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顧國良主編，*力量與克制：中美關係的共同願景(Power and Restraint: A Shared Vision for the U.S. – China Relationship)*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0)，頁 63。

⁸⁶ 「先驅評論：中國『聯美制獨』的深意」，*人民網*，2007年12月11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42969/58520/6637251.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9日)。

⁸⁷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頁 102。

達成的「大東亞共榮圈」，中國知識分子認知的「東亞稱雄」，則更像是由中國領導東亞各國一起崛起，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孫中山就指出，日本本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卻淪為西方霸道的應犬。⁸⁸中共改革開放後，在論述上也頗與此種「東亞稱雄」的思維契合，如鄧小平所提之「國際新秩序」及胡錦濤「和平崛起」戰略中對於亞洲崛起的憧憬，皆透露出中國這種「扶弱濟傾」的抱負。

但是，在西方觀察家的眼裡，中國這種「東亞稱雄」的志向，正成為了中國威脅論的證據。美國學者安德森(Eric C. Anderson)認為，中國自古自許為「居天地之中」的中央大國，這種歷史決定的抱負將驅動中國在區域內取得支配性的地位。⁸⁹另一位美國學者阿倫·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也認為，中國在歷史上一直作為東亞文明的中心，只是在近期承受了列強欺侮的恥辱，如今則正在重返其曾經擁有的區域霸權地位。⁹⁰也就是說，中國即便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沒有和美國爭奪「世界超強」的打算，但卻開始在東亞追求成為區域霸權。

從中國現實的作為來看，近年來積極提倡與東協國家的合作機制，成立上海合作組織，並在攸關核心利益的周邊事務上積極捍衛，似乎的確有在東亞爭取領導地位的意圖。1997年，東協與中、日、韓三國的自由貿易區機制(10+3)被建立起來，之後的1998年，時任韓國總統的金大中便提議設立「東亞展望小組」促進區域合作。⁹¹中國派代表參加了「東亞展望小組」，並認同該小組於2001年發表的報告中提出的「東亞共同體」概念。在中國看來，「東亞共同體」應該在“10+3”的基礎上，再加入北韓、蒙古，形成由東亞十五個國家組成的區域組織。⁹²後來，中國將這樣的構想轉化成「東亞高峰會」的倡議，但隨即遭到擔心中國主導東亞區域整合的日本反對，日本提出要再加入印度、澳洲及紐西蘭，而中國做出了妥

⁸⁸ 梁肅戎，「孫中山與日本及其對日的忠告」，*海峽評論*，2000年3月號，
(<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111-3544.html>) (瀏覽日期：2013年3月29日)。

⁸⁹ 埃里克·安德森(Eric C. Anderson)著，葛雪蕾、洪漫、李莎譯，*中國預言：2020年及以後的中央王國(China Restored: The Middle Kingdom Looks to 2020 and Beyond)*(北京：新華出版社，2011)，頁1~6

⁹⁰ 阿倫·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著，洪漫、張琳、王宇丹譯，*中美亞洲大博弈(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頁133。

⁹¹ 張鐵軍，「中國與東亞共同體建購」，*東北亞論壇*(吉林)，第15卷第2期(2006年3月)，頁40。

⁹² 文正仁著，李春福譯，*中國崛起大戰略——與中國知識精英的深層對話*，頁109。

協。⁹³2008年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後，認知到反恐這種非傳統安全問題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遂調整911事件後以反恐為重的國際戰略，將重心移回西太平洋這一美國傳統安全的中心，也就是「重返亞洲」。此後，美國也順利加入到東亞高峰會。⁹⁴

大陸學者對「是否接受美國為東亞共同體的一員」有不同的意見。曾參加「東亞展望」小組、提出「東亞共同體」願景的大陸學者張蘊嶺主張，東亞區域已經存在許多對其它區域開放的機制，並沒有排斥美國的加入，但美國也不必什麼都要參與，不應該成為東亞共同體的成員。張蘊嶺並指出，既然美國已加入東亞高峰會，那麼這個機制就不應該再拿來推動東亞共同體。⁹⁵然而，賈慶國則認為，基於現實來說，沒有美國是不可能成功建構東亞共同體的，日本、韓國必會反對，東南亞國家也會認為美國的加入有利於他們的利益。賈慶國並指出：「讓美國加入東亞共同體，未必是件壞事。她在裡邊，就不會在外邊製造麻煩。」⁹⁶

從中國的實際作為來看，中國對待東亞區域格局的態度，應該更傾向於張蘊嶺所言，亦即雖不求將美國的勢力趕出東亞，但努力地從經濟、軍事各層面播下區域內新制度的種子。⁹⁷因此，對於有美國參與的區域機制，中國亟力想淡化其區域主義的色彩。比如說，美國及其盟友一直提出以東亞高峰會的機制解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南海主權爭端，中國對此就堅決反對。⁹⁸可以說，中國的意圖還不到要成為東亞區域霸主的地步，但已在強力爭取在東亞事務中能與美國相抗衡的主導權。

美國攻勢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認為，國際關係不變的定律，就是現有霸

⁹³ 同前註。

⁹⁴ 「美俄首次參加東亞峰會引關注 美國擴大亞洲足跡」，人民網，2011年11月16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278/16270357.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9日)。

⁹⁵ 文正仁著，李春福譯，*中國崛起大戰略——與中國知識精英的深層對話*，頁121。

⁹⁶ 同前註，頁185。

⁹⁷ 阿倫·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著，洪漫、張琳、王宇丹譯，*中美亞洲大博弈(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頁139。

⁹⁸ 「中國反對東亞峰會談南海」，新華網，2011年11月17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1/17/c_122292867.htm〉(瀏覽日期：2013年4月22日)。

權絕不會允許任一區域內亦產生一個單一霸權，一旦世界上同時出現兩個以上的區域霸權，那麼就必然引發霸權爭奪的衝突。根據米爾斯海默的定義，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區域霸權，而中國爭取成為東亞霸權的企圖，就成了中國威脅論的證據。⁹⁹為了平息中國威脅論，中共多次強調，中國並不謀求東亞事務的領導地位，而且支持東協在東亞高峰會中扮演主導角色。¹⁰⁰新加坡學者鄭永年也認為，不宜過份強調中國在東亞區域格局中的作用，東亞區域格局的最大特色就是同時存在多個大國，東亞並不存在一個能夠主導區域局勢的大國。¹⁰¹

但是，如同前面第二節中所述，中國和美國在東亞存在許多核心利益上的矛盾，美國憑藉其世界超強的地位，實際仍主導著東亞區域事務，包含涉及中國主權的問題。解放軍學者劉明福認為，米爾斯海默以美國的霸權心態揣度中國雖不符現實，但這也給了中國追求和平崛起的啟示，那就是「要強大，才有安全；要想安全，就要強大」。¹⁰²也就是說，中國雖承諾自己崛起後不會成為壟斷國際事務的霸權國家，但卻不能使當前位居超強的美國不會這麼做，尤其是侵害到中國的核心利益，進而破壞中國崛起的需要。因此，中國唯一能做的就是提升自己的國力，以做好預防美國的準備。

「中國在韜光養晦發展綜合國力的同時會做什麼？中國強大到足以拋開謙遜，成為真正強國時將會追求什麼？」阿倫·弗里德伯格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戰略提出這樣的問題。¹⁰³對此，大陸官方及學者制式的回應，就是中國仍將重點放在自身的發展，無暇顧及這些進一步的事務。不過，如果從客觀的現狀來看，東亞區域的權力格局應是最符合中共所稱的「多極化」的地方，「東亞沒有變成以中國為中心的地區，但是變成了一個中國的利益和影響不能夠被忽視的地區。」

⁹⁹ 阿倫·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著，洪漫、張琳、王宇丹譯，*中美亞洲大博弈(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頁 133。

¹⁰⁰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 69。

¹⁰¹ 同前註，頁 62。

¹⁰² 劉明福，*中國夢*(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頁 244。

¹⁰³ 阿倫·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著，洪漫、張琳、王宇丹譯，*中美亞洲大博弈(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頁 127。

¹⁰⁴美國學者藍普頓(David Lampton)認為，中國將會走一條「中短期沒有衝突的道路」，進而成為「世界的一股重要力量」。¹⁰⁵目前看來，這一條「中短期沒有衝突的道路」應至少維持到 2020 年，也就是多數觀察家預言中國經濟總體達到世界第一，以及中共自己期許「達到全面小康社會」的時間點。在這個階段，中國應會將重心擺在東亞，全力削弱美國在東亞的霸權。

大陸學者時殷弘表達了與藍普頓類似的想法，並更直白地說，中國應當順應當前東亞明顯的多極化態勢，在東亞確立自己的地位，以求在政治、軍事、外交和經濟方向發揮更強和更勝一籌的影響力。門洪華也認為，中國取得區域優勢地位至關重要，這也是實現更大目標的手段。¹⁰⁶

關鍵的問題就在，這種在區域的「優勢地位」，和西方世界所理解的區域「霸權」是否一樣。根據大陸官方的論述，中國並不爭取在東亞排他的主導地位，而是多個主導力量之一；即便如劉明福及閻學通這樣被歸為鷹派的學者，雖主張中國要爭取在東亞的主導地位，但也強調中國將實行「王道」而非美國的「霸道」。¹⁰⁷因此，中國並不認為自己要成為區域霸權。從實踐上看，為了保持獨立於美國的主導性，中國正努力經營排除美國的區域機制。可以說，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是大原則，而在這個大原則下，要將不可退讓的核心利益涵蓋到多大的範圍，則大陸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能確信的共識是：中國必須成為美國之外區域內的權力最高位者，這是中國核心利益免於被侵害，其崛起基礎得以被奠定的必要條件。

二、中美戰略的矛盾

如今看來，中國要在世界的層次改變美國一超壟斷的局面是肯定的，但是否

¹⁰⁴ David M. Lampton, "China's Rise in Asia Need not Be at America's Expense," in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 ed. David Shambaug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 306.

¹⁰⁵ 阿倫·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著，洪漫、張琳、王宇丹譯，*中美亞洲大博弈(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頁 127。

¹⁰⁶ 同前註，頁 136。

¹⁰⁷ 劉明福，*中國夢*，頁 128~129；文正仁著，李春福譯，*中國崛起大戰略——與中國知識精英的深層對話*，頁 21~25。

是自己取而代之，或者希望變成怎樣的格局，則尚不在中國的戰略考量之內。相對地，中國在區域層次的戰略就比較明顯，中國希望成為區域內（不含美國）的權力最高位者，以捍衛自己的核心利益，確保崛起的必要條件。準此，無論是在世界或者區域的層次，美國都是中國戰略的最大阻礙。

美國學者傅高義(Ezra F. Vogel)曾總結出中美兩國之間的十大矛盾：台灣問題、西藏問題、南海問題、經濟問題、多邊問題和國際組織問題、對亞洲潛在威脅的看法、戰略聯盟問題、武器擴散問題、人權問題和環境問題。¹⁰⁸可以說，這些都是中美之間的具體矛盾。然而如果我們從宏觀的視角看，則這些矛盾擺在一起，正說明了中美之間的矛盾是結構性、根本性的。因為，中美之間的矛盾直接涉及了中國認知的核心利益及發展需要。比較悲觀的想法，則如攻勢現實主義理論，認為霸權國和崛起國必然有利益衝突，且這種衝突是零和、不可避免的。¹⁰⁹

中共官方為規避制衡、降低國際上中國威脅論的論調，一直亟力反駁這種悲觀的說法。中共主要的論述是，自己不是傳統的崛起國，而是堅持永遠不稱霸、透過自身發展在全球化時代「和平崛起」的國家。但是，雙方看待彼此似乎都缺少信任。從中國的角度看，美國冷戰後的對華政策有很強的連貫性，那就是要制衡中國的崛起。箇中的原因，一部分是客觀唯物的力量所致，另一部分則是美國意識型態上對中國的偏見。¹¹⁰大陸學者王緝思認為，美國深信其價值觀是普世的，她並根據這種價值觀建立以全世界為範圍的戰略。¹¹¹換言之，美國始終認為自己的戰略定位是「維持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歐巴馬總統在最近公佈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中，亦繼續延續這樣的宣示。¹¹²

¹⁰⁸ 劉明福，**中國夢**，頁 41。

¹⁰⁹ John J. Mearsheimer,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06, pp. 160~162

¹¹⁰ 阿倫·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著，洪漫、張琳、王宇丹譯，**中美亞洲大博弈**(*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頁 108~109。

¹¹¹ 王緝思，「美國霸權的邏輯」，**美國研究**(北京)，2003 年第 3 期，頁 7~29。

¹¹² "Obama Touts 'Renewal' of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on His Watch," *CNSNews.com*, Jan. 25 2012, <<http://cnsnews.com/news/article/obama-touts-renewal-american-global-leadership-his-watch>> (Accessed Apr. 7 2013);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 6 2012,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us/20120106-PENTAGON.PDF>> (Accessed Apr. 7 2013).

美國要維持自身的領導地位，何以在中國眼中成為根本性的矛盾？是因為中國也想爭領導地位嗎？對此，基於中共官方「絕不稱霸」的定調，大陸學者多以為：不是中國要與美國爭霸，而是美國主觀地認定中國將挑戰美國，必然會對中國與以壓制；且美國深信唯有中國完全接受美國的意識型態，才能保證中國不成為威脅。準此，美國的戰略定位將不可避免地侵害中國認知的核心利益。

中美之間的戰略矛盾，實際上是建立在這樣的世界格局上：美國於冷戰後確立超強地位，中國的相對實力急遽上升。¹¹³一直到 20 世紀的尾聲，中國的決策者及學者普遍認知到，80 年代所期待的多極化並沒有實現，世界格局實際上是一超多強。然而，究竟美國這個「一超」是不是霸權，其霸權的性質為何，則各方有不同說法。1999 年，中美因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關係惡化，由江澤民領導的中共在國內發起了一場大辯論，以世界趨勢究竟仍是「和平與發展」抑或「霸權與大國政治」為辯論主題。最後，由中共定調的結論是：「和平與發展」仍是主要趨勢，但「霸權與大國政治」的勢力確實上升，且美國的霸權性也在提高。¹¹⁴

目前來說，中美雙方對彼此都多有疑懼。大陸解放軍學者劉明福認為，正因為世界太重要了，所以不能交給美國；¹¹⁵而美國學者阿倫·弗里德伯格竟也有同樣的表述，只是將「美國」改成了中國，即「因為世界太重要了，所以不能交給中國」。¹¹⁶中共認為美國的霸權主義令人不安，而美國則認為中共的意識型態充滿威脅。如此看來，中美之間的矛盾似乎是無法化解了。不過，如果我們仔細思考，則這樣的疑慮其實是建立在對於對方威脅的認知。換句話說，至少這類的思維不像攻勢現實主義或權力轉移論那樣認定中美的衝突是客觀唯物的，而是將中美衝突的根源指向意志導向的。

¹¹³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頁 49~59。

¹¹⁴ 卜睿哲(Richard C. Bush)，*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頁 250。

¹¹⁵ 劉明福，*中國夢*，頁 140。

¹¹⁶ 阿倫·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著，洪漫、張琳、王宇丹譯，*中美亞洲大博弈(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頁 154~164。

美國已有不少學者認為，中美之間的矛盾雖是根本性的，但只要美國不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中美之間就能達成妥協；中國的威脅並不是客觀唯物的，其實際上是決定於中國對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的滿意程度。¹¹⁷對中國來說，雖然對美國的霸權主義領導不滿，但鑒於現實權力條件的限制，似乎也只對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矛盾表達強硬反抗。多位學者指出，台灣是影響中美戰略矛盾的關鍵。¹¹⁸

三、中美共治的前景

90年代中期，柯林頓就曾經將對華政策從「遏制」調整為「接觸」，企圖以漸進引導的方式使中共融入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裡，同時追求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¹¹⁹2008年歐巴馬執政後，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及中國經濟地位的再上升，美國政府再次宣示和中國建立「共同應對挑戰的夥伴關係」，而其國內學界也不斷出現“Chimerica”(中美國)、“G2”(兩國集團)等新概念來形容中美關係。¹²⁰中美是否能共同治理國際事務，進而消弭矛盾呢？

中共官方對這類中美共治的說法是反對的。從道德面來講，中共認為這會給人一種中美兩國共同壟斷國際事務的感覺，與其一貫主張的反霸、促進國際政治民主化的立場不符。¹²¹從現實權力面來講，美國仍是世界的超強，看似平起平坐的“G2”實際上成為美國約束中國行為的工具，逼使中國在此機制下「有責無

¹¹⁷ John G.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3 (May/ June 2011), pp. 56-68; Alastair Iain Johns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Issue 4 (Spring 2003), p. 5; 羅納德·塔門(Ronald L. Tammen)、亞采克·庫格勒(Jacek Kugler), 「權力轉移與中美衝突」, 收於陳琪、劉丰主編, **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 頁 451。

¹¹⁸ 陳之涯, 「塑造中美軍事關係」, 收於理查德·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顧國良主編, **力量與克制：中美關係的共同願景**(*Power and Restraint: A Shared Vision for the U.S. – China Relationship*), 頁 63; 羅納德·塔門(Ronald L. Tammen)、亞采克·庫格勒(Jacek Kugler), 「權力轉移與中美衝突」, 收於陳琪、劉丰主編, **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 頁 452。

¹¹⁹ 藍普頓(David M. Lampton)著, 許秋楓譯, **同床異夢**(*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3), 頁 43。

¹²⁰ Niall Ferguson, “‘Chimerica’ is Headed for Divorce,” *Newsweek*, Volume 154, 2009 (9); 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7, 2008(4).

¹²¹ 「溫家寶批駁『中美 G2 共治全球』: 毫無根據」, **中國評論新聞**, 2009 年 5 月 21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7/5/3/10097533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975339>> (瀏覽日期: 2013 年 4 月 7 日)。

權」。¹²²偏向保守派的意見更認為，不管是「搭便車」或者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 (Hillary Clinton) 曾提出的中美「同舟共濟」，中國都只是「副駕駛」，反而還幫助美國穩固其「舵手地位」。¹²³

因為雙方都對彼此不信任，因此主動權歸誰就成了中美合作時各自最在意的問題。前面提到過，中國為化解周邊區域內的壓力，亟力地想將區域格局的重心往經濟方向驅動，這樣的策略不僅被中共應用在兩岸關係的處理，同樣也是其對美戰略的思維。面對美國超強的實力，中國應該主動地爭取美國一起在經濟上加深合作，而防止中美關係的重心滑向軍事競爭。¹²⁴不過，站在美國的立場，美國同樣希望主動引導中國承擔國際責任，進而改變中國到認同美國價值的程度。¹²⁵

在共同管理區域安全事務上，中美兩國似乎找到了共同合作的需要。中國須要為區域安全多負起責任，降低美國「安全困境」的感覺，以免其更加偏向於制衡中國；而美國也需要中國協助共同處理，避免引發衝突。2012 年至 2013 年春夏之交這段時間，中美接連走過了「三大坎」——南海爭端、釣魚台爭端、北韓核武危機，這些正好都是區域內足以牽動中美戰略格局的國際熱點，且前兩者還涉及中國的主權利益。可以說，中國再這三個事件中都与美國取得一定的諒解，尤其在北韓核武問題上和美國站到了一起，同意對北韓採取較為強硬的措施。¹²⁶事實上，當 2007~2008 年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陳水扁大搞「入聯公投」時，中共便成功地「聯美制獨」，透過與美國的協商保障自身的核心利益。¹²⁷

目前看來，“G2”要制度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過若從權力結構的角度

¹²²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頁 87。

¹²³ 劉明福，*中國夢*，頁 202。

¹²⁴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頁 103。

¹²⁵ John G.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3 (May/ June 2011), pp. 56-68; Alastair Iain Johns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Issue 4 (Spring 2003), p. 5; 羅納德·塔門(Ronald L. Tammen)、亞采克·庫格勒(Jacek Kugler), 「權力轉移與中美衝突」, 收於陳琪、劉丰主編, *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 頁 459。

¹²⁶ 2013 年 3 月 7 日，中國支持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核武問題做出必要、適度的反應，見「安理會通過最嚴厲制裁朝鮮決議 中國投贊成票」, *北京新浪網*, 2013 年 3 月 7 日, <<http://dailynews.sina.com/bg/chn/chnmilitary/sinacn/20130307/15334318840.html>>(瀏覽日期: 2013 年 4 月 9 日)。

¹²⁷ 「先驅評論：中國『聯美制獨』的深意」, *人民網*。

來看，則“G2”實際也反應了當今世界格局中利益與衝突皆日益加深的超級強國與強國。¹²⁸中國不想被“G2”限制了自主性，但中國仍可透過其它的多邊機制發展與美國的關係。最重要的是，在東亞區域的安全事務上，一種由中美共同協商的處理機制已逐漸形成了。

第四節 小結

——自冷戰末期以來，「多極化」便是中共對世界權力格局的演變趨勢的判斷，其後雖因外在環境的變化而使得國內菁英在評估上有些許地調整，但整體而言，中共仍對世界形勢的發展保持樂觀的看法，相信自身能夠在現實權力結構下完善國內的現代化進程，進而達到中國的和平崛起。同時，中共也將這種對世界形勢的判斷轉化為主動的外交戰略，亦即以溫和的外交手段改變美國壟斷國際事務的獨霸局面。透過中共官方的宣示及國內菁英的論述，可知中國大陸已認為自身是「一超多強」中「多強」的一員，至於在多強之中的排行，則目前尚未有明確的共識。從邏輯上來說，中共既要改變美國獨霸的權力格局，則可能的戰略目標有：

1. 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一超」；
2. 與美國同時作為多強之上的「兩超」；
3. 達成一個在多強之上不存在超級強國的局面。

目前看來，中共的和平崛起戰略還沒有考量到這個問題。

將視野聚焦到中國周遭的區域格局，則中國的戰略目標便較為鮮明。存在於此一區域內的不少國際熱點問題，皆被中國認知為影響切身安全、抑或是決定中國能否崛起的核心利益所在。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被中國劃入核心利益的「生命區」也不斷擴大，這方面的認知可從近年來中國對南海、釣魚台主權的強勢表態觀察出來。因此，西方便有學者質疑中國正在東亞實行中國版的「門羅主義」，但對中國而言，則這不過是中國防禦性的國防戰略而已。中國認知到，相較於美國有兩大洋的天然屏障，中國的周邊危機四伏，在核心利益的

¹²⁸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頁 52。

堅守上無可退讓。此外，台灣、釣魚台的問題尤其還牽涉到中日恩怨及國共內戰的記憶，這部分已不僅是物質上的安全利益，而是牽動民族尊嚴及中共威信的另一層次的國家利益。

美國近年來「重返亞洲」的政策，使中國在區域內的核心利益直接受到衝擊。從某個角度上說，攻勢現實主義的悲觀假設似乎成真，即客觀唯物的條件決定了世界上只能有一個區域霸權，否則就是衝突。然而以 2012 年至 2013 年春夏之交以來的南海爭端、釣魚台爭端、北韓核武危機來看，中美之間的利益衝突仍可透過外交手段達到妥協。在客觀唯物的權力衝突之外，中美兩國對於核心利益的認知仍起到重要作用，也就是中國對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的滿意程度，以及美國界定的利益範圍願意退到什麼地步。以台灣問題為例，經過 1995~1996 年台海危機後，中美兩國各自都逐漸認識到對方的底線：美國堅持台灣問題必須和平解決，而中國堅持台灣絕不可以走上法理獨立。

到 2020 年前的這段時間，中共和平崛起戰略在國際權力格局上的目標，將致力於成為區域內除美國之外的權力最高位者。這並不意味著中共將爭取在東亞事務中的霸主地位，而是蓄積自身的能力以維護核心利益。在中美現實的權力差距下，中共盱衡自身的實力，雖非直接將美國的勢力趕出東亞，但正逐步稀釋化美國在東亞的主導權，期許在 2020 年前先落實東亞區域的「多極化」。此即新古典現實主義所言國家在客觀權力結構下之主觀認知，將成為影響中共往後幾年外交政策的直接因素。

第四章 中共「和平崛起」對國際制度的觀感

根據現實主義典範的論述，權力是國際關係的核心驅動因素，國家間的權力格局形塑了國際秩序的全貌。然而，自冷戰以來，傳統無政府體系下「你爭我奪」的權力關係包裹在更多不同的形式下開展，大國之間為了避免世界大戰重演，乃制定出各種不同的政治、軍事制度加以約束，而聯合國（包含以其為基礎衍生的相關機制）即是目前最具威信的規範制定者及執行者。此外，隨著全球化的飛速擴展，各種關於經濟的國際制度也逐漸形成，晚近更出現愈來愈多的非傳統安全機制，以整合各國共同面對跨國界的國際問題。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觀之，這些制度的本質實際上仍是權力的產物。¹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國際制度的內容及影響力愈來愈複雜，這使得我們很難用傳統「權力」的觀念去理解它。本文認為，由於國際上始終不存在一個單一合法的暴力壟斷者（即一國之內政府的角色），國際制度並不能被當作是與權力格局分割的體系；相反地，國際制度應該是當下國家間權力格局表現於外在的具體現象。在許多情況下，國際制度被大國操作為一種政治影響力，亦即另一型態的權力鬥爭工具。

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共將國際制度視為是帝國主義為遂行其霸權領導設下的陷阱。隨著對自身能力及外在環境判斷的轉變，中共逐漸從融入國際制度，乃至於利用國際制度以反制霸權主義。由此，中共反倒成了國際制度的積極維護者，並經常批評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破壞國際制度。近來，有鑒於中共國力快速增長，西方學界出現大量熱議中國是否會另建「中國版」國際制度的聲浪，並質疑中國是否會先以東亞區域整合作為對抗西方制度體系的起點。事實上，對於建立「中國模式」的國際秩序，中國自己也有不同意見，立場並不統一。某種程度上說，中國更像是國際「舊」體制的捍衛者，端看我們對「國際制度」的現

¹ 門洪華，「對國際機制理論主要流派的批評」，*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0年第3期。

狀如何定義。

第一節 傳統主權制度的維護者

一、建政以來看待國際制度的思維演變

在探討中共對國際制度的態度之前，本文先要對以下所稱之「國際制度」做出定義。在國際關係學界，魯杰(John G. Ruggie)和克拉斯納(Stephan D. Krasner)分別提出的「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及「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最具代表性。魯杰對國際制度的定義是「一組國家所接受的一系列共享的期望、規則和規章、計畫、組織能力和財政承諾」，²而克拉斯納所謂的國際建制則是「一系列圍繞行為體的預期所匯聚到的一個既定國際關係領域而形成的隱含的、明確的原則、規範和決策程序，行為者對某個既定國際關係領域的預期圍繞著它們而聚集在一起」。³本文則綜合以上兩位學者的定義，將「國際制度」指涉為較為寬廣的概念，包含正式政府間組織，經政府間協調對某一問題領域的明確規則(如國際海洋法、國際貿易組織章程等)，被廣泛接受的國際慣例，以及被主導國際制度的西方國家認知為所謂「普世價值」者。

美國學者依肯伯里(John Ikenberry)認為，當前的國際制度主要由「主權國家體系」及「自由貿易制度」兩大支柱組成。⁴回顧其逐漸形成的歷史，則經歷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華盛頓體系、雅爾達體系的變化，並以美國總統尼克森提出的「五大力量中心」作為雅爾達體系走入末期的轉折點。⁵冷戰結束以來，中國雖一直期待國際秩序能走向多極化，但實際上卻是由美國單極領導的局面。就在 911 恐怖攻擊前不久的世紀之交，美國官方及學界對美國帶來的「單極穩定」普遍抱持極為樂觀的態度，直到 911 恐怖攻擊後，悲觀的論調開始愈來

²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3, 1975, pp. 557-583.

³ Stepha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pp. 185-205.

⁴ John G.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3 (May/June 2011), pp. 56-68.

⁵ 高飛，*和諧世界與君子國家：關於國際體系與中國的思考*(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 86~99。

愈多地浮現。⁶雖然迄今為止，美國政府仍堅定地以全球政經制度的領導地位自居，⁷但美國知名的國際關係學者奈伊(Joseph S. Nye)早已點出現實：美國必須向其他國家妥協，向國際制度妥協。⁸換言之，當前國際制度所反映的權力利益與美國利益之間的重疊度在下降，國際制度不等於美國的制度，國際制度甚至能被拿來作為制衡美國霸權主義的工具。

但是，冷戰初期的中共處在一個與現在截然不同的國際關係中。當時國際權力格局是兩極對立，加上中共自身國力不足，乃將國際制度視為是兩大陣營的鬥爭場域，抱持游移、疑懼的態度。此外，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國家不承認中共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致使中共在聯合國沒有席位，幾乎沒有渠道參與到國際制度裡。1960年代中、蘇共關係惡化，中國大陸同時又發生文化大革命，國家利益與極左的意識型態高度糾葛在一起，深深地影響中共當時的國際秩序觀，選擇了與美、蘇兩大陣營皆決裂的完全孤立狀態。此時的中共主張反帝、反修「兩條戰線」，大力支持世界革命，⁹擁有極為鮮明的革命性特徵。

然而，即便在文革的年代裡，中共在關鍵的國際格局判斷上仍舊保持以國家安全及國家利益為考量的理性思維。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中共和美國發表上海公報，反帝、反修「兩條戰線」被修改為聯美抗蘇的「一條線」。1974年，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思想，微妙地調整此前「兩個拳頭打人」這種反美又反蘇的攻勢戰略，為之後鄧小平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鋪墊。¹⁰毛澤東主

⁶ 關於美國學界主張美國霸權正在衰落的論著，見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The U.S. in a Chaotic Worl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2007).

⁷ 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場宣示「重返亞洲」的演說中徹底表達了美國的這種認知，當中多次強調美國要以亞太地區作為支點，促進美國在全球的領導作用更為穩固，包括美國信仰的價值觀。見“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ddress by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15 2009, <<http://www.cfr.org/diplomacy/council-foreign-relations-address-secretary-state-hillary-clinton/p19840>> (Accessed May 26 2013).

⁸ Joseph S. Nye, “Recove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Survival*, Vol. 50, No. 1, Feb.-Mar. 2008, pp. 55~68.

⁹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頁 584。

¹⁰ 「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演變」，*新華網*，2003年12月3日，

政後期，中共取得了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開始了與主流國際制度的接觸，但由於左傾思想仍盛，參與國際制度的目的僅為了獲取政治承認，對待國際制度的態度仍十分消極。

1979 年鄧小平主政並推動改革開放以來，指導思想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變為「實事求是」，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也從「戰爭與革命」調整為「和平與發展」，對於國際制度的參與熱情和參與數量明顯上升。由此，國內政治對中國國際觀的影響可見一斑。不過，由於自身國力不足，加上對國際制度的遊戲規則並不熟悉，80~90 年代的中共雖廣泛參與國際制度，但在態度上十分審慎，遑論主動提出建設性方案。直到 90 年代後，中共開始全面參與到政治、經濟、人權、安全等各種國際制度，並提出自己的創見。¹¹

綜析中共從 90 年代起全面參與國際制度的原因，大致可歸納出國際及國內兩個層面的動因如下：

〈一〉在國際方面，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趨勢同步發展，非傳統安全問題在後冷戰時期格外突出，諸多問題非在國際制度架構下解決不可。美國雖是世界超強大國，但很多事務亦需要與其它大國共同協調方能完成，國際制度成為制衡美國霸權主義的工具，中國得以在維護國際制度的同時逐步尋求改革。

〈二〉在國內方面，中國自身國力上升，專業的技術官僚也逐步進駐外交決策圈，使得中國愈加有自信去參與國際制度。此外，因應中國崛起所激發的中國威脅論，中共決策者決定以遵守並配合國際制度的實際作為來反駁。

中共官方自 90 年代中期以來提出的「負責任大國」宣示，可謂是中共全面參與國際制度的重要指標，尤其是中共特別將之作為政治文告表述，足見其思維的明顯轉變。2006 年，時任大陸國家總理的溫家寶在訪問澳洲時，特別從十個方面證明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作用。¹²在 2011 年公布的《中國的和平發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12/03/content_1212122_2.htm〉(瀏覽日期：2013 年 5 月 26 日)。

¹¹ 高飛，*和諧世界與君子國家：關於國際體系與中國的思考*，頁 208。

¹² 溫家寶，「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在澳大利亞總統霍華德舉行的歡迎

展》白皮書中，「負責任大國」被正式作為中國「和平崛起」的身份定位。¹³

西方學者金淳基(Samuel S. Kim)認為，中國在短短的三十年間，完成了從體系的革命者(system-transforming)、體系的改革者(system-reforming)到體系的維護者(system-maintaining)的身份轉變。¹⁴對此，本文則認為，中共自改革開放後擺脫「革命者」的身份是顯而易見的，然而「改革者」與「維護者」的身份區隔則不那麼輕易分辨。這當中實際上還牽涉到對於「國際制度現狀」的定義問題，後面將透過中共參與全球政經制度的實踐加以論析。

二、對傳統主權原則的堅持

聯合國無疑是全球政經制度最重要的構築場域。在涉及和平與發展的政治安排上，聯合國安理會又是其中最具合法性權力者。因此，觀察中共對聯合國的看法及在安理會會議中的投票與發言，便可大致掌握中共對全球政治制度的觀感。根據本文前面的發現，中共對外在形勢的判斷深受國內政治的影響，而如我們聚焦於中共在安理會中的實踐，便不難發現，這樣的因素繼續起到關鍵的作用。

在毛澤東和鄧小平主政時期，領導人個人都具有絕對的權威單獨決定外交政策。台灣學者林文程指出，毛澤東與鄧小平皆強調主權的重要性、決心捍衛革命的成果、維持黨的獨佔統治、追求國家的富強，所以實際上兩人具有同樣的世界觀。他們兩人的外交路線之所以不同，主要來自於個性的差異：毛澤東懷抱強烈浪漫色彩的左傾革命觀，而鄧小平則是務實的右傾經濟發展路線。¹⁵準此，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語言詮釋，即是兩人皆仍受到現實權力結構的制約，但因為個性的不同，而使得其認知的國家利益含有的意識型態成份有所差異。自江澤民以降

宴會上的演講」，人民日報，2006年4月4日第3版。

¹³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新華網，2011年9月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¹⁴ Samuel S. Kim,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ael Oksenbu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 47.

¹⁵ 林文程，「中共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投票行為分析(1971-2005年)」，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3期(2006年5~6月)，頁16。

的中共領導人則深具技術官僚特質，且由於其權力與不能與鄧小平、江澤民相比，外交決策出現更為多元化、分權化及專業化的現象，促使中共更務實地參與到全球政經制度的運作。

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投票行為，具體而微地表現出中共對全球政治制度的態度。西方學者觀察，自 1978 年中共確立改革開放的路線後，中共在安理會的投票表達出與聯合國高度合作的態度，在 1982 年至 1989 年共一百八十九件的決議草案中，中共對一百八十七件皆投了贊成票，只有兩件投棄權。¹⁶金淳基認為，這顯示中共已成為體系的維護者；¹⁷貝利(Sydney D. Bailey)和竇斯(Sam Daws)也表示，中共在 80 年代已成為正常的聯合國會員。¹⁸90 年代以來，中共大幅降低投棄權票的次數，尤其在 2002 年美國繞過安理會發動伊拉克戰爭後，更為肯定及捍衛安理會的作用。¹⁹

在聯合國安理會討論的眾多議題中，中共對「維持和平行動」(peacekeeping operation)(以下簡稱「維和」)的態度尤值得注意。本來在聯合國憲章的規定裡，是以集體安全制度來處理國際衝突，但由於這種設想在冷戰的兩極對抗格局下很難實現，聯合國遂發展出了「維和」這樣一個讓這各方都能接受的爭端處理模式。²⁰在中共加入聯合國的初期階段，中共對維和採取的是「三不政策」：不理會安理會關於維和的投票，不負擔維和行動的費用支出、不提供人員參與維和行動。²¹自 1982 年起，中共開始繳納維和行動的分攤經費；1988 年，正式加入聯合國維和行動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Peacekeeping Operation)；1990 年，首

¹⁶ 同前註，頁 26。

¹⁷ Samuel S. Kim,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pp. 45-46.

¹⁸ Sydney D. Bailey and Sam Daws, "The Procedure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3rd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 186.

¹⁹ 美國繞過聯合國逕行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使得中共體認聯合國對其發揮外交影響力的功用，並積極鼓吹聯合國多邊主義的重要性。見「李肇星聯大發言主張加強聯合國作用並提五大建議」，中國新聞網，2003 年 9 月 25 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n/2003-09-25/26/350504.html>〉(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6 日)。

²⁰ 許志吉，「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對維和議題的投票行為研究」，東亞研究，第 41 卷第 2 期(2010 年 7 月)，頁 84-86。

²¹ M. Taylor Fravel,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ince 1989," *Asian Survey*, Vol. 36, No. 11 (Nov. 1996), pp. 1103-1104.

度派遣軍事觀察員參與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²²在冷戰結束之際，中共已全面加入維和機制，並逐漸體認到這也不失為是「為中國更深入融入到廣泛的國際安全機制中去提供了一個重要而又有效的途徑」。²³

不過，1991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第689號決議文，授權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聯軍部隊以武力對付伊拉克，這種所謂維和的行動引起了中共的警覺。²⁴隨著自身國力的崛起，中共從「革命者」變成了既有體制的「維護者」。弔詭的是，面對維和的範圍被愈來愈擴大、所謂「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不斷衝擊國際法的傳統原則，過去孤立於體系外的中共轉而積極地鼓吹聯合國本來的制度。中共強調，「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正朝軍事化的方向發展」，這種趨勢讓「中國感到不安」；「維和行動僅僅是政治解決的輔助手段，它無法、也不可能替代政治解決。」²⁵

金淳基認為，中共是自體制的推翻者、改革者逐漸進渡到維護者。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當前的中共同時身兼了改革者與維護者兩個身份。中共改革的是在西方大國主導下逐漸「變調」的國際制度，而維護的則是既有的體制。和剛剛加入聯合國時以消極參與來抵制不同，如今崛起的中共則以更加積極的態度，透過參與來表達對主權原則的堅持立場。中共究竟是改革者還是維護者？答案取決於由誰定義當前「國際制度」的內容。

從實踐上看，中共很少在表決安理會草案時動用到否決權，而是以棄權來表達不盡認同的態度。中共對此曾解釋說，「棄權往往是我們對其對一決議草案不完全同意……但從大局考慮，又不必要否決，因此投棄權。……投棄權後，今後對方要引用這決議內容時，我可持保留意見或提出不同看法。如否決，當然就沒有餘地了。」²⁶準此，當中共投下反對票，即表示其對該草案引據的法理論述有

²² 許志吉，「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對維和議題的投票行為研究」，頁91。

²³ 王逸舟主編，**磨合中的建構：中國與國際組織關係的多視角透視**（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頁89。

²⁴ 許志吉，「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對維和議題的投票行為研究」，頁95。

²⁵ 「聯合國維和趨軍事化，中國對此深感不安」，**大公報**，1997年4月12日，A3版。

²⁶ 凌青，**從延安到聯合國——凌青外交生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頁175。

根本上的否定。綜觀中共加入聯合國後在安理會投下反對票的記錄，迄今為止只有九次，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投反對票次數最少的國家，而在 2003 年中共宣示「和平崛起」後，總共對五次草案的表決投下反對票，當中有三次皆與敘利亞局勢有關。²⁷中共在這兩次投票後的發言，皆強調了制裁或威脅使用制裁無助於問題解決，反而會導致局勢進一步複雜化。中共反覆重申各國主權平等及不干涉他國內政是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並認為三次關於敘利亞局勢的安理會決議草案皆只有單方面地對執政的阿薩德政權施壓，對發起武裝暴動的反對勢力譴責不足，將使得這種暴力顛覆政府的行為得到國際社會的正當性背書。²⁸

總的來說，最近四次中共動用安理會否決權的理由，皆在於反對國際社會以近年來西方盛行的「國家保護責任」來擴張對一國內政的干預。²⁹當一國內部發生反政府暴動時，中共尤其反對西方國家以該國政府缺乏正當性為由，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七章對其進行制裁或威脅使用制裁。在中共看來，國際社會該做的是盡一切可能促成雙邊進行政治對話。³⁰不過，由於近四次中共使用否決權時，皆是與俄國一起投下了反對票，因而也引發了一些評論稱這是中俄組成「否決聯盟」以抗衡西方國家的作法。對此，大陸社科院學者劉作奎認為，這只是一種巧合，

²⁷ 中共五次在安理會投下反對票的草案分別為：緬甸局勢(2004 年 4 月 21 日，第 5619 次會議)、非洲和平與安全(辛巴威)(2008 年 7 月 11 日，第 5933 次會議)、中東局勢(敘利亞)(2011 年 10 月 4 日，第 6627 次會議)、中東局勢(敘利亞)(2012 年 2 月 4 日，第 6711 次會議)、中東局勢(敘利亞)(2011 年 10 月 4 日，第 6810 次會議)。

²⁸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6810 次會議記錄」，**聯合國正式文件**，2012 年 7 月 19 日，〈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6810〉(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6 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6711 次會議記錄」，**聯合國正式文件**，2012 年 2 月 4 日，〈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6711〉(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6 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6627 次會議記錄」，**聯合國正式文件**，2011 年 10 月 4 日，〈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6627〉(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6 日)。

²⁹ 根據傳統的主權原則，國際制度以國家為單位，個人依附在國家之下，人民的權利由國家保障。但是，後冷戰時期在不少「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或發生內戰的地區，加害人民者往往就是國家本身，這使得聯合國秘書長(Kofi Annan)在 1999 年與 2000 年的聯合國大會上呼籲，國際社會應就處理這類問題達成新的共識，不應使主權原則成為人道救助的阻礙。2011 年 12 月，由加拿大政府成立的「干預和國家主權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發佈《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報告書，主張國家必須負起保護人民免於種族滅絕、非人道對待等災難的責任，如國家無此能力，此責任就必須由國際社會承擔。見蔡育岱，「人權與主權的對立、共存與規避：論述《國家保護責任》在人道干預上的意涵及重要性」，**東吳政治學報**，第 28 卷第 4 期，頁 4。

³⁰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6711 次會議記錄」，**聯合國正式文件**。

兩個國家剛好對一些國際問題有著共同的想法。³¹

針對中共就敘利亞相關決議草案投下三次反對票，西方國家對中俄兩國進行了極為猛烈的批評。然而，中共官方媒體人民日報也回擊稱：「新世紀以來的幾場戰爭一再證明，『推行民主』、『人道主義』不過是外部大國謀求私利的幌子。」³²中共認為，聯合國安理會做出這樣的一項決議，將使得意圖顛覆政府的反對派愈加激進：而過去北約繞過安理會進行所謂的「人道干預」，或者濫用安理會有關設立禁飛區的決議，直接向利比亞交戰一方提供火力支援，都開了國際干預的惡例，使得緊張局勢非但沒有紓解，而且更加惡化。³³

中共就敘利亞問題投下反對票的作法，在國內也引發頗多討論。強硬派認為中國本就要明確表達立場，此次投下反對票而非棄權，將可讓更多第三世界朋友對中國的信任增強，「抵得上百億外援」。³⁴亦有意見指這張反對票對中國傷害太大，認為中國遠不如俄國那樣與敘利亞有利益關聯，不必僅僅為了政治宣示賠上好不容易對西方世界經營的形象。³⁵事實上，中共官方也表示，中國在敘利亞問題上並無私利，乃是按照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斷。³⁶隨著國力的崛起，中國在國際問題上擁有愈來愈多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加上中國對國際問題及國際制度的遊戲規則的認識加深，考慮的層面也就愈來愈廣。³⁷

今日的中共事實上和西方國家在進行價值觀的競爭，亦即當年鄧小平所言「沒有硝煙的戰爭」。³⁸崛起的中共顯然愈來愈認為，這場價值觀的競爭表面上

³¹ 「新中國八次投出否決票 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利益」，**環球網**，2012年2月8日，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2-02/2417989.html>> (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³² 「不能任由外部干涉實現政權更迭」，**人民日報**，2012年7月17日，3版。

³³ 同前註。

³⁴ 「一張聯合國否決票 抵得上百億外援」，**東方日報**，2012年2月7日，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20207/00182_001.html> (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³⁵ 楊恒均，「中國為何投反對票」，**鳳凰博報**，2012年7月21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882846.html>> (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³⁶ 「外交部官員：中國在聯合國行使否決權是謹慎的」，**中國新聞網**，2012年1月19日，
<<http://big5.chinanews.com:89/gn/2012/01-19/3617584.shtml>> (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³⁷ 「新中國八次投出否決票 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利益」，**環球網**。

³⁸ 此為鄧小平於1989年11月觀察世界大勢時所提出來的概念，意指美蘇軍事對抗的冷戰可能結束，但另一種以制度及價值觀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開始。見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1989年11月23日)，**中國共產黨新聞**，

雖與自身的國家利益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從長遠上看，卻會為西方國家「和平演變」中國敞開大門，衝擊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有這樣的意識，除了與西方鼓吹中國發生「茉莉花革命」的言論刺激有關，更與中國在國力提升後認知的威脅範圍擴大有關。

第二節 經濟制度的改革者與區域合作的促進者

一、尋求全球經濟制度的改革

如果說中國在全球政治制度上是傳統體制的維護者，那麼其在全球經濟制度上更傾向是一個改革者。就在 2001 年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前夕，大陸學者普遍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霸權對全球經濟制度的宰制是長期存在的現象，在大多數情況下，西方資本主義霸權不會放棄既有由西方主導建立的全球經濟制度，而是透過這套制度來增進其戰略資源，重構符合西方願望的國際制度。³⁹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共就自身採取的是否為市場經濟制度、以及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應採取怎樣的態度的問題，一直到 90 年代中後期才算定調。加上全球經濟制度中自由貿易體系的這一部份，亦是自 1995 年後才正式形成 WTO 這樣的正式多邊貿易組織，建立起全球貿易體系的法律架構，因此中共在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的步調上，相較於其對全球政治制度的參與就緩慢許多。

自 2001 年中共加入 WTO 以來，參與國際貿易的程度愈來愈高，在金融危機後的 2009 年，其對外貿易額仍維持 22075.4 億美元（與前一年 25632.6 億美元相比僅微幅下滑），且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佔全球貿易份額的 9.6%。2011 年中共的對外貿易額創下了 36418.6 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在全球貿易中所佔的份額更超過 10%，與剛剛加入 WTO 時的 5096.5 億美元、甚至是改革開放之初的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69113/69684/69696/4950049.html>〉（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6 日）。

³⁹ 王良能，*中共的世界觀*（台北：唐山出版社，2002），頁 90~96。

381.4 億美元有天壤之別。⁴⁰對中共來說，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中國和平崛起不可缺少的機遇，給予中國不透過戰爭即完成自身發展的機會。

因此，美國學者伊肯伯里認為，由於中共自己就是自由貿易制度的受益者，即便中共持續崛起，也不會挑戰既有的這套制度。⁴¹事實上，中共雖不直接衝撞全球經濟制度，但正如前面提及的，中共深知西方資本主義霸權主宰全球經濟制度的本質，只是選擇了以融入的方式在體制內進行改革。隨著中共國力的提升，其改革的力道愈來愈強化，尤其表現在全球經濟制度中的另一部份，亦即全球金融體系上。

2008 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提供了中共對長期由西方資本主義霸權掌控的體制加強改革的機會。中共認為，這場危機暴露了既有體制無能有效協調全球經濟秩序，其問題根植於兩個方面：一是制度設計缺乏開發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二是長期以來主導全球經濟制度的「華盛頓共識」已淪為僵化的教條思想。⁴²就第一個方面而言，主要指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投票制度是由「一國一票」的主權平等原則與反應各國貢獻美元程度的加權投票權共同組成的，而經過多年來的運作，後者實際上壓倒了前者，使得少數已開發國家佔盡優勢，美國更是箇中翹楚。第二個方面指的是長期以來全球經濟制度奉行的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等指導思想，使得全球經濟制度已變成少數已開發國家向第三世界強推自由經濟價值觀的平台，結果不但未能解決她們的問題，反而使情勢更加惡化。

除此之外，自 70 年代美國尼克森政府宣布美金和黃金脫鉤後，七大工業國組成七國集團(G7)定期集會，成為以 IMF 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為主的金融體制之外的另一國際機制，實際對全球金融體制施加重大影響。俄國雖於 1997 年正式加入該集團(由 G7 擴展為 G8)，但由於經濟較為落後，擁有的話語權並不大。

⁴⁰ 見本文表 2-1、2-2；秦亞青，*國際體系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頁 259。

⁴¹ John G.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3 (May/June 2011), pp. 56-68.

⁴² 高飛，*和諧世界與君子國家：關於國際體系與中國的思考*，頁 192。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新興的開發中國家並邀請和原 G8 國家組成二十國集團(G20)，中國也在其中。作為已開發國家和新興開發中國家之間的非正式對話機制，直到 2008 年金融海嘯以前，G20 始終處於全球金融體制的邊緣位置，影響力十分有限。

2008 年金融海嘯爆發後，歐盟國家的領袖向美國提議召開 G20 高峰會，開發中國家由此真正地參與到實質的全球經濟治理。在金融海嘯爆發後的第一場 G20 高峰會（於華盛頓舉行）上，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表達了中共的四點主張：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推動國際金融組織改革、鼓勵區域金融合作、改善國際貨幣體系。⁴³此後 2009 年在美國匹茲堡召開的 G20 高峰會上，G20 被確定為取代 G8 的最主要論壇。⁴⁴2010 年，中國在 IMF 的投票權從 3.65% 被提升到 6.07%，超越英國、德國和法國，位列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在全球金融體制中的話語權大大提升。⁴⁵

由於其在金融海嘯中的低受損度以及所持有的大量外匯，中國在金融海嘯後受到國際極大的注目。不過，以中共官方及主流學界的意見觀之，中國對自身能起到的作用能持較為保守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2008 年的這場金融海嘯與美元作為國際基礎貨幣的地位有關，美國挾此優勢，得以操縱全球金融體系為其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所需費用埋單。⁴⁶大陸官員乃提出以超主權貨幣代替美元的建議，同時努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⁴⁷目前來看，這尚是一條漫漫長路。此外，長年關心中國發展的新加坡學者鄭永年指出，有不少意見認為中國已融入到全球金融制度，應該把工作重點放在增加中國在世界銀行、IMF 等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上，但是真正的問題本質還是在這些國際組織的角色必須重新定位，不應

⁴³ 同前註，頁 193~194。

⁴⁴ 同前註，頁 195。

⁴⁵ “Illustration of Proposed Quota and Voting Shares—By Member 1/ (in perc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0/pdfs/pr10418_table.pdf> (Accessed Dec. 16 2012).

⁴⁶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 120~121。

⁴⁷ 「周小川：改革國際貨幣體系 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鳳凰財經*，<<http://finance.ifeng.com/news/hgjj/20090323/469925.shtml>>（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6 日）；高飛，*和諧世界與君子國家：關於國際體系與中國的思考*，頁 198。

由少數大國干預開發中國家的選擇的發展方式。⁴⁸質言之，中國所要面對的仍是西方資本主義霸權的價值觀壓力。

鄭永年認為，中國表面的經濟總量數字，並不能直接轉化為中國對全球金融制度的影響力，因為中國缺乏成熟的現代國家制度，無法建立一套具有全球層次的價值體系，而這也就使得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倍加困難。⁴⁹這種想法實際上與中共官方的戰略思維一致，也就是先藉由全球化的國際環境完善自身的發展，爭取長時間的和平穩定以完成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再慢慢爭取對國際事務有所作為。

面對中美兩國共治全球經濟事務(G2)的倡議，時任大陸總理的溫家寶明確表示「當今世界的相關問題並不是某一兩個國家所能解決的」。⁵⁰可以說，中共明確認知到，世界經濟的重心只是東傾還沒有東移，中國經濟遠未成長到世界經濟引擎的地步，中共仍堅持一貫以來不同政治制度國家按照平等協商原則共商世事的論述，並不強調中國要爭取對全球經濟事務的領導權。但另一方面，中共官方也表示「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具活力、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⁵¹中共事實上是透過各種多邊機制來發展尚未制度化的 G2 共治關係，而當中隱含的矛盾是：口頭上強調「平等」的中共，並不能否認大國政治在全球事務中的主導作用，而自身也追求成為其中的一員。

隨著新興開發中國家經濟實力的崛起，「金磚四國」(BRICs)的會晤也正走向機制化。中共藉由這樣的機制凝聚開發中國家相近的價值觀，團結盟友以制衡西方資本主義霸權。顯然，西方價值體系對全球制度的壟斷，對中共而言將是硬實力較量外更大的挑戰。

⁴⁸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 121。

⁴⁹ 同前註，頁 122。

⁵⁰ 「溫家寶批駁『中美 G2 共治全球』：毫無根據」，*中國評論新聞*，2009 年 5 月 21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7/5/3/10097533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975339>〉(瀏覽日期：2013 年 4 月 7 日)。

⁵¹ 「張業遂大使在美中國貿委會招待會上的致辭」，*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2012 年 6 月 6 日，〈<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sgxx/dszc/dashihoodong/t939465.htm>〉(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6 日)。

二、對區域整合的主張

冷戰時期，中共並不從區域角度看待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而是在雙邊層次上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90年代中期以來，中共開始積極接受「區域」的概念，並逐步將促進東亞區域整合作為外交戰略的一部份。⁵²學者普遍指出，自90年代以來，影響東亞區域整合的指導思想（東亞區域主義）大致可歸納出三類：亞太主義、東亞主義及東協主義。⁵³以中共多年來的宣示及實踐觀之，其主要認同的是以東協作為主要平台的區域整合概念。

下面就中共對此三類區域主義的態度做簡要分析。關於亞太主義，其主要代表即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乃具有開放性、非正式組織的區域國際建制。由於其涵蓋的地域過於廣泛且複雜（含美國、澳洲、紐西蘭等非東亞國家），各國之間的政經體制及發展程度過大，在區域認同的凝聚上較弱。對中共而言，這樣的機制自不適合用於處理實際的區域整合事務，充其量只能作為一個不具拘束力的對話平台，尤其因為美國強勢主導 APEC 的議程，更讓中共擔心美國會藉此干預東亞國家的合作，從而離間東亞各國與中共之間的互信。

至於東亞主義，源起於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ohamad)在90年代提出的「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 Economic Group)，核心動機是對西方金融體系的不滿。類似的概念亦反映在韓國總統金大中提出的「東亞展望小組」(East Asia Vision Group)，同樣也試圖擺脫與西方經濟上的互賴關係，建構具亞洲價值(Asian Value)的發展模式。⁵⁴從理念上來說，中共相當認同此種構想，並派了代表和其他國家學者一同研究「東亞展望小組」的倡議。但是，東亞主義的理想在落實上卻有很大困難，主因就在於即便排除美國等非東亞國家，東亞各國的發展程度依然落差很大，且東亞各國習慣於強權領導，則東亞主義的理念該由中國還是日本主導落

⁵² 任晶晶，「東亞區域合作語境下的中國外交：一個新地區主義的視角」，*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北京)，2006年第5期，頁62。

⁵³ 高長、吳瑟致，「中國崛起對東亞區域主義的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0卷第2期(2009年4月)，頁6。

⁵⁴ 同前註，頁7。

實，對中共而言又是一大問題。

因此，中共巧妙地利用東協這個既有的完整機制，從中發揮潛在的主導作用。本來，由於中共在文革時實行「輸出革命」的政策，使得其很長一段時間被東協國家視為是干預內政的入侵者。⁵⁵90年代開始，中共與東協關係改善，並在1994年成為東協發起的區域安全機制「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的創始成員。1996年，中共選擇在ARF的場合首次提出新安全觀的倡議，⁵⁶足見其有意深化以東協為核心的區域整合。隨後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中共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表現增強了其與東協國家之間的互信。

事實上，雖然中共有意支持以東協為核心的安全合作機制，但由於東亞區域內存在太多傳統的強權鬥爭及領土糾紛，安全合作的整合程度仍相當低。相較之下，中共與東協的經濟合作更為顯著。透過東協主動發起的與中、日、韓三國會晤的機制(ASEAN Plus Three, 10+3)，中共積極催生了2002年與東協簽定的《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並於2004年再簽署《貨物貿易協議》，決定從2010年起與東協主要六國的絕大多數產品關稅降為零、2015年起關稅全面降至零，形成中國—東協(10+1)自由貿易區。⁵⁷目前，這樣的自由貿易區機制已經上路，並帶動了韓國及日本也分別與東協簽定自由貿易區協議。

由東協延伸出的10+3機制，同時也提供了中、日、韓三國彼此之間的對話平台，形成了「小國帶動大國轉動」的獨特合作模式。⁵⁸作為東亞區域的三個經濟強國，中、日、韓三國卻在很長時間裡是區域經濟合作潮流中的孤島。⁵⁹目前，中、日、韓三國關於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仍在進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2012年中日為了釣魚台兩相對峙的緊張時刻，兩國間的自由貿易區談判也沒有中斷。

⁵⁵ 薛曉芃，「中國對東亞地區主義觀念的轉變」，*外交評論*(北京)，總89期(2006年6月)，頁29。

⁵⁶ 中共於1997年7月透過時任外交部長的錢其琛在東協區域論壇上首次提出「新安全觀」，見劉國新，「論中國新安全觀的特點及其在周邊關係的運用」，*當代中國研究所*，2006年1月1日，〈<http://www.iccs.cn/iccs/contents/466/8947.html>〉(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⁵⁷ 高長、吳瑟致，「中國崛起對東亞區域主義的影響」，頁21。

⁵⁸ 楊曉龍，「東亞區域主義與中國周邊外交」，*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安徽)，2005年第1期，頁9。

⁵⁹ 蘇浩，「地區主義與東亞區域合作機制的建立」，*外交學院學報*(北京)，2003年第1期，頁33。

⁶⁰中共積極參與以東協為核心的區域整合，並在這樣的整合機制下找到與大國之間維護雙邊關係的著力點。

近年來，美國實行「重返亞洲」的政策，對中共預設的區域整合佈局造成干擾，同時也再次揭露制度安排亦為權力的產物或工具。本來，對於 2005 年 12 月東協主導成立的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機制，中共抱持著樂觀其成的態度，大陸學者並期望它能成為促進東亞共同體的平台。但是，隨著 2011 年美國加入東亞高峰會，大陸學者對這個機制的態度轉趨保守，認為它已不能再作為東亞整合的主要平台。尤其是美國鼓動東協國家在東亞高峰會協商與中國的南海主權爭議，更讓中共警惕這種受到美國介入的區域合作機制將成為制衡中國的工具。

此外，在經濟整合方面，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儼然形成與中國倡議成立的東協 10+3 機制之間的對立情勢。最新的發展是，日本已宣布加入 TPP 的談判，加上原本就在當中的智利、紐西蘭、新加坡、汶萊、澳洲、秘魯、越南、馬來西亞等國，TPP 很有可能成為佔全球 GDP 近 40% 的世界最大經濟圈，架空 APEC 及中國施力最深的東協 10+3 機制。⁶¹尤其美國正透過 TPP 制定貿易規則，以較高的智慧財產權、勞工和環境保護標準來削弱中國產品的出口優勢，對中國在東亞區域整合中的地位直接產生衝擊。⁶²從某個角度上看，此種趨勢可能迫使中共更加地深化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並積極爭取中國與日本、韓國之間自由貿易區建設早日完成。

總的來說，中共已經從早年對區域整合的漠視，轉變為積極參與乃至尋求主導。對中共而言，東亞的區域整合是相對獨立於全球政經制度外的新機制，可以

⁶⁰ 「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開啟 十一年努力終掀大幕」，新華網，2013 年 3 月 2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7/c_115172671.htm〉(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6 日)。

⁶¹ 「TPP 擴容或衝擊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中國評論新聞，2013 年 3 月 28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4/8/4/4/10248447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484475>〉(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6 日)。

⁶² 同前註。

作為其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起點。不過，崛起的中共亦明白東亞區域複雜的強權關係，因此小心翼翼地選擇東協作為主要的施力點，並多次表示支持由東協主導東亞區域合作，淡化自身的領導色彩，避免自身過早地直接面對與美、日強權的矛盾。於此同時，中共亦成立亞洲博鰲論壇，但截至目前為止並無要取代東協主導東亞區域整合的意圖。然而，在外界眼中，事實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區域主義」正在發展，⁶³大陸學者反對美國加入東亞高峰會的表態更被美國視為是中國版的門羅主義。⁶⁴弔詭的是，美國的介入將可能迫使中國爭取對東亞區域整合的主導權，以捍衛自身的政經利益不受別人主導的區域制度的威脅。

三、中國主導建立的組織：上海合作組織

隨著國力的上升，中共積極參與國際制度的運作，並大力支持以東協為中心的區域整合進程。然而，真正由中共主導建立的國際組織，則僅有上海合作組織這一由中國、俄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五國組成的區域組織。相對於東亞仍缺乏較完整的安全合作機制（目前最具規模的是 ARF，但亦僅是鬆散的論壇），中亞反而產生了上海合作組織這一正式的安全合作機制，而中國在當中不僅是主導者，更同時扮演了創建者的角色。

上海合作組織最早起源於中國與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及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之間的邊界談判，1996年起，五國之間就領土邊界問題基本達成共識，但仍繼續於每年舉行元首會議延續相關問題的討論。1998年的年度會議中，這樣的「上海五國」機制開始產生重大的進展：在各國之間的定位上，從以中國為一方，以俄、哈、吉、塔四國為另一方的「雙邊」合作形式轉變為以五國為各方的「多邊」合作形式；在合作的內容上，也從針對邊界地區的軍事合作，擴大為針對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三股勢力」的非傳統安全合作。⁶⁵2001

⁶³ 高長、吳瑟致，「中國崛起對東亞區域主義的影響」，頁 31。

⁶⁴ 同前註，頁 34。

⁶⁵ 林琨璟、劉江永，「上海合作組織的形成及其動因」，收於陳琪、林丰主編，**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190~192。

年，「上海五國」機制正式成立為上海合作組織，第六國烏茲別克也加入，六國共同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及《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為聯合打擊「三股勢力」奠定法理基礎。⁶⁶

雖然上海合作組織是一中亞地區的多邊組織，但是中俄兩國的雙邊關係卻是該組織的主導力量。在學者就「上海五國」會議何以發展成全面合作組織的問題所總結的幾個原因中，中、俄兩國對美國的權力制衡是其一。⁶⁷一般認為，自從蘇聯解體之後，中亞地區就出現了權力真空，中、俄、美三強成為在此地進行區域安全均勢(balance of power in regional security)的主角。新成立的哈、吉、塔三國為保障自身的安全，選擇參加由中、俄兩國主導的多邊合作組織。⁶⁸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下，上海合作組織便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中、俄聯手制衡美國的工具。⁶⁹

上海合作組織形成的另一個動因，被認為是安全和經濟的共同利益。簡言之，即五國間經由邊界談判而在軍事領域的互信不斷加強，進一步擴展到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⁷⁰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合作組織並非如多數區域整合那樣從經濟、貿易領域往政治、軍事領域發展，而是倒過來從傳統安全議題擴展到反恐、能源、貿易等非傳統安全議題。

然而，即便這些國家間確實擁有維護國家安全、保障周邊穩定、發展國民經濟和促進區域合作的共同利益需求，其也不必然保證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因此，成員國之間共同的意識型態顯然是彼此加強合作的催化劑。2006年上海合作組織五週年的年度會議上，成員國將「主權高於人權，反對干涉他國內政」的價值觀行諸文字，明確在宣言中列出「.....必須尊重和保持世界文明及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歷史形成的文化傳統、政治社會體制、價值觀和發展道路的差異不應

⁶⁶ 沈旭暉、劉鵬，「從策略性聯盟到意識型態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路徑及動因分析」，*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西安），第27卷第2期（總82期），2007年3月，頁68。

⁶⁷ 林琨璟、劉江永，「上海合作組織的形成及其動因」，頁197~198。

⁶⁸ 沈旭暉、劉鵬，「從策略性聯盟到意識型態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路徑及動因分析」，頁72。

⁶⁹ David Shambaugh, "China's Military Views the World: Ambivalent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3, 1999~2000, p. 67.

⁷⁰ 林琨璟、劉江永，「上海合作組織的形成及其動因」，頁194~195。

被用於干涉他國內政的藉口，社會發展的具體模式不能成為『輸出品』……」⁷¹

此外，也特別申明支持以聯合國為主要協商平台的國際制度，以聯合國作為制衡美國單邊主義的機制，以及主張聯合國要落實「最廣泛協商一致」的原則。⁷²

以上由上海合作組織發表的主張，與中共多年來宣稱要建立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完全呼應。此時的中共已宣示過「和平崛起」，大有將上海合作組織建設成其心目中國際秩序模範的意味。準此，西方媒體及學界開始從比傳統權力平衡更高層次的「價值對抗」角度看待上海合作組織。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認為，上海合作組織凸顯了中國在中亞日漸擴張的影響力，對美國採取更對抗的態度，是一種「東方北約」；⁷³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高級研究員布魯克斯(Peter Brookes)則將上海合作組織稱之為是「獨裁者俱樂部」(club for dictators)，認為其成員國之間已經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反民主」的價值觀念，並進而在攸關彼此的重要國際問題上採取一致立場，如反對西方國家就民主、人權問題提出的批評，反對將維吾爾、西藏和車臣的民族問題列入國際議事日程等。⁷⁴

作為當前唯一由中共主導創建的國際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無疑是中共從適應、主導到進一步創立國際制度的一個嘗試，也是我們持續觀察中共如何扮演國際制度「創建者」這個角色的一個依據。然而，如從形塑價值觀的角度觀之，上海合作組織其實有很大的侷限性。首先，如前面所述，上海合作組織的最核心的基礎仍是地緣上的權力平衡，其次才是安全和經濟上的利益結合，而共同的價值觀僅是從屬於前二者的產物，這和北約及歐盟國家對民主、人權的信仰程度相差甚大。再者，以西方政治學的觀點來看，上海合作組織均帶有強烈的威權國家

⁷¹ 「《上海合作組織五周年宣言》(全文)」，新華網，2006年6月1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6/15/content_4703028.htm>。

⁷² 同前註。

⁷³ Geoff Dyer & Richard McGregor, "Opposition to US inspires 'NATO of the east'," *The Financial Times* (June 22 2006),
<<http://www.ft.com/intl/cms/s/0/ff4b3e0e-018a-11db-af16-0000779e2340.html#axzz2TuUPIdTF>>
(Accessed May 21 2013).

⁷⁴ Peter Brookes, "Club For Dictators: An ugly agenda for Asia,"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une 12 2006),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commentary/2006/06/club-for-dictators-an-ugly-agenda-for-asia>>(Accessed May 21 2013).

(authoritarian state)色彩，⁷⁵其共同的價值觀要往外擴展，正當性顯有不足。

近年來，美國對中亞地區愈趨靈活的策略運用，將影響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前景。本來在 2001 年 911 事件爆發後，美國及北約的軍事力量以反恐之名進入中亞，不少中亞國家紛紛倒向美國。⁷⁶然而，在阿富汗乃至伊拉克戰爭後，美國並未放棄在中亞的軍事佈署，這使得中亞國家開始擔心美國在此謀求優勢的野心，而傾向與中、俄兩國加強合作。因此，一些美國智庫學者乃建議美國在中亞應避免過於主導，改採其它間接的方式遙控此區域的權力格局。⁷⁷美國更具手腕的中亞政策，將可能削弱上海合作組織各國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礎。

第三節 價值觀的論戰

國際制度本質上是權力結構下的產物，而當國際制度形成之後，它同時又成為一種可拿來利用的權力鬥爭工具。經過漫長的摸索，中共對此已相當了解，因此其對待國際制度的態度，無論是全球抑或區域層次、是偏重政治抑或經濟領域，都充滿著權力利害的考量。大陸學者閻學通在論析「國家利益」的內涵時曾指出，除了軍事及經濟實力外，一國對於國際政治「動員力」亦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此種實力固然可以由軍事及經濟實力轉換過來，但它尚受到一種微妙的因素影響，即未見於嚴謹的書面條文、卻實際存在於國際制度中的所謂「普世價值」。有鑒於此，隨著實力的增長，中共愈來愈看重與西方國家間價值觀的論戰，以對抗西方國家利用「普世價值」傷害中國的國家利益。

⁷⁵ 沈旭暉、劉鵬，「從策略性聯盟到意識型態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路徑及動因分析」，頁 71。

⁷⁶ 同前註，頁 68。

⁷⁷ Olga Oliker & David A. Shlapak, "U.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Policy Priorities and Military Roles," *The Rand Cooperation* (2005),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monographs/2005/RAND_MG338.pdf (Accessed May 21 2013).

一、反對「人權高於主權」

主權國家體系本是西方國際關係的基礎，各國主權平等及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也在戰後被列入聯合國憲章。然而，自科索沃危機以來，「人權高於主權」的論調在西方世界甚囂塵上，並由此發展出「人道干預」的理論，晚近更出現「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說法。對此，中共採取堅決反對的立場，近來並從官方到學界提出大量的論述，和西方世界進行對「人權」、「主權」概念的話語權論戰。

首先，早在 1999 年第五十四屆的聯合國大會上，時任中國代表團團長的唐家璇就特別發言定調，明確表達中共主張「主權原則絕沒有過時」。⁷⁸根據大陸學者蕭佳靈的研究，20 世紀共有三次貶低主權的思潮，每一次思潮的主要邏輯都經不起推敲，皆是將主權的「進步意義」和主權被異化後對國際關係造成的不良影響混為一談。⁷⁹主導第三次思潮的「國家保護責任」概念，更是巧妙地將「國際人權保護」等同於「人權問題全面國際化」，由此藉「人權」打破「不干涉內政」的原則，而所謂的「國際社會」又由強權主導，最後就成了由強權按自己的意志來重新安排國際秩序。⁸⁰中共官方強調，西方國家以「人道干預」挑戰主權原則的作為，實際上就是霸權主義，是一種由強權定義何謂「正義」的新「炮艦政策」。⁸¹

再者，在捍衛主權原則的同時，中共也與西方國家爭奪對人權的詮釋權。本來在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對人權就有不同見解，前者側重於個人的自由，後者側重於集體的發展，1966 年聯合國同時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即反映了兩種意識型

⁷⁸ 「中國代表團團長、外長唐家璇在第 54 屆聯大上的發言」，新華網，1999 年 9 月 22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72.htm〉(瀏覽日期：2013 年 5 月 22 日)。

⁷⁹ 蕭佳靈，*國家主權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頁 157。

⁸⁰ 同前註，頁 346。

⁸¹ 「中國代表團團長、外長唐家璇在第 54 屆聯大上的發言」，新華網。

態的妥協。⁸²但是，自蘇聯解體後，資本主義陣營的價值觀壟斷了對人權的解釋，側重個人自由的人權觀逐漸成為「普世價值」。對此，中共繼承馬克斯主義唯物論的觀點，主張人權的內涵離不開本國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具體國情，沒有全世界都一體適用的人權標準，人權仍屬於一國的內政。⁸³

從西方發展的歷史軌跡來看，人權的內涵確實是隨著社會現實條件的變化而改變。西方世界以「天賦人權論」為基礎的人權理論，乃是近代新興的資產階級對抗封建神權及貴族特權的思想武器，然而當資產階級成功打倒封建專制後，受壓迫的無產階級也要起來爭權。準此，人權理論本就是近代民族國家在建立進程中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產物。⁸⁴以當今自許為人權捍衛者的美國來說，選舉權是由成年小康男子、所有男子一步步進渡到女人，而一直到上世紀 60 年代，種族歧視依然存在。所以，中共在論述上並不否認人權的價值，而是強調人權的標準必須配合社會的發展程度，一旦受到外力干擾，反而更不利於該國人權的維護。

主權原則本質上是西方國際政治運作下的產物，中國傳統並無這樣的觀念，以致於在清末初次與西方國家交涉時，經常為了「天朝」認知的「體面」而放棄在主權意義上真正重要的國家利益。這樣的歷史背景使得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知識分子，格外看重對主權的捍衛，並認為中國的積弱正是因為喪失了主權獨立的地位；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也就是打著對外收復主權、對內爭取生存權的旗號，最終成功建政。⁸⁵延續這樣的思維，中共官方的論述一直強調「吃飽飯」為中國的首要問題，在基本生存條件都缺乏的情況下，西方國家高舉的公民政治權利根本無法落實。中共將生存權、發展權作為人權的基礎，並堅信一國完整的主權是保障這些基礎的必要條件。在這樣的邏輯下，經歷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的鄧小平再次定調：「國家的主權、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任何違反國際關係準則的行動，中國人民永遠不會接受，也不會在壓力下區服。」、「中國永遠不會接受別

⁸² 王良能，**中共的世界觀**，頁 175。

⁸³ 同前註，頁 178~179。

⁸⁴ 蕭佳靈，**國家主權論**，頁 337。

⁸⁵ 同前註，頁 226。

人干涉內政。我們的社會制度是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的，人民擁護，怎麼能夠接受別國加以改變哦？國際關係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則，應該是不干涉別國內政，不干涉別國的社會制度。」⁸⁶這樣的論調，一直為之後的中共領導人所繼承，現任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 2009 年 2 月 11 日於墨西哥當地華僑見面時，更有以下這段經典的表述：「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⁸⁷由此足見當下追求和平崛起的中共，依然非常強硬地抗拒西方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指責。

值得注意的是，經過多年來參與國際制度的實踐，中共對於國際多邊機制充分展現了自信，非但不怕其會削弱自身的主權，反而成功發展出一套「多邊共同維護主權」的策略，以多邊機制對抗美國單邊的霸權主義。⁸⁸正如本章第一節所言，今天的中共實為西方傳統主權制度的捍衛者，而當初創立主權制度的西方卻開始盛行主權原則過時的論調。如引用馬克斯主義唯物論的觀點，這或許是因為西方國家的發展程度已進入到另一個階段，而中國的發展程度仍落後一大截，所以看待主權的態度自有不同。對此，當年的孫中山有一套完整的論述，即中國先要追求各國主權平等的「國際主義」，然後才能進渡到打破國界、天下為公的「世界主義」。⁸⁹在孫中山的心目中，「天下為公」就是中國人認知的普世價值，中國同樣有跨越國族的普世胸懷，只是在此之前，先要維護主權國家的原則以維護自身的發展。

嚴格來說，共產主義最核心的追求，同樣也是不受「主權」侷限、以「人」

⁸⁶ 此為鄧小平 1989 年 12 月 1 日接見日本訪華代表團的談話，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348。

⁸⁷ 這段 2009 年 2 月 11 日習近平尚未接任中共總書記時與墨西哥當地華僑的一段談話，新華網於 2012 年 12 月 1 日習近平就任中共總書記後重新發出，再次引發中外議論。見「『習氏外交』有三力」，**新華網**，2013 年 3 月 2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13-03/28/c_132268106.htm〉(瀏覽日期：2013 年 5 月 22 日)。

⁸⁸ 邱坤玄，「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多邊外交理論與實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1 卷第 4 期(2010 年 10 月)，頁 28。

⁸⁹ 桑兵，「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孫中山對新文化派的回應」，**近代史研究**(北京)，2003 年第 2 期，頁 80。

作為終極關懷。然而，中共一開始的革命，便帶有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爭取民族獨立自主的民族主義思想。在文革那段「極左」的年代，階級意識一度壓倒了主權意識，但在改革開放以後，階級意識逐漸淡出中共看待國際關係的思維，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西方國際關係思維很快地成為中共決策者的主流意識。隨著中共實力的增長，能否為世界提出一套中國式的普世價值觀，進而與西方的普世價值並駕齊驅，將是中共進一步提升在國際上的政治動員力，乃至從根本上壓制中國威脅論的一大挑戰。

二、為第三世界爭取發展權

近些年來，國力增長的中共已大方宣示「和平崛起」，並自許與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一起為國際關係的穩定做出貢獻。然而，中共一直沒有放棄「負責任大國」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定位，也就是說，中共仍認為自己尚在發展階段，雖也對國際事務負相應於自身實力的責任，但不必承擔過份的責任。反過來說，中共主張國際社會應要為開發中國家的發展負起一定的責任，而中共的理論依據，就在於「發展權」這一自 1970 年代逐漸形成的觀念。

如前所述，1966 年聯合國同時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其實就是兩種不同人權觀的妥協。1977 年，將「發展權」作為一項人權的想法首次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 23 屆會議上被提出來。⁹⁰1986 年，聯合國大會第 41/128 號決議通過《發展權利宣言》，正式確立「發展權是一項普遍的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是基本人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⁹¹發展權從被提出到確立，中共與廣大的開發中國家一同對國際社會做了積極的游說工作。

然而，和西方國家透過聯合國及其它多邊機制所促進的人權觀相比，發展權

⁹⁰ 楊成銘，「發展權的促進和保護：以《世界人權宣言》和中國為中心」，中國人權研究會，2013 年 4 月 18 日，〈http://www.humanrights.cn/cn/book/1/t20130418_1024271.htm〉（瀏覽日期：2013 年 5 月 23 日）。

⁹¹ 王良能，**中共的世界觀**，頁 170。

顯然缺少詳盡的標準及規範。大體來說，發展權仍是一種原則性的概念，強調一國的發展需要穩定的國內及國際環境配合，國際社會有責任相互合作創造有利於第三世界發展的條件，發展權是首要的人權，而它必須是在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充份調節下才能落實。對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來說，由於過去長期被帝國主義殖民，確保民族自決，尤其是自己決定採行怎樣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就成了極其關鍵的事。不過，為了防止民族自決又變成西方國家鼓動一國內部分裂主義的藉口，中共也堅持民族自決只能適用於原先就自成一個政治體系的殖民地獨立，至於本屬於一國部分的土地因戰爭而被割讓給殖民帝國者，則理應回歸原本的祖國。⁹²準此，香港、台灣都不適用民族自決。

作為人口最多、實力最強的開發中國家，中共雖不強調做第三世界之首，但實際上是以第三世界代言人的姿態發表對國際關係的看法。繼承左派關於邊陲、剝削的發展理論，中共認為當前的國際秩序充滿了諸多不正義，致使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受到傷害。準此，中共自冷戰結束之初就提出要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在中共看來，追求和平發展是國家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總目標，和平崛起的目的也是為了和平發展。某個程度上說，和平發展除了指的是確保中國自身的發展條件，同時也包含了替其它開發中國家爭取發展條件的使命。

2009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具體而微地將中共與西方就發展權的鬥爭表現出來。這次會議的爭點仍舊圍繞在各國具體的溫室氣體減排量等操作性問題，而西方已開發國家一致將矛頭對準中國，批評中國的相關資訊不透明、逃避減排責任。對此，中共從發展權的觀點出發，強調這是西方已開發國家基於自身的利益，試圖利用國際制度代替炮艦，再一次對開發中國家的剝削，以使得自己在氣候變遷問題上的責任最小化。⁹³中共強調，當今溫室氣體的總量絕大多數是已開發國家過去排放的，而這些國家已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如今的排放量自然會逐漸下降；但包含中國在內的廣大開發中國家，仍須要排放較大

⁹² 蕭佳靈，**國家主權論**，頁 347。

⁹³ 高飛，**和諧世界與君子國家：關於國際體系與中國的思考**，頁 256。

量的溫室氣體發展工業，要求開發中國家過早地承擔減排責任，實際上是壓縮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機會即人民的根本利益。面對美國表示「中國坐擁豐厚的美元儲備，無權獲取已開發國家提供的用來應對氣候變遷的補助資金」，中共特別在會議中聲明：每一個開發中國家都有權獲得補助金，這是已開發國家的國際義務，但中國也支持讓最貧窮的國家優先使用這筆資金，並願意同樣向這些國家提供資金與技術支持。⁹⁴由此，中共成功破解了西方國家的分化，團結開發中國家在會議中與守護自身的發展權利。

總的來說，中共仍繼續努力地健全對發展權的論述，其不僅幫助中共合理化主權的絕對性，更提供了移轉國際責任的理論依據。此外，在保護自身國家利益的同時，中共也順勢表現出第三世界代言人的姿態，加強自身「不爭霸」的正義形象。

三、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論

隨著 2008 年北京奧運的成功召開，以及幾乎同時間發生的全球金融海嘯，中國在此過程中展現的經濟持續增長與穩定，引起西方世界高度關注，進而大大加強了中國輿論界的民族自信，促使中國知識分子在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時，從「獨立自主」的防守層次進一步提升到「為世界做出貢獻」的雄心壯志。這波論調的開端，最早應追溯到美國學者庫珀(Joshua Cooper Ramo)於 2004 年便提出的「北京共識」，意指中國大陸經改革開放近三十年後，已經發展出一套與西方新自由主義式的「華盛頓共識」比肩的發展模式，提供了開發中國家在追求發展時更好的借鏡。⁹⁵中國本身則在 2008 年北京奧運、金融海嘯後開始廣泛議論起關於中國模式的種種問題，並嘗試從西方學界那裡奪回對中國模式的話語權。雖然有學者指出，最早提出「中國模式」概念的是鄧小平而非外國人，⁹⁶但不可否

⁹⁴ 同前註，頁 258~259。

⁹⁵ 關於庫珀提出的「北京共識」論述，見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⁹⁶ 「『中國模式』被賦新內涵」，[香港新聞網](#)，2013 年 5 月 9 日，

認的是，中國人是在西方輿論的刺激下才認真地就「中國模式」做深入、完整的論述，且大體上並沒有超出西方學者提出的基本架構。

2004年西方輿論界開始提出「北京共識」及「中國模式」的時候，最先是從經濟的角度著眼。不過，由於政治和經濟本質上無法切割，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實際上由政府高度地掌控，因此中外學者後來在對中國模式延伸議論的時候，也就愈加側重中共特殊的政治型態。綜合中外對中國發展模式內涵的定義，主要包括鄧小平堅持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主義原則，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定調的「維持穩定以發展經濟」，以及政府在國內主導市場、對外捍衛金融主權等。⁹⁷大陸學者張維為將之總結為：強勢政府、民生為大（把民生放在第一位）以及漸進改革。⁹⁸

然而，大陸內部對於自身是否已發展出一套可供世界學習的中國模式，態度並不一致。持正面態度者認為，西方的模式經常不顧他國實際的社會情況，將自身認為萬能的制度強加於人，結果造成開發中國家更大的災難。這些學者尤其認為，中國傳統上是一個容易達成共識的社會，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出的民主制度卻極度偏重利益競爭，一旦中產階級不夠健全、文化素養不夠完善的國家照搬這套制度，很容易陷入金權政治及無止盡的內耗中，更別提能選出擁有發展遠見的領導人。中國模式可貴之處在於不拘泥某種特定的制度或價值觀，而是以維持穩定為根本條件，全力奔向現代化的發展目標。這種概念為今天世界面臨的發展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尤其是應用在消除貧窮上。⁹⁹準此，大陸學者程恩富認為，中國經驗在政治及經濟兩個方面，都已經上升為與西方模式平起平坐的中國模式。¹⁰⁰

〈<http://www.hkcna.hk/content/2013/0509/191217.shtml>〉（瀏覽日期：2013年5月25日）。

⁹⁷ 許紀霖，「普世文明，還是中國價值？——近十年中國歷史主義思潮之批判」，收於何迪、魯利玲編，**反思「中國模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31。

⁹⁸ 陳葉軍，「張維為：中國模式是『最不壞』的模式」，**聚焦中國模式——人民網理論頻道**，2009年7月20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9687131.html>〉（瀏覽日期：2013年5月25日）。

⁹⁹ 同前註。

¹⁰⁰ 陳葉軍，「程恩富：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驗已上升為中國模式」，**聚焦中國模式——人民網理論頻道**，2009年3月12日，〈<http://cpc.people.com.cn/GB/66888/77791/8953652.html>〉（瀏覽日

這批學者並為支撐中國大陸發展模式的政治體制進行辯護。他們首先指出，中共並不否定民主是普世價值，但民主並非只限於西方認知的多黨直選制。張維為主張要區分「實質民主」和「形式民主」的概念，認為拿所謂多黨直選制這種「形式民主」來壟斷對民主的定義，事實上是對民主的異化。不過，對於「實質民主」的內涵，張維為則著墨不多，僅僅提出「良政」(good governance)是檢驗「實質民主」的首要標準，而對開發中國家而言，促進民生水平就是落實良政。¹⁰¹至於在發展過程中如何有效保障個人權益不受侵犯，張維為則並未提出具體的解決方式，但顯然不是多黨競爭的政黨政治。另一位亦是中共體制內的學者俞可平則指出，一個強勢政府如無司法制約，必然會以「公共利益」之名侵害個人權益。¹⁰²俞可平提出「民主是個好東西」，在論調上比張維為更自由派一些，但也只是提到中國大陸必須加強法治建設，在維持穩定上應該採取更開放的疏導方式取代傳統專制式的圍堵，¹⁰³至於更確切的關於實質民主的定義，則同樣付之闕如。

另一批大陸學者則不像上述學者那樣對中國模式信心滿滿，甚至認為根本沒有「中國模式」這種東西。他們的基本論點是：中國大陸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發展成果，並非是因為什麼與眾不同的發展模式，而是得力於全球化的免費列車，中國實際上並沒有為世界貢獻出具有原創性的思想方法和理論。¹⁰⁴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巴西，和今日的中國大陸一樣由政府強勢主導經濟發展，國營企業在市場中佔極高比例，對外資相當開放，主要的資金都投入工業建設而非公共教育及衛生。但是，巴西後來的發展卻不理想。¹⁰⁵這一類學者認為，除了

期：2013年5月25日)。

¹⁰¹ 陳葉軍，「張維為：中國模式是『最不壞』的模式」，**聚焦中國模式——人民網理論頻道**。

¹⁰² 陳葉軍，「俞可平：中國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徑」，**聚焦中國模式——人民網理論頻道**，2009年9月9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019441.html>〉(瀏覽日期：2013年5月25日)。

¹⁰³ 俞可平認為，傳統的穩定用的是靜態的以「堵」為主的手段，而中共處理當前社會問題的方式應改用現代化以「疏」為主的動態穩定，諸如公共聽證會、輿論調查等，以協商取代壓制來維持秩序。見陳葉軍，「俞可平：中國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徑」，**聚焦中國模式——人民網理論頻道**。

¹⁰⁴ 陳志武，「中國如何搭上全球化列車」，收於何迪、魯利玲編，**反思「中國模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87。

¹⁰⁵ 黃業生，「『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收於何迪、魯利玲編，**反思「中國模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113~114。

得力於全球化的環境外，中國大陸的經濟成就乃是依賴於其特殊的政治平台，也就是無論擴權或卸責都很容易的政府，說穿了就是專制體制保障發展，這樣的模式在西方民主國家不可能實施。¹⁰⁶肯定中國模式的學者也指出，沒有開發中國家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能發展起來的，¹⁰⁷這也就等同於承認中國大陸的發展得自於專制。否定中國模式存在的學者認為，相對於西方國家多陷入市場自由與社會福利之間孰輕孰重的困境，中國大陸的問題反而是專制造成的「自由、福利雙不足」，如此的「中國模式」非長久之道，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發展模式。¹⁰⁸

事實上，正如本章第一節對國際制度的定義，所謂的制度必然也包含了某些價值觀，而價值觀本身既是權力的產物，同時也可再作為權力的工具。發展模式也是一樣，除了政治和經濟上的意含外，更為核心者即是文化層次的價值觀念。近幾年來，中國輿論界開始出現對中國價值體系進行建構的論著，但統整下來，皆是比較抽象、籠統的概念，如「王道」、「和諧」等等。中共官方也開始啟動這方面的理論建構工程，援引的理論基礎主要為傳統儒家文化及馬克思主義，而形成諸如「科學發展觀」、「和諧世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理論。但是，如深究其當中的內涵，中國實際上並沒有發展出一套自己認定放諸四海皆準的價值觀，而是比較被動地宣示各種文化應和諧相處，沒有任何一套標準是絕對正確。從某種程度上來看，重視「個人」與「結構」互為主體的「天人合一」觀或許是中共當前有意向世界推廣的價值觀，而這種觀念實際上和回教文明、佛教文明乃至古希臘的古典文明相通。¹⁰⁹

不過，由於鄧小平提倡經驗主義的影響，中共很長一段時間以「去價值化」為尚，也就是不再談一套絕對正確的價值體系，而是以是否有利於國家發展作為

¹⁰⁶ 秦暉，「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收於何迪、魯利玲編，**反思「中國模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 50。

¹⁰⁷ 陳葉軍，「張維為：中國模式是『最不壞』的模式」，**聚焦中國模式——人民網理論頻道**。

¹⁰⁸ 秦暉，「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頁 65~67。

¹⁰⁹ 許紀霖，「普世文明，還是中國價值？——近十年中國歷史主義思潮之批判」，頁 39；吳瓊恩，「2008 年北京奧運會與中國的和平崛起：『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的較量」，**海峽評論**，第 213 期（2008 年 9 月），頁 31。

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¹¹⁰如此造成的結果，便是整體社會陷入了「意識型態真空」，民族利益成為唯一有價值的「價值」。¹¹¹一旦遭遇與西方的價值衝突，往往拿不出一套邏輯縝密的價值論述自我辯護，而只能一貫以「這是中國的主權和內政」抵擋國際社會的批評。¹¹²

或許，中國模式的核心價值就在於不強推自己信仰的價值觀念給他人，中國大陸無論政府還是民眾也都沒有輸出中國模式的動機。¹¹³不過，正如新加坡學者鄭永年所言，中國要真正崛起，就必須為世界提供一個知識體系。¹¹⁴大陸一些學者也指出，政治觀念體系競爭的成敗是文明興衰的關鍵，文明興衰決定國運前途。¹¹⁵顯然，雖然自身在普世價值的建構上尚未完備，但面對國際制度中隱含的西方價值體系，中國愈來愈在意與之進行話語權的競爭。

第四節 小節

金淳基提出的「體制的革命者→改革者→維護者」論述，並不能準確地表達中共看待國際制度的態度，因為當中還牽涉對國際制度的定義。在中共看來，聯合國既有的體制是國際政治制度最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據，按照聯合國憲章最原始的架構，只有經安理會認可的集體干預才是合法的干預，其它以人權等理由發動的干預都是不合乎體制的。準此，在國際制度的政治方面，中共自認是既有制度的維護者，而那些挑戰傳統主權原則的西方國家才是體制的改革者或者革命者（如 2002 年美國直接繞過聯合國，單方面發動對伊拉克的攻擊）。

至於在國際制度的經濟方面，中共才是所謂體制的改革者。中共對全球化的自由貿易並不全盤否定，但堅持金融主權，反對已開發國家利用全球機制操控國際金融及貿易體系，繼續剝削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權益。中共一貫認為，現行的全

¹¹⁰ 許紀霖，「普世文明，還是中國價值？——近十年中國歷史主義思潮之批判」，頁 34。

¹¹¹ 同前註，頁 37。

¹¹² 同前註，頁 29。

¹¹³ 秦暉，「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頁 63。

¹¹⁴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頁 216~217。

¹¹⁵ 潘維，「敢與西方展開政治觀念鬥爭」，環球時報，2008 年 1 月 28 日。

球金融及貿易制度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相當嚴重地壟斷，開發中國家一直到全球金融海嘯後才開始有發言權。由於這些年國力的提升，中共開始愈來愈有能力改變這種不公平的局面，但這改變的進程仍是逐步的，目前仍只是起步階段。

而晚近興起的區域整合風潮，對中共而言是聯合國之外另一個抗衡美國單極主義的機會。然而，因為現實權力條件的不足，加上中共必須以「不稱霸」減低他國對其崛起的疑懼，中共並不直接做東亞區域整合的主導者，而是透過以東協為核心的相關機制來促進對自身有利的區域整合。不過，中共顯然不希望美國介入東亞的區域整合，凡是有美國參與的區域機制，中共便傾向降低其政治整合的意涵，目前其對於東亞高峰會的態度正是如此。由中共直接做主導者的合作機制則是上海合作組織，中共雖有意將之作為創建國際新秩序的起點，然而其本質上仍是出於權力平衡需要而締結的產物。

分析過中共對全球及區域政經制度的觀感後，本文發現箇中的癥結在於對「普世價值」的詮釋權，包括主權和人權間的輕重次序，以及修正西方個人主義的「發展權」觀念。2008年北京奧運及全球金融海嘯以來，中國大陸學界開始湧現議論中國模式的風潮，但內部對此的態度並不一致。客觀而言，所謂的中國模式仍只停留在強調多元價值和平共處，迄今為止尚未能為世界提供一套完整的知識體系。

第五章 中共「和平崛起」的前景評估

本文在第二章中，就中共官方宣示之「和平崛起」戰略構想進行研究，發現其所承載的意涵，雖是以「維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利國內發展」這一核心觀念連結「和平崛起」的對內與對外性，但實際上卻是將「和平崛起」的戰略意圖大大侷限於對內性，而迴避了更多關於「正在崛起的中國希望怎樣的世界」的具體問題。缺乏對這方面更為詳盡的理解，我們便無從確知中共「和平崛起」的終極目標，從而也沒有依據對中共「和平崛起」的前景進行評估。因此，在之後的第三、四章中，本文分別從國際權力格局及國際制度兩個方面考察中國大陸官方、學者的相關論述與實際作為，以求歸納出中共「和平崛起」所追求的國際秩序。

事實上，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一國對於外在世界的觀感會隨著其權力格局的改變而有所調整。不過，在一定的時間範圍裡，世界權力格局不至有大規模的變動，因此才能產生一套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秩序。本章綜合前面幾章的考察結果，總結出當前中共思考國際秩序的一套理路，以確定中共「和平崛起」在對外部分的預期目標。此外，並配合國內及國際的制約因素，推測中共可能採取的因應策略，進而評估中共「和平崛起」的前景。

第一節 中共「和平崛起」的目標

一、「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的內外連動

如果遵循中共官方的主調，將「和平崛起」的概念等同於「和平發展」，那麼中共和平崛起所要達成的目標，官方似乎已說得很清楚，那就是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1.從 1981 到 1990 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基本解決人民溫飽問題；2.從 1991 年到 20 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達到 10000 億美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800~1000 美元；3.到 2050 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

實現現代化目標。¹而對於 20 世紀頭二十年的這段「戰略機遇期」，官方也對經濟增長和結構、資源和環境、科技教育、扶貧和公共服務等各個細項列出預計達成的指標數字。²然而，這些都僅說明了中共在國內建設方面的計畫，並未涉及中共對國際秩序的構想。根據西方現實主義的一貫論點，當一國國力崛起後，勢必會嘗試將國際秩序朝對自己更有利的方向調整。那麼，中共始終混淆「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意涵的官方論述，是否僅是為了掩蓋真實意圖而提出的說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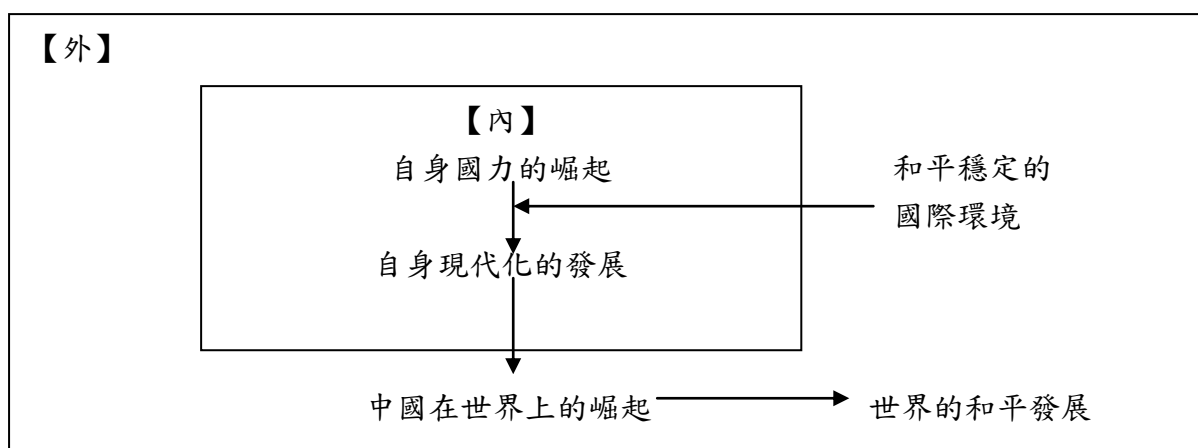
本文考察的結果顯示，中共的確有意以自身發展淡化「崛起」本應有的對外意涵。不過，中共之所以這樣表述，是因為在中共的認知裡，無論內政還是外交政策的出發點都是先為了自身的發展，然後才擴展出來一套內外連動的關係。在閻學通看來，「和平發展」只有純對內的概念，而「和平崛起」才是與其它國家比較的概念。³本文則認為，精確地講，「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同時都有其對內及對外的意涵。也就是說，對中共而言，先是藉由自身國力的崛起，完善國內的現代化建設，而也只有進入到已開發的階段後，才能達到中國在世界上的崛起，進而幫助解決全球的發展問題。不過，在自身崛起乃至完成發展的過程中，中國亦非常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相配合，並盡力以和平手段排除外界對其發展的阻礙，從而展現如圖 2 所示的內外連動關係：

¹ 胡鞍鋼，**中國 2020：一個新型超級大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頁 177。

² 同前註，頁 192。

³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陳琪、劉丰主編，**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3~32

圖 2：「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的內外連動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 2 顯示，對中國內部來說，自身國力的崛起促進了現代化的發展。但是，正如中共自己說的那樣，「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⁴中國國力的增長得利於全球化的世界貿易，唯有國際環境的和平穩定才能確保中國持續發展，因此從「自身國力的崛起」進渡到「自身現代化的發展」的過程中，便有了「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這一來自外界的因素。之後，由於中國完成了自身的現代化發展，也才能在世界上崛起，進而如中共所言「為世界的和平發展做出貢獻」。⁵經過本文前兩章考察中國大陸官方、學者的相關論述與實際作為，可發現中共對「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的思考存在著上述此種內外連動的關係，因此從某個意義上來講，「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確實是一體兩面。

然而，圖 2 主要說明的是「崛起」與「發展」的邏輯關係，對於「和平」與「崛起」之間的關聯則又有待下面繼續的探討。本文在第二章中已提到，閻學通曾整理出「和平」與「崛起」三種可能的關聯：1. 「和平」與「崛起」都是目標；2. 「和平」是達成「崛起」的手段，「崛起」才是目標；3. 「和平」才是目標，「崛起」只是手段。當時，基於中共決策者的一些表態，本文認為中共認知

⁴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新華網，2011 年 9 月 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 (瀏覽日期：2012 年 12 月 16 日)

⁵ 同前註。

的應是第一種關聯，最多是把「和平」當成是比手段位階更高的一種「崛起」的條件。⁶經過第三、四章的考察後，本文再次確認了這個判斷，並發現中共對於外交戰略的思考，已呈現一種極具理性的現實權力的判斷。中共之所以認定「和平」是達成「崛起」的主要條件，既是認識到自己實力的不足，更是由於其關注的眼界仍以自身國家利益為主，即便對國際秩序有意見，也是只針對其中會直接傷害到她發展利益的部分。中共認知的「和平」具有相當現實的成份，乃是經審慎的利害權衡後，認定以和平手段更能突破當前國際秩序對其發展的壓制。

質言之，中共並沒有美國那樣的野心，將整套國際秩序的利益與自身國家的利益劃上等號。至少到 2020 年前，中共不相信自己能發展到去擁有這樣野心的能力，現實情況亦是如此。如同中共對於「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之間內外連動的思考邏輯，其看待國際秩序的角度，同樣也是不執著於意識型態，完全以自身發展利益為考量的保守思維。

二、中共思考國際秩序的理路

本文在第一章中就指出，西方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研究，主要圍繞在崛起的中國是一個「維持現狀強權」(status quo power)抑或「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的論辯上，西方學界並且從權力、制度、價值觀的角度，得出「中國必然威脅國際秩序」、「中國不會威脅國際秩序」、「中國可能威脅國際秩序，但可避免」三種判斷。⁷但是，經過深入研究中對國際權力格局與制度的觀感後，本文認為：西方這種對於中國是否威脅國際秩序的爭論，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假議題。

本文何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西方關於此問題的爭論，基本都忽略了對「國際秩序」的定義問題。何謂國際秩序？本文於第一章已揭示，國際秩序是一套各國所能接受的規則及追求，在現實權力格局下運作的結果。也就是說，它同時包含權力格局與制度這兩部分，而後者托生於前者，然後再影響前者。在西方

⁶ 見本文第二章第三節。

⁷ 見本文第一章第二節。

學界相關的討論中，經常質疑的是中國對現存的制度不滿意，所以產生了透過改變權力格局來推翻制度的意圖。然而，這就迴避了一個關鍵點：現存的制度是什麼？誰來詮釋國際制度的「合法」標準？

在中共看來，聯合國憲章是國際制度的法理依據，如同一國內部的憲法一樣，所謂的國際制度一旦違背聯合國憲章就是「非法」。不僅戰後西方主流的國際法論述支持此一觀念，包括國際法庭及制定全球政治準則的條約（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皆是置於聯合國的架構下。⁸因此，中共非常強調維護聯合國的既有體制，也就是堅持主權平等及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由安理會判定特定情勢是否發展到威脅國際和平穩定的地步，並決定如何採取因應的措施。準此，中共實際上是國際制度的維護者、捍衛者。反之，美國繞過聯合國單方面發動伊拉克戰爭，其所展現的才是改變國際秩序的「革命」力量。⁹然而，美國憑藉其在全球政治中的實力，經常掌握對國際制度的主要立法權力，尤其是在民主、人權這類西方主流認知的「普世價值」方面，這就使得美國得以壟斷對「國際制度」的定義權、詮釋權。如此，當西方世界討論中國是否會威脅國際秩序時，其實並不存在一個客觀的標準依據。

再從權力的觀點論之，西方現實主義者普遍主張，隨著中國國力愈來愈強，必定會企圖將國際秩序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調整；更為極端的論者則堅信，中國將會永不休止地擴充權力，從而與當前唯一的超級大國發生衝突。然而，這類的論調實際上模糊了一個現實主義陣營內部爭辯已久的問題，即「權力」究竟是一國的目的還是手段。古典現實主義認為，追求權力是人天生的慾望，國家也不例外，權力本身就是國家行為的目的。但是，後來的結構現實主義則把重點放在安全，國家先是要安全，權力則是國家保障安全的手段。守勢現實主義進而再指出，國家實際的目標是安全，一味增加權力的結果可能反而引發他國的疑心，反

⁸ 本文對戰後西方主流的國際法論述的理解，主要根據國內國際法權威學者丘宏達的專著：丘宏達著，陳純一修訂，*現代國際法*（台北：三民，2012 修訂三版）。

⁹ 珍妮·克萊格(Jenny Clegg)著，葛雪蕾、洪漫、李莎譯，*中國的全球戰略：走向一個多極世界* (*China's Global Strategy: Toward a Multipolar World*) (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頁 204。

倒更不利於安全，因此國家出於安全需要，並不見得會一直擴張權力。¹⁰

本文在探討過相關文獻後，即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較適合作為了解中共對外戰略的研究途徑，如今經第二、三章的考察後，證實了這個判斷基本正確。中共對於國際秩序的觀感，一方面固然受現實權力條件的制約，但並非純粹以「權力平衡」為考量，而是經過「認知」這一媒介——也就是對實際情況是否威脅到其重要利益的判斷。在中共看來，所謂的重要利益就是自身的現代化發展，當中共選擇擴張權力時，並非出自於稱霸的野心，而是維護自身的發展利益不受侵害。

三、中共追求的崛起目標

正如前面所述，中共認知的崛起同時含有對內及對外的成分，就對內而言，即遵循鄧小平「三步走」的進程，追求中國於 2050 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至於對外的部分，則須要藉由中共思考國際秩序的理路來解析。因此，這裡所謂的「崛起目標」便專指其對外部分而言。首先，對於全球權力格局，中共明確提出「多極化的世界」，這既是中共對國際局勢走向的評估，亦為中共期望實踐的外交政策。中共不願看到國際政治被單獨一個超級強國所壟斷，因為這將助長該超級強國愈來愈傾向霸權主義，也就是將自身的國家利益和全球利益高度網綁在一起，迴避他國的制衡。中共是透過對美國實際作為的觀察得出這樣的結論，而由於美國是國際政治史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筆者無法推估，如果由他國取代美國的超級強國地位（包括中國自己），中共是否同樣追求多極化，但可以確定的是，中共對當前美國一超壟斷的局面是不滿意的。

為了避免刺激美國的戒心，中共經常表示不會挑戰美國的一超地位，或僅反對美國的霸權行為。但是，中共打從心底不相信美國會自我克制，認為只要美國保持一超地位，就不會放棄霸權主義的外交政策。中共尤其認為，美國將利用其

¹⁰ 秦亞青，*權力·制度·文化：國際關係理論與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25~53。

地位及西方資本主義的強勢話語權掌控作為當今世界主題的發展問題，從而制約中國這樣一個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因此，取代美國不見得是中共的崛起目標，但肯定要改變美國獨霸的局面。

這樣的一套多極化的思想，走得極端一點，就會演變成消滅任何強權的「非極化」，也就是各國從法理到實力上都是平等的，或者實力雖有大小之分、但沒有特定作為國際政治領導者的「大國」存在。然而，這顯然是不現實的，因為缺乏「中央政府」的國際社會要有秩序，必然需要大國的領導，而一旦國際社會失去秩序，就很難維持中共發展所需要的穩定環境。因此，中共所要達成的多極化，仍然有權力的等級之分，只是反對由美國單獨凌駕於其它大國之上，而應由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大國共同領導國際秩序，鄧小平所言「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麼樣也算一極」就是這個意思。¹¹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社會不存在超級強國，參與「集體領導」的各個大國都沒有大到成為超級強國的程度。中共基於現實權力條件及自己反霸權的正當性需要，並未將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強國視為是其崛起的目標。

另一方面，中共雖視大國政治為穩定國際秩序的力量，但又理解到主要大國皆為已開發國家，將可能形成資本主義霸權剝削開發中國家，從而也危害到中國自身的發展。因此，中共從 90 年代初就主張要改革全球經濟制度，將更多開發中國家的代表納入全球經濟制度的制定過程中。2008 年金融海嘯爆發，提供了國力已大大增長的中共推動全球經濟制度改革的機會，目前看來，中共正以非常審慎的態度尋求完成改革，同時避免外界認為其要做開發中國家的領導，至於改革的程度則重於提高開發中國家的發言權及決策權。有學者提出要從更多面相調整大國政治決定全球經濟制度的模式，¹²中共對此並沒有非達到不可的明確目標。可以說，中共對全球經濟制度的改革問題仍持保守態度，主要以保護自身利益為主，雖自居為開發中國家的代言人，但並未擁有扭轉全局的意圖。基於同樣

¹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353。

¹²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頁 121。

的邏輯，中共在全球政治制度上是傳統主權原則的堅定捍衛者，也是聯合國原有體制的維護者，既強調各國平等協商，同時又不反對安理會大國政治的決策方式。

總的來說，中共認為當前的世界正處於從「一超多強」逐漸轉變成多極體系的過渡階段，中共的崛起戰略是「先求發言權、不爭執政權」，也就是強調各國都可以有自己的制度和價值觀，中國並不向其它國家強推自己的發展模式，但也希望他國尊重中國的模式，各國之間可以「和而不同」。中共從和平相處五原則、國際關係民主化、新安全觀、和諧世界這一路下來的論述正是闡述此一觀念。對中共來說，現下並不刻意和美國爭奪國際政治的領導地位，而是加強將自身實力轉化為對國際政治的發言權，以期加速國際政治多極化的趨勢，最後達到與其它大國在國際政治中「共同執政」的目標。

第二節 中共「和平崛起」面臨的制約

中共經長期衡量自身實力及世界形勢後，在內心裡歸結出對於自身在國際上和平崛起的預設目標，同理，要評估中共追求這些目標的前景，亦要從其自身實力及世界形勢觀察起。國內與國外的情勢存在著對中共「和平崛起」的制約，進而可能改變中共在既定目標下的戰術策略。因此，以下將考察國內外對中共「和平崛起」的制約因素，並藉此評估中共「和平崛起」的前景。

一、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猜忌

中美兩國各自既是崛起國與霸權國，同時也是最大的開發中國家與最大的已開發國家，從純粹權力的角度觀之，兩國的關係當然是矛盾的。不過，經第一章文獻探討的整理後，本文發現了其中真正的關鍵，那便是無論從權力抑或制度的角度評估中國的崛起，西方世界對中國意圖的認知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這種相當主觀的心理猜忌，才是制約中國崛起的最主要因素。

美國無疑是西方世界在看待中國時的意見領袖。雖然中美兩國的合作持續在

擴大，但合作的層次卻多限縮在低政治層次的事務，而呈現出低政治的合作看似掩蓋、實際上卻無法抵消高政治矛盾的態勢。¹³說到底，這便是美國始終對中國崛起難以去除的不安情緒。¹⁴照理講，中國一直奉行防禦性的軍事政策，恪守以聯合國憲章為準則的國際政治制度，從不以「行動自由」為戰略目的，反倒是美國公開聲稱其採取行動「無需聯合國或任何人的批准」，將行動自由視作是其必須擁有的制定規則和設置全球日程的權勢，¹⁵那麼，真正挑戰國際秩序的應是美國而非中國。然而，由於美國在價值觀上擁有道德優勢，美國得以在西方話語體系中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反過來將中國捍衛自身主權的行為指為是對國際秩序的威脅。就是在這樣的表述下，中國合理自衛的行為成了中國威脅論的支持論據。可以說，如同攻勢現實主義這種看似以「客觀」權力作為基礎的理論，實際上也靠著對中國威脅的「主觀」認定，而增加了其科學性的說服力。

比如，在政治及安全事務方面，美國將中國保衛釣魚台及南海主權的舉措視為是對區域秩序的挑戰，中國在北韓及伊朗的核武問題上沒有完全站在美國的立場，也成為另一項中國不接受國際政治制度的證據。¹⁶在經濟事務方面，美國至今不承認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是市場經濟，將中美一些貿易衝突上升為對中國不遵循自由貿易規則的指控，認為中國推動東亞整合是為了另創與 WTO、IMF 等全球機制分庭抗禮的體系，並指責中國擁有極高的 GDP 卻拒絕與已開發國家承擔對於全球環保問題的相同責任。¹⁷美國對中國這樣的認知使其國內對華強硬派始終不衰，主張既然中國企圖要衝撞以美國利益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就不應繼續任由中國國力增長，而必須及時對之壓制。¹⁸美國國內的軍工複合體更藉此找到

¹³ 宮力，*如何與美國共處：冷戰後中國對美方針與中美關係*（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頁 233。

¹⁴ 陳有為，「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在於不確定性」，*星島環球網*，2006 年 4 月 13 日，
<http://www.stn.cc:82/op_ed/ed_china/t20060413_189452.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¹⁵ Ron Huisken, "The Road to War on Iraq," *Canberra Papers on Strategy and Defense*, No. 148, p. 55, Strategic Defense Studies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3.

¹⁶ Aaron Friedberg, "Bucking Beijing: An Alternative U.S. China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5 (Sep/Oct 2012), pp. 48-58; John G.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3 (May/ June 2011), pp. 56-68.

¹⁷ Ken Miller, "Coping With China's Financial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4 (Jul/Aug 2010), pp. 96-109.

¹⁸ 陳知涯，「塑造中美軍事關係」，收於理查德·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顧國良主編，

說服美軍技術轉型的藉口，即以對華作戰作為標準的假想認定。¹⁹攻勢現實主義從客觀解釋國際現象的理論，反過來成為推動國際現象的外交思想。

當然，在小布希總統時期達到鼎盛的此種強硬思維，已經受到美國國內自由派學者及歐洲國家的批評。美國自由派學者察覺到，這種思維逐漸傾向於認為美國鼓吹全球貿易是助長了中國的經濟崛起，而產生一種只談自身利益的閉鎖心態，忽略了美國的超強國力正是建立在以全球利益為關照的胸懷。²⁰也有學者兼從現實角度考察，主張在全球化的時代不宜以傳統權力硬碰硬的方式對付中國，而應延續柯林頓時期的接觸政策，藉由「中美共治」這種機制，引導中國成為西方價值體系下負責任的一員。²¹正是由於西方世界也有對華懷柔的聲音，才讓中共相信美國霸權並非鐵板一塊，可以在體制內順應多極化的趨勢將之瓦解。

不過，這類對華懷柔的思維，卻比攻勢現實主義者帶有對華更深層的矛盾，那便是其和平演變中國價值觀的企圖。在自由貿易方面，這種矛盾還不強烈，美國期待中國能隨著經濟的成長愈來愈趨向市場經濟，而中國對此並不特別反對，只是希望同時兼顧開發中國家的權益。然而，在政治方面，自由派論者卻始終認為中共「一黨專政」的制度是對國際秩序的潛在威脅，並且從意識型態上相信中共為了維持其統治正當性，將採取對外擴張的民族主義，爭取成為東亞地區的霸權，以恢復其歷史的光榮地位。準此，根據美國幾十年來遏制歐亞大陸出現「懷有敵意」(hostile)政權的大戰略，中美便有根本性的衝突。²²諷刺的是，美國學者又指出，即便中國大陸民主化，其對國際秩序的威脅也不能得到解除，因為歷史的記錄顯示在一國民主化的過程中，內部的動盪和與他國的衝突將會加劇。²³這樣糾結的思維，往好處想，是靜待中國自身的和平演變，但若往壞處想，似乎就

力量與克制：中美關係的共同願景(*Power and Restraint: A Shared Vision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0)，頁 72。

¹⁹ 同前註，頁 58。

²⁰ Michael Beckley,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3 (Winter 2011/12), pp. 76-78.

²¹ Aaron Friedberg, "Bucking Beijing: An Alternative U.S. China Policy."

²² Ken Miller, "Coping With China's Financial Power."

²³ 同前註。

是宣告中美之爭無解了。

錢其琛擔任中國大陸外交部長時曾表示：「中美關係的歷史表明，兩國關係從來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意識型態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²⁴事實上，即便是反對美國單邊主義、支持國際政治多極化的歐洲國家，與中共也會在民主、人權等這類價值問題上發生衝突。協調這種對立的最佳方法是回歸現實主義，同時又必須消除「崛起國與霸權國必然衝突」的攻勢現實主義觀念，而能理性地運用外交手段劃定出各自核心利益的範圍，即如季辛吉所言，在雙方利益重疊最高的亞太地區共建「太平洋共同體」。²⁵西方世界如能去除對中國如何運用權力的預設立場，務實地與中國做權力上的分配與妥協，反而能創造共同發展的可能。

二、詭譎多變的東亞局勢

近年來，全球經濟重心逐漸東傾，加上東海、南海的領土爭端及北韓核武問題，東亞顯然成為了國際政治的熱點，當中糾結了大國的博弈，且都直接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巧合的是，幾乎就在美國歐巴馬政府重新積極介入東亞後，區域局勢開始轉趨動盪。美國學者認為，美國是因為中國對領土爭端的態度愈來愈強硬，所以才決定「重返亞洲」、「轉向亞洲」、「再平衡亞洲」這一連串的策略。²⁶然而，看在中國眼裡，卻是因為美國的「攪局」，才激發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矛盾。中國學者判斷，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目的主要還是經濟利益，但其選擇以軍事的手段制衡中國，迫使中國也升高軍事舉措反制美國，從而反過來讓東亞國家感到威脅，不得不在軍事上仰仗美國，最終陷入一種威脅恐慌的循環。²⁷準此，中國認定美國在玩弄分化東亞的伎倆，刻意在中國周邊製造事端，阻滯中國和平

²⁴ 「中美關係：人權問題是關鍵」，求是理論網，2012年2月20日，

〈http://big5.qstheory.cn/gj/gjsspl/201202/t20120220_139743.htm〉(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²⁵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1).

²⁶ Ken Miller, "Coping With China's Financial Power."

²⁷ 宋鎮照，「美國重返亞洲的企圖與策略：霸權地位保衛戰」，海峽評論，第266期(2013年2月號)，〈<http://www.haixiainfo.com.tw/266-8657.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崛起的機遇。

顯然，這種思維本質上就是傳統的權力平衡。美國多年來受到中東戰事的拖累，忽略了對東亞局勢的經營，加之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信心大不如前，美國衰退論日益高漲。為了填補這種不安，歐巴馬最近一次向美國國會提交的國情咨文宣示，美國必須更堅定地維持在全球的領導地位，而重返亞洲就是立基於此一目標的戰略。只是，美國過於強硬的表態，卻可能讓其傳統盟國中的右派勢力抬頭，希望藉此炒作民族激情，挑戰既有的區域格局，進而衝擊到中國的核心利益，意外使東亞局勢愈來愈朝軍事對抗的方向發展，反而偏離了美國原本的目標。

2012年菲律賓逮捕在黃岩島海域捕魚的中國漁船的事件，即被中國認為，是因為有美國在後面撐腰，菲律賓才會如此放肆。之後中、日兩國在香港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台後展開的一系列衝突中，美國偏袒日本的態度更是明顯。美國雖然宣稱對釣魚台的主權歸屬沒有立場，但卻承認日本對釣魚台擁有管轄權，並明確宣示釣魚台在美日安保條約協防的範圍之內。美國此舉讓中國覺得，美國可以不論是非只講權力，為的就是拉攏盟友聯合制中，中國惟有展現實力及不惜一戰的決心，才能捍衛自身的權益。²⁸中國將日本「國有化」釣魚台的作為定調為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否定，而美國無疑是日本推翻戰後國際秩序的幫手。中國外交部稱：「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美方上述言論枉顧事實，不分是非，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²⁹此後，中國分別在釣魚台周遭的海上及空中與日本對峙，實際上打破了日本在「國有化」之前就已實質控制釣魚台的局面。美國在中日戰火一觸即發的情形下，官方開始坦承對日本右翼言行保持沉默是不智的，³⁰美國主流媒體也轉為強調中美戰略互惠關係，呼籲調整過度偏重「聯日制中」的策略。

²⁸ 林國炯，「戰雲密布的釣魚島」，*海峽評論*，第266期(2013年2月號)，

〈<http://www.haixiainfo.com.tw/266-8664.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²⁹ 「外交部：釣魚島問題美國負有不可推卸歷史責任」，*環球網*，2013年1月20日，

〈<http://world.huanqiu.com/regions/2013-01/3553088.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³⁰ 「安倍挑釁言行 違背美戰略利益」，*旺報*，2013年1月15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wantdaily/11052101/112013011500576.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作為中共智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於去年年底發佈的《國際形勢黃皮書：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的結論中，認為美國重返亞洲的種種戰略實踐，正在加劇中美之間的對立，並向周邊一些國家傳遞錯誤的訊號；美國並有意利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矛盾，從而牽制中國以增強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³¹看在中國眼裡，美國除了與日本、南韓進行數次的大規模聯合軍演，其近岸戰艦還使用新加坡、泰國、越南、菲律賓、澳洲等國的海軍基地，此外又聯合了包括俄國在內的二十二國進行海上聯合軍演，卻獨獨排除中國，其針對性不言而喻。³²而一向奉行等距外交的東協國家，在同時面對中國崛起與美國重返亞洲的情形下，也就只有採取「經濟傾中、政治傾美」的政策，企圖在在中美權力平衡中獲得自身的國家發展與安全。³³

北韓自今年 2 月發動第三次核試爆後，其引發的核武危機為東亞局勢及中美博弈帶來另一嚴峻挑戰，美國《時代》雜誌(*The Times*)更稱，東亞地區的緊張程度，足以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歐洲情勢相提並論。³⁴北韓展現的態勢是，雖然其無意也無力攻擊美國本土，但卻可能對美國的盟友日本發動攻擊。此前一段時間中、日釣魚台爭端最為激烈時，日本右派勢力抬頭，安倍晉三當選首相，如今面對北韓的軍事威脅，乃以強硬的姿態回應，並有意將自衛隊改名為國防軍，以提振日本軍隊的士氣。³⁵最新的發展是，日本內閣已通過籌組「國家安全會議」的法案，企圖建立一套由首相直接統轄各部門的外交戰略機制。³⁶一旦日本對美國提供的保護傘失去信心，執意擴張自身軍事力量，中國將基於對日本的疑懼予以更強硬的壓制，美國則勢必牽涉其中，直接影響中國核心利益的東亞局

³¹ 「中國社科院黃皮書：不能排除釣魚島危機升級風險」，**新華網**，2012 年 12 月 24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24/c_114137142.htm〉(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³² 宋鎮照，「美國重返亞洲的企圖與策略：霸權地位保衛戰」。

³³ 同前註。

³⁴ 「美《時代》雜誌指責中國引發東亞緊張 稱似火藥庫」，**環球網**，2013 年 2 月 2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2/3611516.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³⁵ 「安倍晉三再次強調欲把自衛隊改為『國防軍』」，**中國新聞網**，2013 年 2 月 16 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gj/2013/02-16/4565211.s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³⁶ 「日內閣準設國家安全委員會 意在加強一元化領導」，**中國新聞網**，2013 年 6 月 8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08/c_124833748.htm〉(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勢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衝擊中國崛起所需要的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

面對這樣詭譎多變的東亞局勢，美國國內也開始出現調整東亞政策的議論之聲。作為東亞區域真正的隔岸平衡者，美國的態度無疑是至為關鍵的。歐巴馬在開始第二任總統任期後，便以相對穩健審慎的克里(John Kerry)接替作風強硬的希拉蕊擔任國務卿，而克里在即將接任之際便明確表示美國不必然要在亞太地區增強軍力。³⁷一向立場保守、反共的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在此之後發表專論，稱「歐巴馬以亞太為樞紐的政策甚合時宜」，不免令人質疑美國決策圈已出現政策鬆動的跡象。³⁸在今年 3~4 月號的《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上，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發文稱，中美兩國應該面對彼此競爭的現實，主動引入新的戰略架構以取代被動的危機個案處理，新的戰略架構應藉由兩國領導人的定期會晤，確定彼此的共同利益及各自不可挑戰的核心利益。³⁹陸克文的建議和季辛吉的「太平洋共同體」正有異曲同工之妙。目前看來，中美兩國元首於 6 月上旬在美國加州安納伯格莊園(Annenberg Retreat)的兩天私人會晤，已經朝這個方向踏出了第一步。

三、中國自身的發展情況

中國之所以在近年來愈來愈受國際重視，主因無疑就是其國力的快速提升，當中尤以經濟成長最為明顯。按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一國之外交行為受其對國際局勢的認知所決定，而該認知又為國際權力結構及其自身的實力所制約。因此，在觀察全球及區域層次的現實情況後，下面便就中國自身的發展情況再作了解。

中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發展的成就舉世共

³⁷ 「美『準國務卿』聽證會上對華示好」，新華網，2013 年 1 月 2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1/26/c_124281792.htm〉(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³⁸ Jim Hoagland, "Obama's well-timed 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8 2013, 〈http://articles.washingtonpost.com/2013-03-08/opinions/37559381_1_new-chinese-leadership-china-maritime-power〉(Accessed June 8 2013).

³⁹ Kevin Rudd, "Beyond the Pivot: A New Strategic Roadmap for US-China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2 (March/April 2013), pp. 14~15.

睹。不過，由於中共遵循的是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政經體制，關於其發展無法持久的「中國崩潰論」，一直與「中國威脅論」一起主導西方輿論很長一段時間。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伴隨東歐劇變及蘇聯解體，西方學界對中國大陸的發展長期抱持疑慮，然而往後的發展實際上證明，西方學界大大低估了中國大陸的發展。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由於中國相對受到的傷害較低，國際社會開始熱議中國的發展模式及前景，一場針對中國發展是否持續的辯論，迅速地在國際關係學界鋪展開來。

認為中國發展無法持續者多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靠的是國家部門的高度主導，這樣的模式早晚會遭遇瓶頸。中國在此種模式下得以「左右逢源」，也就是既可以如左派那樣擴大政府的權力，某些時候又能傾向右派推卸政府的責任，使得國家在控制經濟結構時有很強的靈活性。⁴⁰如此看似有利於快速的發展，但實際上卻是「自由、福利雙不足」，亦即私人產權與社會福利皆未獲得足夠的保障。⁴¹美籍華裔學者裴敏欣(Minxin Pei)指出，中共為了滿足其統治合法性，須要亟力衝高其經濟成長，但在上述這種特殊體制下的發展，卻是以社會福利及生態環境作為代價，從而引發人民的反彈。為了平息人民的不滿，中共乃更加依賴於經濟的發展，最後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累積愈來愈多的「社會欠帳」。⁴²準此，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存在著相當大的隱憂。

此外，中國大陸的經濟型態被認為是外向型，也就是高度依賴於出口、依賴於西方市場。客觀來說，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靠的是全球化的環境、國內的高人口與低工資、以及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才得以運行。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中國大陸作為後發展者，可以從先發展的國家那裡模仿到技術，並且從她們的發展經驗記取教訓，完善自身的發展。不過，另一位學者楊小凱則認為，正因為如此，中國已習慣於模仿他國的技術，缺乏動力在根本性的制度上作有利於長久發

⁴⁰ 秦暉，「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收於何迪、魯利玲編，**反思「中國模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49。

⁴¹ 同前註，頁67。

⁴² 裴敏欣，「危機隱現」，收於**反思「中國模式」**，頁119。

展的改革。⁴³要達到這種根本性的改革，中國大陸當前的政治體制似乎也須跟著變動。

不過，在中共看來，維持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才是推動經濟制度改革的保證。中共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已闡明，要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的方式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的方式轉變。⁴⁴為了提升國內消費市場，中共也注意到了增進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的重要性。但是，不同於西方學界普遍認為的必須藉獨立於政府的公民社會來解決以上問題，中共反倒認為要加強政府對所謂人民團體活動的指導作用。對於近年來愈來愈多的民間反抗事件，中共主流意見亦認為是源於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責不協調，中央許多正確的政策無法貫徹到地方，而第一線處理事件的地方政府做出的反應不當，進而擴大的爭端。⁴⁵準此，解決的方式並非朝西方式民主的方向調整，而是加強中央政府的集中領導，尤其由中共黨中央掌握整個國家機制的大政方針。

近些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經濟飛速發展，城市中產階級愈來愈多，雖然不佔人口當中主要的比例，但卻在一定範圍內愈來愈握有發言權。以西方傳統的政治學觀之，這應是政治逐步民主化的徵兆。溫家寶曾在擔任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時表示，政治體制必然要搭配經濟發展，以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成就來看，其政治體制雖需改革但並未嚴重過時，因為政治和經濟「兩個輪子」一定是相互協調才得以運轉。言下之意，中共的政治體制並不需要大規模的變動。

台灣和大陸的學者也指出，中共的政治體制有其一套官員甄補的程序，政治菁英從地方到中央仍有堪稱公平的歷練、升遷機會，最高領導人也是在豐厚經驗的基礎上，經過中共核心圈人士的多數同意才出線。⁴⁶一般來說，中共一方面強

⁴³ 陳志武，「中國如何搭上全球化列車」，收於**反思「中國模式」**，頁 89。

⁴⁴ 「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的增長格局」，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7 年 12 月 17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5/6662531.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⁴⁵ 鄭永年，**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頁 114~135。

⁴⁶ 「朱雲漢：中國大陸興起與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重組」，**觀察者**，2013 年 1 月 21 日，〈http://www.guancha.cn/ZhuYunHan/2013_01_21_122289_3.s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調要深化改革開放政策，一方面則主張要按照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步驟循序漸進。在 1980 年代，極左及極右兩派曾有激烈的政治鬥爭，最後在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達到頂峰，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中間派被犧牲。⁴⁷不過，隨後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為改革開放定調，極端保守的元老派也日漸凋零，繼之而起的是信仰實用主義的技術官僚。江澤民、胡錦濤都繼承了這條路子，而自習近平上台後，部分西方媒體認為他更像毛澤東、鄧小平這類具有高度個人色彩的強勢領導人，在謀取利益的戰術策略上更加靈活，但也在攸關意識形態正確性的戰略立場上更加堅定。⁴⁸事實上，胡錦濤在對中共十七大的政治報告裡，已點出貪污問題是對中共統治的迫切威脅，當中甚至用到「亡黨亡國」這樣嚴重的字眼。習近平勢必要在維護一黨專政穩定性的同時，對政治體制作出適度的改革，以解決官僚腐敗的致命問題。

最後，在經濟及政治體制之外，還有更深層次的價值論述決定中國是否真正崛起。自清末自強運動以來，中國知識份子便一直探索中國發展之道，變革的對象從器物再到制度，最後一路直搗中國傳統的思想。五四運動高舉的就是「打倒孔家店」的全面西化路線。中共建政以後，毛澤東時期實際追求的是「反西方現代性的現代性」，雖然否定西方認知的現代化社會的制度及價值觀，但卻追求現代化要求的物質水平，其奉行的階級鬥爭語言也來自於西方的發展歷史。改革開放後的 80 年代，以「河殤」記錄片為代表的主流思潮，又改成接近五四的西化論調，主張要從「黃土地」走向「蔚藍色文明」。⁴⁹此種思潮雖也提出中華民族

Eric X. Li, "The Life of the Party: The Post-Democratic Future Begins 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1 (Jan/Feb 2013), pp.34-46.

⁴⁷ 朱新民、譚偉恩，「中國改革開放之政策評析：經濟、政治的改革與外交政策的調整及挑戰」，*東亞研究*，第 36 卷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13~17。

⁴⁸ 「美媒：習近平更具毛派色彩」，*中時電子報*，2013 年 6 月 9 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3616/132013060900579.html>) (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⁴⁹ 《河殤》是 1988 年 6 月在大陸中央電視台首播的六集電視紀錄片，總撰稿人為蘇曉康和王魯湘，該片由對中華傳統的黃土文明進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對西方蔚藍色文明的介紹，對包括「長城」和「龍」在內的許多長期被中國人引以為榮的事物進行了辨析和評判，同時表達了對西方民主文明的嚮往，對後來 1989 年的民運有一定的思想前導作用。

復興，但目的並不在強調中國文明不同於西方的特殊性，而是要引領中國文明融入西方現代化的普世價值。⁵⁰直到 90 年代後，隨著冷戰結束及中國國力明顯崛起，中國大陸的思想界開始對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歷史的終結」中標榜的西方自由主義勝利作出反動，強調要建立不同於西化的中國現代文明。⁵¹對此，提出「文明衝突論」的著名美國學者杭廷頓也曾論及亞洲國家或可發展出「非西化」的現代化文明，但具體的內容則仍有待探究。

90 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實際上處在「意識型態」真空的情況，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引領主流思潮轉向功利導向的實用主義，全力發展經濟。二十餘年下來的結果是，中國大陸確實在經濟表現上相當亮眼，但當中共憑藉自身實力開始也想爭奪國際話語權時，卻發現所謂的中國價值缺乏普世的胸懷，僅僅侷限於尊重各國發展模式、各種文明和諧相處之類的保守型思維。現代化的中國文明看似就是不爭論的實用主義，但要憑這樣薄弱的價值觀與美國比肩顯然不足，尤其在面臨西方世界的話語攻勢時更是難以招架。

第三節 中共「和平崛起」的前景

從現在開始到 2020 年，這段完全由習近平主政的時間，對中共來說，無疑是國內發展的重要轉換期。中外學者都判斷，到 2020 年前後時，中國大陸將取代美國成為全球 GDP 第一位的經濟體。當前，美國已表態願意與中國建立以全球事務為範疇的戰略合作關係，歐巴馬總統並公開宣稱「歡迎中國的和平崛起」，承認中國已經是個「世界大國」。⁵²然而，雖然中共一直將打破美國單極壟斷、建立多極共治的世界作為和平崛起的目標，但中共並不會在 2020 年前急於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中共這樣的選擇是基於對外在形勢及自身實力的理性考量，更

⁵⁰ 許紀霖，「普世文明，還是中國價值？——近十年中國歷史主義思潮之批判」，收於**反思「中國模式」**，頁 15。

⁵¹ 同前註，頁 16。

⁵² 劉屏，「歐巴馬：歡迎中國和平崛起 習近平：盼建立非對抗關係」，**中時電子報**，2013 年 6 月 9 日，〈<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3616/112013060900070.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是因為這與中國發展的利益不符。當前的中共相當務實，並不具有文革式的救世主情懷，而是首重自身現代化的建設得以完成，然後才期許能促進全球政經秩序更加公平合理。中共對全球多極化趨勢的判斷對其策略影響極大，根據此一判斷，中共相信美國霸權的終結將會是水到渠成，中共在此過程中只須要創造有利的條件。準確地說，中共之所以期待美國霸權終結，是因為中共對美國單極領導的世界總有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源自於美國確實擁有的超高實力，以及美國不放棄用其超高實力操控全球政經制度的企圖。

本來，中共自改革開放以後便逐漸參與、適應各種國際制度，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要求中國做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中共自也宣示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但是，在伊拉克戰爭中，中共卻發現對中國發出指責的美國，自己就繞過聯合國的機制實行單邊主義。後來美國發覺，這麼做使得不少歐洲國家也反彈，遂又尋求用較高層次的民主、人權等價值在聯合國尋求創建一些新的干預制度。在中共眼裡，這種在體制底下推翻體制的作法，遠比繞過體制的單邊主義更難對付，對中國的潛在威脅也更大。中共向來就堅守主權平等、不干預他國內政的原則，近年來由於查覺到美國「打著體制反體制」的策略，加上中東「茉莉花革命」的風潮，因此更加強硬地堅守傳統的主權原則。最近連續幾次在敘利亞問題上的表態便出自這樣的考慮，未來中共將繼續在聯合國及其它國際場合強化此一立場。至於在國際經濟制度方面，中共雖持的是改革立場，但就和其對多極化世界的態度一樣，雖有期許但不會表現得過強，因為中共深知自身的經濟模式隱含許多問題，無力去承擔過多的國際責任。簡言之，中共雖力倡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但主要奉行的是「不爭執政權，只要發言權」，中共並不在意一定要成為國際事務的主導者，而是藉由聯合開發中國家共同發聲，表面上看來為弱小國家出頭，同時也維護自身的發展利益。

中共真正在意的是東亞區域整合的步伐。對中共來說，東亞區域整合如能順利開展，便可將東亞區域事務的重心從地緣戰略導向經濟合作，如此有助於中國

規避美國及周邊國家的制衡。由於此一區域的地緣戰略直接影響到中國的核心利益，一旦美國加強對中國的圍堵，中國將被迫也加強自身的戰備，進而引發東協國家的畏懼，最終陷入無止盡的安全困境裡。因此，中共積極要促成東亞的區域整合。在實際的運作上，中共並不扮演檯面上的主導者，而是推動以東協為中心的各種區域機制，因為中共要的不是東亞獨一無二的霸主地位，而是在擴大與周邊國家共同利益的同時，破解美國的分化招數。有些學者提出一國在實力上升後，其心理上對威望、地位的滿足標準也會提高，從中國輿論經常流露的一種恢復清末以前在東亞地位的憧憬看來，這種感覺因素應也對中共爭取在東亞區域整合中扮演積極角色的作為產生作用。不過，中共推動東亞區域整合仍是基於發展利益的理性考慮，且威望、地位亦可算是一種政治動員力。

美國自 2010 年推出的「重返亞洲」策略，使中共感到核心利益面臨直接威脅。在此之後發生的中菲黃岩島衝突及中日釣魚台衝突，美國都被中國認為是背後的影武者。事實上，中共很清楚自身的實力不及美國，中共不僅沒有要爭取做東亞區域霸主的企圖，而且是盡力想淡化東亞區域的權力平衡色彩。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面臨一些隱憂，社會不安定因素也增加，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加強捍衛主權的象徵性姿態，以期安撫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維繫政府統治的基礎。然而，這種作法卻成了美國強硬派眼中中國威脅論的證據，他們藉此強調中共已趁著美國深陷中東戰事時養足能量，準備要在東亞擴張勢力範圍了。⁵³結果，美國加重其聯合盟友對中國的圍堵，卻反而才刺激中共擴張權力。如此，中共在發展現代化的防禦性軍力的同時，將愈來愈傾向於爭取成為區域內除美國以外的權力最高者，這不必然意謂其要做東亞事務的霸主，而是致力於維持優勢力量以求自保。

日本無疑是美國在東亞的最重要盟友，兩國不僅聲稱釣魚台在美日安保條約的協防範圍之內，還宣示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作為共同的戰略目標，明顯地干預

⁵³ 熊玠，「美國新政府與東亞：衡乎？對抗乎？」，*海峽評論*，第 267 期(2013 年 3 月號)，〈<http://www.haixiainfo.com.tw/267-8682.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中國堅定維護的主權事務。事實上，日本自戰後經濟崛起以來，國內一直有追求國家正常化的呼聲，其訴求主要就是推翻戰後由美國主導制定的「和平憲法」中的「非戰條款」。本來，要真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日本就必須擺脫在戰略上從屬於美國的地位，尋求與美國及中國兩強之間的等距外交，這種思維曾在鳩山由紀夫執政時盛行一時。⁵⁴然而，作為已開發國家的日本並不認為自己的實力比中國差，80年代美國認知的東亞潛在霸主是日本而非中國。在現實權力條件及心理因素的作用下，日本傾向與中國在東亞爭雄大過反對美國霸權。美國宣示重返亞洲後，日本右翼勢力藉機對中國展現強硬，既企圖幫助日本提升在東亞的戰略地位，也同時謀取自己在國內的政治資本。在2012年8月引爆的一系列釣魚台爭議風波中，時任首相的野田佳彥迫於壓力，一方面宣布「國有化」釣魚台列嶼的土地，一方面向中國說明這是避免右翼勢力「購買」釣魚台的折衷作法。此後日本國內的政治生態顯示，右派勢力大浮抬頭。中、日之間本就有歷史上未解的恩怨，如此的情勢發展更為中、日衝突升溫，既可能破壞中國和平崛起需要的穩定大局，也將迫使美國捲入其並不願意面對的東亞「熱戰」。

從根本上說，中、日衝突的控制關鍵仍在美國的態度，這是由權力格局決定的現實。美國總統歐巴馬在進入第二任任期後，對於圍堵中國的態勢開始有所收斂，連帶也影響日本輿論對釣魚台議題的風向，開始出現較多附和釣魚台確實「存在爭議」的聲音。不過，對於中共有意回歸到當年周恩來和田中角榮就釣魚台問題達成的「擱置爭議」的共識，日本官方卻直接予以否定。⁵⁵中共固然可藉由中美戰略合作的機制協調中日釣魚台危機，但當美國仍主張釣魚台在美日安保範圍之內，日本又不肯承認爭議的存在，中共仍有可能發動小規模的軍事衝突來維護主權。

北韓核武問題將是另一個影響中國和平崛起戰略的區域因素。針對北韓核試

⁵⁴ 「日本前首相鳩山『親華遠美』言論遭曝光 在日引發熱議」，**新華網**，2011年5月6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5/06/c_121385554.htm〉（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⁵⁵ 楊明珠，「日發言人駁擱置釣島爭議言論」，**中央通訊社**，2013年6月5日，〈<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306050174-1.aspx>〉（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爆及試射飛彈的舉動，中共選擇與美國、日本、南韓一樣發表譴責，指責這是對區域局勢造成嚴重威脅的行為，並聲明「實現半島無核化、防止核擴散，維護東北亞和平與穩定，是中方的堅定立場，中方強烈敦促朝方信守無核化承諾，不再採取可能惡化局勢的行動。」⁵⁶習進平與歐巴馬的會晤中，也再度強調「朝鮮半島的無核化」是中美共同的目標。⁵⁷不過，實際上來講，北韓在地理上為中國提供了與美、日勢力之間的戰略緩衝，且北韓的核武主要是針對美國的圍堵而來，按理中國與北韓應該在同一陣線才對。一些中國的輿論認為北韓為中國添麻煩，卻忽略中國大陸在 60 年代也是「寧要核子不要褲子」，藉由發展核武才贏得了獨立自主的發展環境。⁵⁸北韓透過核試爆及試射飛彈成功累積了談判籌碼，同時也向伊朗、古巴等受美國壓制的國家展示，對抗美國霸權，只有堅定發展核武才有出路。不久的將來，北韓這種作法可能在國際間帶起一種反美榜樣，屆時中共如何選定自己的立場，當中的拿捏考驗決策者的智慧。

未來到 2020 年的這段時間，中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仍被認為可以運作正常，改革應仍重於量變的改革，而在質變的程度上有其侷限。根據林毅夫的估計，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要到 2050 年才會趨緩。⁵⁹在政治方面，目前大陸社會雖湧現愈來愈多的官民衝突事件，但主要仍是以地方問題為主的個案，並未演變成對中共一黨專政的反政府運動。只要中共不發生大的政治動盪，中國的發展勢頭可望延續下去，累積更多在國際上崛起所需的權力基礎。⁶⁰至於在國際秩序的價值觀方面，中共對外宣傳的是各國不分大小平等共治的「國際關

⁵⁶ 「外交部：中國政府強烈敦促朝鮮信守無核化承諾」，**人民網**，2013 年 2 月 12 日，〈<http://world.people.com.cn/BIG5/n/2013/0212/c57507-20482096.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⁵⁷ 「中美首腦會談就促進朝鮮無核化等達成一致」，**中國評論新聞**，2013 年 6 月 8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5/7/2/2/102572220.html?coluid=148&kindid=7550&docid=102572220&mdate=0608154737>〉(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⁵⁸ 曾健民，「『朝核危機』聲中，堅持中朝友好」，**海峽評論**，第 267 期(2013 年 3 月號)，〈<http://www.haixiainfo.com.tw/267-8680.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⁵⁹ 張羽，「林毅夫駁『經濟崩潰論』：未來 20 年中國仍有年增 8% 潛力」，**中國新聞網**，2013 年 5 月 23 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5-23/4850509.shtml>〉(瀏覽日期：2013 年 6 月 8 日)。

⁶⁰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實力地位」，陳琪、劉丰主編，**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頁 24~25。

係民主化」，但其自身在國內推行的卻又強調威權穩定的政治體制，這種內外有別的价值論述，應是中共必須先自圓其說的。

第四節 小結

中共認知的「和平崛起」實際上具有對內及對外兩個層面的意涵，對內部分即依循鄧小平制定的「三步走」進程完成現代化建設，厚植綜合國力；對外部分則不直接見於中共書面的宣示，而必須藉由對其國際秩序觀的研究加以評估。本文發現，中共看待國際秩序的思維，符合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思考邏輯，即並非單純追求權力平衡，而是透過其決策者對權力結構的認知來決定。一些學者以為，隨著國力上升，中共對於自身權力地位的滿足標準將提高，但根據本文研究的成果來看，中共是在保護核心利益的需要下才選擇擴張權力，並不具有稱霸世界或東亞的野心。準此，基於中共對多極化趨勢的判斷，中共不急於和美國爭奪在世界或東亞的領導地位，而是順應潮流改變美國單極壟斷的局面，自然而然地達到以中國在內的多個大國共治的目標。

在現實權力條件的制約下，中共對捍衛國際政治制度中的主權原則會愈來愈強硬，但對於改革國際經濟制度的態度則趨於保守。從現在起至 2020 年間，中共將致力於東亞區域的整合進程，因為這有助於引導東亞事務的重心偏向經濟發展的共同利益，避免陷入傳統冷戰式的權力制衡。在運作技巧上，中共不直接扮演東亞區域整合的領導者，而是推動以東協為核心的區域機制。實際上來說，中共雖稱不排斥美國參與東亞的區域整合，但因為其對美國霸權主義的疑慮，中共反對拿有美國在內的區域機制作為治理區域內高級政治事務的主要渠道，尤其是涉及主權的安全議題。為了防止美國聯合周邊國家的圍堵，中共努力自我提升為東亞國家中的權力最高位者，與其說這是為了恢復昔日的榮耀，不如說這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安全及發展。

未來幾年裡，只要中共不發生大的政治動盪，其各方面的發展應能繼續提

升。不過，直接衝擊東亞局勢的區域安全議題將可能打亂中共原有的和平崛起戰略，如中日釣魚台之爭、北韓核武問題等，而這些背後的結構性主因仍是美國對中國的猜忌。除非中國周遭產生重大挑戰，否則中共對國際秩序仍將以順應為主，同時逐步轉化不斷累積的實力成為在國際政治中的發言權，藉此為多極化趨勢創造更多有利的條件。



第六章 結論

「和平崛起」對當今的中共而言，既是正在發生的客觀事實，同時也是內政與外交兩個層面兼具的國家總體戰略。本文發現，中共如何看待自身所處的國際秩序，亦即中共在追求「和平崛起」過程中抱持的國際秩序觀，乃是決定其外交戰略的關鍵因素。因此，基於這個前提，經由梳理中共關於「和平崛起」的思想內涵，以及統整、分析中共對國際權力格局與國際制度兩方面的言行，本文得出了中共看待國際秩序的一套思維。根據這套思維，本文對中共認知的崛起目標進行推敲，並評估中共於此後至 2020 年之間可能採取的策略及面臨的制約。

本文的結論分作兩節。在第一節中，本文綜合前面各章的研究發現，歸納出整體的研究成果。在第二節中，則根據本文的研究成果，就學界對於中共外交思維的理解提出建議，並兼論中國崛起的前景及台灣的未來。

第一節 研究成果

經由對中外相關文獻的回顧，本文從一開始就確立，要了解中共看待國際秩序的思維，便離不開中國自身的國力條件和其所處的權力結構。但是，權力條件與中共的國際秩序觀之間的關係不能過於簡化，現實主義典範強調的「理性」不具有絕對客觀的判準，單純以權力因素判定中國的崛起必然引發衝突並不合理。因此，本文選擇採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研究途徑，深入中共對國際形勢的認知，以掌握中共國際秩序觀的內涵。研究結果發現，中共對世界多極化趨勢的判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於中共相信全球化潮流會逐步稀釋美國對國際政治的單極壟斷，中共不會直接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而是在順應潮流的同時創造有利的條件，期待將自身的實力穩健地轉化為在國際政治中的發言權。就以中共官方的言行表現來看，中共希望美國單極壟斷的局面能夠終結是確定的，但似乎還沒思考到是要以自身取代美國、達成中美共治、抑或建立一個沒有超級大國的多極世

界。根據長時間內很難變動的國際權力結構及中國的實力條件，本文判斷，中共將傾向於追求一個包含自己在內的多極世界。

事實上，雖然中共在關於國際秩序的表述中，經常強調不分實力大小、各國平等協商的「國際關係民主化」理念，但在中共內心的思維裡，國際秩序仍要靠大國領導才能維持。在國內政治中，中共很清楚地表現出這種想法，也就是堅持透過一黨專政維持穩定，而面對國際政治，則不承認美國的唯一領導地位，但支持多個大國共同領導。基於這種想法，中共在現階段奉行的是一種「不爭執政權，但要發言權」的策略，也就是在多極化的趨勢下，透過擴大自身的發言權，自然地和其它大國一起「共同執政」。準此，中共反覆強調「不會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的說法，並不意謂中共放棄改變美國單極壟斷的現狀，而是不以蠻力衝撞，藉由和平手段促進多極化水到渠成。對中共來講，一方面因為自身實力距離全球超強還很遙遠，一方面也由於中共認為稱霸世界並不符合自身利益，中共並不具有爭當超級大國的野心，而僅追求成為多強共治的一員。確切地說，中共反對的是美國將自身與全球利益結合的霸權主義，因為這種霸權主義給予美國以國際秩序之名壓制中國發展的壟斷性權力。但是，基於對美國長期的觀察，中共認為只要美國作為一超的地位不變，美國不會改變霸權主義的外交行為。因此，多極化既是中共判斷的國際形勢，也是中共追求的世界權力格局。

在多極化的戰略目標下，國際制度對今天的中共來說是制衡霸權主義的工具。從孤立、適應再到主動提出創見，崛起的中國遵循國際制度，乃至成為體制的堅決捍衛者。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共強烈主張主權平等、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擁護以聯合國憲章為依據的規範。中共堅決反對近年來西方盛行的「人權高於主權」的論調，並以「發展權」作為理論基礎，主張人權只有在顧及不同社會的發展情況下才能獲得保障。延續此一概念，中共認為當前的全球經濟制度必須進行改革，開發中國家應該有更多參與制度創建的權利。不過，基於自身的經濟模式也面臨轉型階段，中共無意也無力領導全球經濟制度的根本性質變，迄今提

出的改革方案僅限於代表席次、投票權等「量化」的層次。中共重視的是對於國際制度的發言權和詮釋權，並沒有要推翻或主導國際制度內容的企圖。美國小布希總統當政期間，其頻頻繞過聯合國的單邊主義行徑讓中共能夠成功地運用國際制度加以制衡，且很容易得到歐洲國家的響應。然而，近年來美國轉為尋求在體制內鼓吹「人道干預」、「國家保護責任」等價值觀念，意圖制定新的國際干預制度，這樣的作為與一向講究民主、人權的歐洲國家相契合，使得中共相對居於話語體系的弱勢地位。

對於區域層次的國際秩序，中共的態度則明顯較為主動、強硬，因為此一層次的權力格局和制度機制直接影響到中共的核心利益。全球層次上的中美關係延伸到東亞秩序的運作，在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刺激下，從南海主權爭議到中日釣魚台之爭，中共感受到核心利益面臨威脅，且背後皆有美國的身影。鑒於東亞事務的重心仍有很有很重的權力平衡色彩，為了避免與美國衝突以保存實力，中共亟力推動以東協為核心的區域整合機制，藉此將美國希望營造的冷戰圍堵趨勢移轉為對中國較有利的經濟合作方向。在現實環境的逼迫下，中共將致力提升自身實力為東亞區域除美國外的最高者，這並不等於要爭取做區域事務的主導者，而是防止美國利用其東亞盟國壓制自己發展的機遇。

總的來說，中共雖常以帶有理想性的自由主義、建構主義語言詮釋其和平崛起的戰略，但核心思維仍是基於權力條件的現實主義邏輯。不過，這種現實主義思考並非以追求權力作為目標，而是將追求權力作為一種手段。中共追求權力首先是希望維護發展需要的穩定環境，然後才是進一步爭取在國際政治中的發言權，打破美國單極及西方價值觀壟斷的局面。在這種思考下，中共認定的崛起標準是成為東亞國家中權力最高位者，以及成為沒有超級強國存在下的多個強國之一。此外，中共認為中國的崛起必須也包含價值觀的崛起，亦即中國模式必須和西方認知的普世價值並駕齊驅，在國際政治中享有同樣的影響力。後者的目標對當前的中共來說有很高的挑戰性，且中共自己對中國模式的內容也沒有定論。準

此，中共並不具有要將中國模式向外推廣的企圖，而只是追求多種價值觀和平共處。

從現在起到 2020 年之間，中共將推動國內經濟朝內向型模式發展，要能成功完成此一轉型，就必須同時提升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水平，如此才能穩固健全的消費市場。只要中共不發生劇烈的政治風波，中國大陸的發展勢頭在這段時間內可望繼續維持。至於在建構中國模式的價值觀方面，中國大陸的知識界普遍以追尋現代化的中國文明作為共識，但迄今仍缺乏一套可供世界參照的完整體系。基於這樣的國內發展情況，中共在 2020 年前還沒能力達到其所認知的全面崛起，比較可能的是先確定東亞區域的多極化格局，但這正面臨美國重返亞洲及其帶動的周邊國家圍堵中國的制約。中共為維護自身發展的利益，有可能與美國的東亞盟國發生小規模的衝突，但這也將引發東亞國家對中國威脅的疑懼，進而離中共希望營造的戰略形勢愈來愈遠。事實上，美國在東亞的戰略目標亦是經濟高於軍事，軍事只是其戰略手段，面對中共為維護其核心利益展現的決心，美國也可能調整原先的強硬策略，轉向和中國就各自的底線及共同利益進行協調。目前看來，2013 年 6 月的兩國元首莊園會晤正踏出了第一步，彼此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能否深化則仍有待觀察。無論如何，中共都必須先擁有足夠的實力讓美國在東亞利益上有所退讓，因此中共必定會全力追求成為東亞國家中權力最高位者。

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假設，一國對國際秩序的企圖很有可能會隨著自身實力的上升而擴張。那麼，當中國國力達到東亞國家中的最高位後，是否會開始追求成為東亞霸權乃至全球的超級大國？關於這個問題，由於美國的超強實力在短期內很難消失，本文很難給予明確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未必認為稱霸符合自身的利益，承擔過多的領導也許反而是種包袱，中國更看重的該是在國際政治中的威望，也就是與西方大國平等的話語權力。

第二節 未來展望

西方學界在觀察中共的外交思維時，經常將中共官方提出的政策宣示看作是純粹的政治宣傳，從而質疑「和平崛起」也只是避免外力制衡的一種工具，並非中共真心相信的一套戰略。然而，透過本文對中共國際秩序觀的研究，發覺中共的外交思維確實是以「和平崛起」作為中心思想，而且只要國際權力結構不發生劇烈的變化，「和平崛起」對中共外交思維的主導作用便不會改變。誠然，中共在「和平崛起」戰略下對自身國際秩序觀的表述，如「國際關係民主化」、「多極化」、「新安全觀」等等，其偏向自由主義的語言並不能真實反映中共的初衷，但反對國際政治為霸權壟斷、希望淡化強權鬥爭的訴求，則的確是中共在衡量自身實力及美國一超獨霸的國際格局後，基於對現實權力條件的認知形成的思維。事實上，當中共提出各種對國際秩序的憧憬時，既有凝聚內部共識的作用，更重要的則是搶奪國際話語權，以此削弱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目前看來，中共關於國際秩序的論述仍未取得國際主流輿論的陣地，其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共至今仍提不出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政治模式，甚至對自己國內的政治改革也還沒定論，因此在論及對國際政治的願景時便缺乏說服力。

研究中共外交戰略時必須注意到，現實權力條件固然是決定中共國際秩序觀的前提，但決策者對內外形勢如何認知才是關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看待中國崛起時也是如此，基於權力取向的思考認為中國必然威脅國際秩序者，表面上似乎是單純以客觀權力結構做出判斷，實際上仍夾雜對中國如何看待權力、使用權力的主觀預設；而基於制度、價值取向的思考認為中國必然威脅國際秩序者，更是懷抱相當主觀的意識形態，堅信中共的政經制度必然導向對國際秩序的挑戰。這種猜忌心理一旦被包裹成具有科學性的理論，便可能陷入一種自我實現的泥淖，對解決可能的衝突不但沒有幫助，還可能有刺激衝突的傾向。

因此，在建立對中共國際秩序觀的正確認識後，以季辛吉為代表的關於建立中美「共同發展」機制的構想，應是未來中美兩國必須追求的方向。以美國為

首的西方世界必須避免對「國際秩序」過於自我的詮釋，不能將國際秩序的現狀定義得過於狹隘，如中國為維護核心利益在南海、東海主權爭議中採取的強勢作為，不應被直接當成對區域穩定的破壞，而要看是誰先主動挑起爭端。此外，雖然這幾年「人權高於主權」的論調高漲，但傳統國際政治的準則確實是主權平等、內政不受干預，即便為了維護世界和平穩定而採取的國際干預，根據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亦必須經由安理會的決議授權。以上本來都是由西方世界主導創建的制度，如今中共堅決恪守，反而又被鼓吹人道干預的西方視為是不順應國際秩序、不承擔國際責任的證據，這種凌駕於法理之上的話語霸權，有可能倒過來刺激中國國內單邊主義的呼聲，對國際秩序的穩定沒有幫助。一些本來在既存體制內可以協商的價值觀念，被西方世界挾其對國際秩序的詮釋權貼上「政治不正確」的標籤，再以此論證中國威脅國際秩序，最後就會加深對中國意圖的誤判。

站在中國的立場來看，則隨著其自身的國力日益強盛，一方面自信心大大提升，一方面也容易為自己的實力未能轉化為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而感到不滿。近年來，中國輿論界瀰漫了自卑與自傲兩種極端混雜的情緒，有時對自身的成就評價過高，有時又對外界的批評過度敏感。實際上，中共決策者對內外形勢仍抱持較高的理性思維，中共清楚自己還沒形成一套可以往外推廣的發展模式，但也還是在國際政治中佔有重要份量，故而在國際事務的表態上必須精準拿捏，不卑不亢。準此，中共反對國際干預敘利亞問題態度堅決，但在北韓核武問題上則和美、日站在一起譴責北韓。然而，國內的保守及自由兩極的言論卻受意識型態的影響而有異議，自由派認為中國和俄國一起反對干預敘利亞會使得此前「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宣傳功虧一簣，保守派則以背棄盟友為顧慮反對譴責北韓。未來這種對外交策略的意見衝突應會愈來愈多，中共必須為此提供更有力的論述。此外，當前一些懷抱強烈民族情感的學者提出中國要取代、趕超美國的戰略倡議，他們的立論基礎主要是認為美國不會改變其霸權主義，這種論點雖出自維護中國的發展利益，卻可能加深美國對中國的壓制，反不利於中國崛起所需的大局。

近來由日本主動挑起的釣魚台之爭緊緊牽絆著廣大中國人的民族情感。2012年日軍侵佔東北的九一八紀念日前夕，日本政府宣布將釣魚台「國有化」，引發了中國人民反日情緒沸騰。面臨明年就是歲次同為甲午的甲午戰爭一百二十週年，維護釣魚台主權無可避免地成為了中國是否真正崛起的標誌。事實上，與此有連帶關係的台灣問題，更被視為是中國崛起必經的一道坎。在陳水扁擔任中華民國總統的那段時間，從「公投制憲」到「台灣正名」，一連串走向法理台獨的舉措使中外學者高度憂慮，台灣海峽將不免發生戰事。然而，後來中共藉由《反分裂國家法》明確表明，武力是在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的情況下才使用的手段。2008年馬英九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延續2005年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連戰訪問大陸所奠定的路線，開啟兩岸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兩岸關係基本已相當穩定。站在中共的立場，追求中國大陸的現代化發展是優於兩岸統一的目標，¹或者更確切地說，當中國大陸發展得愈來愈好，統一自是水到渠成。2008年胡錦濤提出「胡六點」後便定調，兩岸自1949年後治權分治，但主權並未分裂，當前的兩岸關係是內戰延續下來的「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²言下之意，只要台灣方面不改變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國兩區」體制，中國的主權就不算被分裂，至於兩岸治權的統一，則可以透過協商慢慢推進。

2013年1月，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發表對台海局勢的看法，他一方面認為台灣不能讓中共感覺兩岸統一的協商大門永遠關閉，一方面

¹ 胡錦濤在2004年11月會見巴西華僑時提到：「中國要強盛，中華民族要振興，第一要發展，第二要統一。」準此，在發展與統一的問題上，發展應是放在第一位。見吳綺敏、張川杜，「胡錦濤同華僑華人共話中國如何強盛與振興：第一要發展 第二要統一」，**人民網**，2004年11月14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paper39/13406/1201359.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17日)；宮力，**如何與美國共處：冷戰後中國對美方針與中美關係**(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頁227。

² 胡錦濤指出：「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見「胡錦濤：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華網**，2008年12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2/31/content_10586495_1.htm〉(瀏覽日期：2013年6月17日)。

又要台灣提升自身的軍事嚇阻，不能在經濟上過度依靠大陸。³然而，面對中國大陸崛起的趨勢，台灣不靠大陸尋找發展出路，美國又能給台灣什麼保障呢？美國不允許台灣發展核武，又以高價出售台灣二流軍武，台灣要真正保障自身安全，只有透過與大陸的協商。當前執政的馬英九政府認為，台灣處於複雜的東亞局勢中，同時要周旋於中國大陸、美國、日本這些強權之間，台灣只有保持戰略模糊，才能走出自己的路。⁴「不統，不獨，不武」、「親美，友日，和中」（後來為避免有將台灣獨立於中國之感，又在說辭上改「和中」為「和陸」）、「兩岸不能聯手保釣」等政策都是基於此種考量。但是，隨著中國大陸和美國的實力愈趨接近，台灣實際已走到十字路口，對於未來何去何從必須早作決斷。美國不願放棄台灣這顆制衡中國大陸的棋子，但也不想為台灣做過多的安全及經濟保證，台灣永久事實獨立最符合美國的利益，但這種想法不可能為中共坐視不理。與中國大陸保持戰略模糊，便是對美國也保持戰略模糊，台灣很難同時滿足兩邊的戰略利益。以台灣實力操作中共與美國間的權力平衡，很有可能玩火自焚。

筆者認為，基於兩個理由，台灣前途終究在於中國的崛起。首先，地理位置決定了台灣對中國大陸軍事戰略的重要性，中國大陸不會允許台灣被其它國家利用來制衡自己，中國大陸需要台灣的程度遠遠高於美國。再者，歷史與法理的淵源，決定了台灣與整個中國的命運緊密相連。中共十八大已釋放「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的訊息，⁵馬英九總統應主動面對自己在兩次競選過程中列為政見的兩岸和平協議，爭取與大陸政治協商

³ 見卜睿哲(Richard Bush)著，林添貴譯，*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Uncharted Strait: The Future of China-Taiwan Relations)*(台北：遠流，2013)。

⁴ 馬英九總統接受美國 CNBC 亞洲台專訪時表示：「台灣這麼小，又在一個非常複雜的東亞地區，有中國大陸、日本和美國，在這三強之間我們如何找出一條生存之路，而過去四年的發展證明這條路我們大致上是走出來了，但是要很小心地走才不會跌倒；所以我們走得很謹慎，但是走得並不猶豫，這點非常重要。」見「總統接受美國《CNBC》亞洲台專訪」，*中華民國總統府新聞稿*，〈<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8818&rmid=514&sd=2012/12/15&eId=2012/12/15>〉(瀏覽日期：6月17日)。另外駐美代表金溥聰也表達過類似觀點，見「金溥聰，美中台戰略模糊 對台最好」，*中國時報*，2013年2月15日，〈<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50207533/112013020500096.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17日)。

⁵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2年11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htm〉(瀏覽日期：2013年6月17日)。

的主導權。事實上，小小的台灣正是中國近代不幸歷史的縮影，集偏安、殖民、內戰的遭遇於一身。面對中國崛起的趨勢，應是將自身作為中國大陸發展的借鑑，加入到中華民族復興的行列，抑或是視若無睹乃至看作威脅，考驗著台灣人民的氣魄與智慧。

中國崛起的前景，終究還是把握在包括台灣人在內的所有中國人手上。經歷自強運動、康梁變法、五四運動再到中共建政後的一系列極左革命，中國大陸走上了頗似台灣兩蔣時代「政治威權、經濟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種制度究竟能否長期穩定地運作，還得經由時間來檢驗，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到 2020 年之前，中國大陸仍能靠這套制度保持經濟發展勢頭，而台灣民主制度的表現，無疑也是中共政治改革的重要參照對象。遙望前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須與時俱進，只是改革的方向應向何處，絕不取決於西方的意識型態，而是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



參考文獻

壹、中文文獻

一、專書

- 王逸舟，**創造性介入：中國外交新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 王良能，**中共的世界觀**(台北：唐山，2002)。
- 王緝思總主編，秦亞青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國際秩序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 王緝思總主編，金燦榮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大國戰略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 王緝思總主編，牛軍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中國外交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 王緝思總主編，龐中英主編，**中國學者看世界·全球治理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 王逸舟主編，**磨合中的建構：中國與國際組織關係的多視角透視**(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江澤民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丘宏達著，陳純一修訂，**現代國際法**(台北：三民，2012 修訂三版)。
- 任孝琦，**有愛無悔：保釣風雲與愛盟故事**(台北：風雲時代，1997)。
- 朱鋒，**國際關係理論與東亞安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 朱雲漢、賈慶國主編，**從國際關係理論看中國崛起**(台北：五南，2007)。
- 李少軍，**國際政治學概論（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宋立剛主編，**崛起的中國：全球機遇與挑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 何迪、魯利玲主編，**反思「中國模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 門洪華編，**中國：大國崛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 門洪華、任曉主編，**中國改變世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 金正昆，**外交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 邵宗海，**兩岸關係**(台北：五南，2007)。
- 胡鞍鋼，**中國 2020：一個新型超級大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
- 徐牧，**大變局：中國模式的崛起與西方模式的衰落**(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 孫學峰，**中國崛起困境：理論思考與戰略選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孫成崗，**冷戰後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研究**(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8)。
- 孫興杰，**超級大國與大國：美國獨霸還是多極均勢**(吉林：長春出版社，2011)。
- 高飛，**和諧世界與君子國家：關於國際體系與中國的思考**(北京：世界知識出版

- 社，2011)。
- 凌青，**從延安到聯合國——凌青外交生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 秦亞青，**國際體系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
- 秦亞青，**權力·制度·文化：國際關係理論與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一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三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第三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 宮力主編，**如何與美國共處：冷戰後中國對美方針與中美關係**(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 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台北：遠流，2005)。
- 陳琪、劉丰主編，**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陳志敏，**中國、美國與歐洲：新三邊關係中的合作與競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張仕榮，**21世紀初期中美日安全關係中的台灣問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 張蘊嶺，**構建和諧世界：理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 張文木，**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頁 72~73。
- 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一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陶文釗，**中美關係史上卷：1911—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 349。
- 張歷歷，**外交決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
- 黃筱蕪主編，**中共崛起對亞太地緣戰略的影響：我國的回應與策略**(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0)。
- 鄭永年，**通往大國之路：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重塑**(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
- 鄭永年，**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
-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 劉明福，**中國夢**(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
- 劉曉波，**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台北：允晨文化，2009)。
- 蔡瑋、柯玉枝主編，**中國和平發展與亞太安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5)。
- 蕭佳靈，**國家主權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

二、期刊論文

- 王兵、張光成、石紅聚，「文事與武備——中國和平崛起的內在辯證關係」，**社會科學論壇（學術研究卷）**(石家莊)，2007年第12期，頁34。
- 王國富，「論中國的國家定位」，**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山東)，第28卷第6期(2006年11月)，頁59。
- 王逸舟，「中國國家安全環境」，**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1993年第6期，頁34~37。

- 王緝思，「美國霸權的邏輯」，**美國研究**(北京)，2003年第3期，頁7~29。
- 朱新民、譚偉恩，「中國改革開放之政策評析：經濟、政治的改革與外交政策的調整及挑戰」，**東亞研究**，第36卷第1期(2005年1月)，頁13~17。
- 任晶晶，「東亞區域合作語境下的中國外交：一個新地區主義的視角」，**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北京)，2006年第5期，頁60~66。
- 宋興洲，「中國崛起：修正型強權或現狀型國家」，**全球政治評論**，2011年第11期，頁19~60。
- 李岱、周陽，「略論當代的戰爭與和平問題」，**國際問題研究**(北京)，1986年第3期，頁1~5。
- 呂耀東，「日本攫取釣魚島圖謀不會得逞」，**瞭望**(北京)，2012年第38期，頁14~15。
- 吳建民，「把握時代特點 走和平發展道路」，**外交評論**(北京)，2005年第5期(總第84期)，頁6~12。
- 吳安家，「論小布希政府的對華政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3卷第3期(2002)，頁140~143。
- 沈旭暉、劉鵬，「從策略性聯盟到意識型態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路徑及動因分析」，**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西安)，第27卷第2期(總82期，2007年3月)，頁67~76。
- 邢賁思，「風雲驟變後的思索」，**科學社會主義**(北京)，1992年第2期，頁8~11。
- 邱坤玄、黃鴻博，「中國的負責任大國身份建構與外交實踐：以參與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53卷第2期(2010年6月)，頁73~101。
-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30卷第3期(1999年7月)，頁23~38。
- 邱坤玄，「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多邊外交理論與實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1卷第4期(2010年10月)，頁1~41。
- 門洪華，「對國際機制理論主要流派的批評」，**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0年第3期，頁23~29。
- 胡宗山，「和平崛起是否可能？——歷史與理論的思考」，**助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湖北)，2005年第4期，頁2。
- 徐世強，「中國和平形象的構建：和平共處 和而不同 和平崛起 和平發展」，**社會科學論壇(學術研究卷)**(石家莊)，2008年第10期，頁48。
- 時殷弘，「關於台灣的幾個必須正視的大戰略問題」，**戰略與管理**(北京)，2002年3~4月，頁27~32。
- 秦亞青，「國家身份、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三種假設」，**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3年第1期，頁10~15。
- 俞邃，「當今大國關係與世界格局」，**國際政治研究**(北京)，1994年第3期，頁1。
- 俞新天，「認識和避免當今的衝突與戰爭——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選擇」，**國際問題研究**(北京)，2004年第6期，頁38~43。

- 高長、吳瑟致，「中國崛起對東亞區域主義的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0 卷第 2 期(2009 年 4 月)，頁 1~48。
- 徐堅，「和平崛起是中國的戰略抉擇」，**國際問題研究**(北京)，2004 年第 2 期，頁 1~8。
- 陳牧民，「當和平崛起遇上台灣問題：菁英認知下的中國安全戰略」，**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卷第 4 期(2006 年 12 月)，頁 1~26。
- 姜長斌，「論中國和平崛起與美國國際戰略」，**國際經濟評論**(北京)，2005 年第 1 期，頁 1~16。
- 桑兵，「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孫中山對新文化派的回應」，**近代史研究**(北京)，2003 年第 2 期，頁 77~99。
- 游博，「和平崛起：鄧小平的治國理念」，**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武漢)，2005 年 2 月(第 1 期)，頁 63~64。
- 張廖年仲，「從 1995~96 年台海危機論冷戰後中共的安全政策」，**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6 卷第 2 期 (2005 年 4 月)，頁 185~222。
- 張鐵軍，「中國與東亞共同體建構」，**東北亞論壇**(吉林)，第 15 卷第 2 期(2006 年 3 月)，頁 38~42。
- 許志吉，「中共在聯合國安理會對維和議題的投票行為研究」，**東亞研究**，第 41 卷第 2 期(2010 年 7 月)，頁 77~110。
- 葉自成，「對中國多極化戰略的歷史與理論反思」，**國際政治研究**(北京)，2004 年第 1 期，頁 9~23。
- 葉自成、蔣立群，「新中國國際秩序觀的變遷」，**黨的文獻**(北京)，2011 年第 6 期，頁 72~78。
- 鈕維敢，「偏見和對立——當代『中國威脅論』透視」，**馬克思主義研究**(北京)，2010 年第 1 期，頁 132~138。
- 楊曉龍，「東亞區域主義與中國周邊外交」，**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安徽)，2005 年第 1 期，頁 8~12。
- 黎紅雷，「和諧哲學：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哲學基礎」，**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2007 年第 6 期，頁 37~43。
- 趙建民、胡志嘉，「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和諧世界觀』：理論與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0 卷第 1 期(2009 年 1 月)，頁 1~44。
- 魯世山，「中國和平崛起理論研究綜述」，**理論建設**(合肥)，2006 年第 2 期，頁 40。
- 樊體寧，「論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國際關係學院學報**(北京)，2005 年第 3 期，頁 16~20。
- 薛曉芃，「中國對東亞地區主義觀念的轉變」，**外交評論**(北京)，總 89 期(2006 年 6 月)，頁 28~33。
- 蔡育岱，「人權與主權的對立、共存與規避：論述《國家保護責任》在人道干預上的意涵及重要性」，**東吳政治學報**，第 28 卷第 4 期，頁 1~36。

- 蔡東杰，「當前東亞霸權結構的變遷發展分析」，*全球政治評論*，2005 年第 9 期，頁 101~121。
- 劉建飛，「和平崛起是中國的戰略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6 年第 2 期，頁 39~40。
- 劉建飛，「論世界格局中的『非極化』趨勢」，*現代國際關係*(北京)，2008 年第 4 期，頁 1~5。
- 劉楊鉞，「從『三個世界』到『和諧世界』」，*理論觀察*(黑龍江)，2007 年第 4 期，頁 44。
- 閻學通，「對『和平崛起』的理解」，*教學與研究*(北京)，2004 年第 4 期，頁 5~6。
- 潘忠岐、黃仁偉，「中國的地緣政治與安全策略」，*社會科學*(北京)，2011 年第 10 期，頁 4~11。
-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頁 115~140。
- 蘇浩，「地區主義與東亞區域合作機制的建立」，*外交學院學報*(北京)，2003 年第 1 期，頁 14~21。

三、報章雜誌

- 汪莉娟，「胡江權鬥『和平崛起』路崎嶇」，*聯合報*，2004 年 9 月 13 日，A13 版。
- 「世界多極化是個積極的發展」，*人民日報*，1988 年 6 月 2 日，第 6 版。
- 「聯合國維和趨軍事化，中國對此深感不安」，*大公報*，1997 年 4 月 12 日，A3 版。
- 「不能任由外部干涉實現政權更迭」，*人民日報*，2012 年 7 月 17 日，3 版。
- 潘維，「敢與西方展開政治觀念鬥爭」，*環球時報*，2008 年 1 月 28 日。

貳、外文文獻

一、專書

- Bernstein, Richard. & Munro, Ross H.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 Gertz, Bill.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0).
- Kissinger, Henry.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1).
- Kupchan, Charles.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2007).
-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 Ramo, Joshua Coo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 The U.S. in a Chaotic World*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二、期刊

- Beckley, Michael.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Issue 3 (Winter 2011/12), pp. 41~78.
- Bergsten, Fred.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7, 2008(4), pp. 57~69.
- Brzezinski, Zbigniew. & Mearsheimer, John J.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Policy*, Issue 146 (Jan/Feb 2005), pp. 46~50.
- Ferguson, Niall. "Chimerica' is Headed for Divorce." *Newsweek*, Volume 154, No. 9 (August 2009), p. 56.
- Friedberg, Aaron. "Bucking Beijing: An Alternative U.S. China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5 (Sep/Oct 2012), pp. 48-58
- Fravel, M. Taylor. "China's Attitude toward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since 1989." *Asian Survey*, Vol. 36, No. 11 (Nov. 1996), pp. 1103~1104.
- Huisken, Ron. "The Road to War on Iraq." *Canberra Papers on Strategy and Defense*, No. 148, p. 55, Strategic Defense Studies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3.
- Huntington, Samuel P. "Clashes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p. 22~49.
- Ikenberry, John G.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3 (May/ June 2011), pp. 56~68.
- Johnson, Alastair Iai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Issue 4 (Spring 2003), pp. 5~56.
- Krasner, Stephan D.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pp. 185~205.
- Li, Eric X. "The Life of the Party: The Post-Democratic Future Begins 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1 (Jan/Feb 2013), pp. 34~46.
- Mearsheimer, John J.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April 2006, pp. 160~162.
- Miller, Ken. "Coping With China's Financial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4 (Jul/Aug 2010), pp. 96~109.
- Munro, Ross H.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62 (Fall 1992), pp. 10~16.
- Nye, Joseph S. "China's Rise Doesn't Mean War." *Foreign Policy*, Issue 184 (Jan/Feb 2011), p. 66.
- Nye, Joseph S. "Recove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Survival*, Vol. 50, No. 1 (Feb/Mar.

- 2008), pp. 55~68.
- Nye, Joseph S.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6 (Nov/Dec, 2010), pp. 2~12.
- Pei, Minxin. "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 *Foreign Policy*, Issue 153 (March/April 2006), pp. 32~40.
- Posen, Barry R. "Emerging Multipolarity: Why Should We Care?"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2009, pp. 347~352.
- Rose, Gideon.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Oct 1998), pp. 144~172.
- Ross, Robert S. "The Problem with the Pivot." *Foreign Affairs*, Volume 91, Issue 6 (Nov/Dec 2012), pp. 70~82.
- Ross, Robert S. "Assessing the China Threa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81 (Fall 2005), pp. 81~87.
- Ruggie, John G.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3, 1975, pp. 557~583.
- Paul, T.V.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46~71.
- Suettinger, Robert L. "The Rise and Descent of 'Peaceful Ris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12 (Fall 2004), pp. 1~10.
- Wohlforth, William. "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Dec 2008), pp. 28~57.

參、譯著

-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洪漫、于卉芹、何衛寧譯，**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
- 約瑟夫·奈著，劉華譯，**美國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 珍妮·克萊格(Jenny Clegg)著，葛雪蕾、洪漫、李莎譯，**中國的全球戰略：走向一個多極世界**(*China's Global Strategy: Toward a Multipolar World*)(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杜繼東譯，**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0)。
- 埃里克·安德森(Eric C. Anderson)著，葛雪蕾、洪漫、李莎譯，**中國預言：2020年及以後的中央王國**(*China Restored: The Middle Kingdom Looks to 2020 and Beyond*)(北京：新華出版社，2011)。

-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台北：時報出版，2007)。
- 文正仁著，李春福譯，*中國崛起大戰略——與中國知識精英的深層對話*(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
- 阿倫·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著，洪漫、張琳、王宇丹譯，*中美亞洲大博弈(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
- 卜睿哲(Richard C. Bush)，*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台北：遠流，2012)。
- 理查德·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顧國良主編，*力量與克制：中美關係的共同願景(Power and Restraint: A Shared Vision for the U.S. – China Relationship)*(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0)。
- 阿倫·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著，洪漫、張琳、王宇丹譯，*中美亞洲大博弈(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
- 藍普頓(David M. Lampton)著，許秋楓譯，*同床異夢(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 卜睿哲(Richard Bush)著，林添貴譯，*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Uncharted Strait: The Future of China-Taiwan Relations)*(台北：遠流，2013)。

肆、網路資料

一、電子報

- 王曉鵬，「日本到底要在釣魚島釣什麼『魚』」，人民網，2012年9月10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0910/c1002-18969321.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 朱啟超，「駁閻學通『超級大國』論」，中國評論新聞網，2012年1月6日，〈<http://mag.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81&docid=101967904&page=1>〉(瀏覽日期：2013年3月13日)。
- 李忠杰，「怎樣認識和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人民網，2006年5月16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1038/4376706.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13日)。
- 吳綺敏、張川杜，「胡錦濤同華僑華人共話中國如何強盛與振興：第一要發展 第二要統一」，人民網，2004年11月14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paper39/13406/1201359.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17日)。
- 邱震海，「全球格局是否真的迎來中美兩超並列時代(鳳凰衛視 2012年7月8日

- 《寰宇大戰略》節目文稿)，**鳳凰博報**，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698982.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13日)。
金燦榮、段皓文，「重要機遇期的變與不變」，**新華網**，2013年2月2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26/c_124388840.htm〉(瀏覽日期:2013年3月5日)。
吳明彥，「美中較勁下之東亞峰會」，**國政基金會**，2012年11月28日，
〈<http://www.npf.org.tw/post/3/11687>〉(瀏覽日期:2013年3月5日)。
時殷弘，「日本『購島』緣於其國內政治競選大背景」，**中國青年網**，2012年9月17日，〈http://d.youth.cn/shrgch/201209/t20120917_2444413.htm〉，(瀏覽日期:2012年9月17日)。
張羽，「林毅夫駁『經濟崩潰論』：未來20年中國仍有年增8%潛力」，**中國新聞網**，2013年5月23日，
〈<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5-23/4850509.s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陳振凱，「中國夢的中國氣質與中國景象」，**人民網**，2012年12月8日，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2-12/08/content_1156744.htm〉
(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4日)。
陳先奎、辛向陽，「中國崛起是否可能」，**學習時報**，2004年3月25日，
〈<http://www.studytimes.com.cn/chinese/zhuanti/xxsb/648323.htm>〉(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陳先奎、辛向陽，「中國和平崛起的基本含義」，**學習時報**，2004年3月25日，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607808.htm>〉(瀏覽日期:2013年2月19日)。
陳葉軍，「張維為：中國模式是『最不壞』的模式」，**聚焦中國模式——人民網理論頻道**，2009年7月20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9687131.html>〉
(瀏覽日期:2013年5月25日)。
陳葉軍，「程恩富：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驗已上升為中國模式」，**聚焦中國模式——人民網理論頻道**，2009年3月12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6888/77791/8953652.html>〉(瀏覽日期:2013年5月25日)。
陳葉軍，「俞可平：中國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徑」，**聚焦中國模式——人民網理論頻道**，2009年9月9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019441.html>〉(瀏覽日期:2013年5月25日)。
陳有為，「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在於不確定性」，**星島環球網**，2006年4月13日，
〈http://www.stnn.cc:82/op_ed/ed_china/t20060413_189452.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楊恒均，「中國為何投反對票」，**鳳凰博報**，2012年7月21日，

-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882846.html>〉(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 楊明珠，「日發言人駁擱置釣島爭議言論」，**中央通訊社**，2013年6月5日，〈<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306050174-1.aspx>〉(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 楊成銘，「發展權的促進和保護：以《世界人權宣言》和中國為中心」，**中國人權研究會**，2013年4月18日，〈http://www.humanrights.cn/cn/book/1/t20130418_1024271.htm〉(瀏覽日期：2013年5月23日)。
- 劉屏，「歐巴馬：歡迎中國和平崛起 習近平：盼建立非對抗關係」，**中時電子報**，2013年6月9日，〈<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3616/112013060900070.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 劉國新，「論中國新安全觀的特點及其在周邊關係的運用」，**當代中國研究所**，2006年1月1日，〈<http://www.iccs.cn/iccs/contents/466/8947.html>〉(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 閻學通，「一超多強走向中美兩超 多極化式微」，**環球網**，2011年12月23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1-12/2315255.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13日)。
- 「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 政治局常委與記者見面」，**中國網**，2012年11月15日，〈http://news.china.com.cn/18da/2012-11/15/content_27121188.htm〉(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4日)。
- 「習近平：承前啟後 繼往開來 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奮勇前進」，**新華網**，2012年11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29/c_113852724.htm〉(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4日)。
- 「中國 GDP 規模超過日本 正式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網**，2011年2月14日，〈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11-02/14/content_21915401.htm〉(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4日)。
- 「高盛：中國 2027 年有望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環球網**，2011年11月21日，〈<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1-11/2190759.html>〉(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4日)。
- 「崛起的中國要有自己的話語權——訪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宮力教授」，**南方網**，2004年3月22日，〈<http://www.southcn.com/nflr/llzhuanti/hpjq/sdcs/200405101003.htm>〉(瀏覽日期：2012年3月7日)。
- 「新聞背景：『中國和平崛起論』的誕生和發展」，**新華網**，2004年4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4/23/content_1436993.htm〉(瀏

- 覽日期：2012年12月15日)。
-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在2003年博鰲亞洲論壇的講演」，**新華網**，2003年11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11/24/content_1195240.htm〉(瀏覽日期：2012年3月2日)。
- 「中國的發展 亞洲的機遇——胡錦濤在博鰲亞洲論壇2004年年會開幕式上的演講」，**新華網**，2004年4月26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4/26/content_1439621.htm〉(瀏覽日期：2012年3月2日)。
- 「鄭必堅：『和平崛起』同『和平發展』是一回事」，**新華網**，2007年9月21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9/21/content_6765487.htm〉(瀏覽日期：2012年3月8日)。
-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2012年11月18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3.html>〉(瀏覽日期：2012年12月31日)。
- 「經濟學人：中國將在2019年超越美國」，**多維新聞**，2010年12月20日，
〈<http://economics.dwnews.com/news/2010-12-20/57214306.html>〉(瀏覽日期：2012年12月31日)。
- 「《瞭望》：中國2020年全面趕超美國」，**多維新聞**，2011年1月5日，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1-01-05/57264171.html>〉(瀏覽日期：2012年12月31日)。
- 「奧運開幕式：『和』字裡的大智慧」，**人民網**，2008年8月10日，
〈<http://www.022net.com/2008/8-10/463028202913896.html>〉(瀏覽日期：2013年1月7日)。
- 「溫家寶總理答中外記者問實錄」，**新華網**，2006年3月14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3/14/content_4301180.htm〉(瀏覽日期：2013年2月19日)。
- 「第十次駐外使節會議在京舉行」，**人民網**，2004年8月30日，
〈<http://zg.people.com.cn/BIG5/33832/33852/2748368.html>〉(瀏覽日期：2013年1月14日)。
- 「國際觀察：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屬性沒有改變」，**新華網**，2010年9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9/19/c_12587652.htm〉(瀏覽日期：2013年2月19日)。
- 「中國軍力第二 綜合國力第七 社科院黃皮書淪為笑話」，**香港商報**，2010年1月6日〈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0-01/06/content_2457664.htm〉(瀏覽日期：2013年3月13日)。
- 「網民指中國未達『超級大國』」，**多維新聞**，2012年1月1日，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2-01-01/58469656.html>〉(瀏覽日期：2013

年3月14日)。

「少將：『南海是中國核心利益』非官方表態」，**中國評論新聞**，2010年10月12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7/2/1/10147217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47217>〉(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專家稱『中國將南海升級為核心利益』提法極不明智」，**人民網**，2010年8月24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2531874.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劉賜貴：維護中國在南海的權益事關國家核心利益」，**華夏經緯網**，2012年10月26日，〈<http://big5.huaxia.com/xw/dlxw/2012/10/3054997.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外交部：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多邊化、擴大化」，**鳳凰網**，2010年9月21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9/21/2602293_0.s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再平衡戰略』能否更加平衡」，**華夏經緯網**，2013年3月14日，〈<http://hk.huaxia.com/thjq/js wz/2013/03/3247864.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張登及：美重返亞洲 離岸制衡中國」，**中國評論新聞**，2012年11月27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3/1/8/4/102318431.html?coluid=5&kindid=23&docid=102318431&mdate=1127111922>〉(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中國漁船黃岩島遭菲軍艦侵擾」，**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8221/72028/242209>〉(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菲律賓在中國黃岩島海域製造事端」，**央視網**，〈<http://big5.cctv.com/gate/big5/news.cntv.cn/special/zfjcnhhyddz/shouye/index.s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奧巴馬要在東亞峰會插手南海」，**新華網**，2013年3月14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14/c124455829.htm>〉(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豪勇7壯士登釣島 共插兩岸國旗」，**中時電子報**，2012年8月16日，〈<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1741/112012081600079.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野田稱『購買釣魚島』為維持穩定管理 望中方理解」，**鳳凰網**，2012年9月8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diaoyudaozhengduan/content-3/detail_2012_09/08/17454385_0.s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中國外交部就日本宣佈『購島』發表聲明(全文)」，**新華網**，2012年9月10

-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9/10/c_113026288.htm〉(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 「馮昭奎：日本最怕中國和平崛起 圖謀打亂中國戰略部署」，人民網，2012年9月14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0914/c159300-19013754.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 「美國防部長會習近平 盼滅火」，中時電子報，2012年9月20日，〈<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land/11050503/122012092000173.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 「美挺安倍：反對威脅區域穩定」，自由電子報，2012年2月23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feb/23/today-t2.htm>〉(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 「日本政府一意孤行意欲何為？」，中國評論新聞，2012年9月14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2/3/3/1/102233139.html?coluid=4&kindid=20&docid=102233139&mdate=0914092254>〉(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 「潘維：關於『中國的和平崛起』」，新法家，〈<http://www.xinfajia.net/789.html>〉(瀏覽日期：2013年2月19日)。
- 「先驅評論：中國『聯美制獨』的深意」，人民網，2007年12月11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42969/58520/6637251.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9日)。
- 「美俄首次參加東亞峰會引關注 美國擴大亞洲足跡」，人民網，2011年11月16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278/16270357.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9日)。
- 「中國反對東亞峰會談南海」，新華網，2011年11月17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1/17/c_122292867.htm〉(瀏覽日期：2013年4月22日)。
- 「溫家寶批駁『中美 G2 共治全球』：毫無根據」，中國評論新聞，2009年5月21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7/5/3/10097533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975339>〉(瀏覽日期：2013年4月7日)。
- 「李肇星聯大發言主張加強聯合國作用並提五大建議」，中國新聞網，2003年9月25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n/2003-09-25/26/350504.html>〉(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 「新中國八次投出否決票 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利益」，環球網，2012年2月8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2-02/2417989.html>〉(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 「一張聯合國否決票 抵得上百億外援」，東方日報，2012年2月7日，〈http://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20207/00182_001.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期：2012年12月16日)。

「外交部官員：中國在聯合國行使否決權是謹慎的」，**中國新聞網**，2012年1月19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gn/2012/01-19/3617584.shtml>〉(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周小川：改革國際貨幣體系 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鳳凰財經**，〈<http://finance.ifeng.com/news/hgjj/20090323/469925.shtml>〉(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溫家寶批駁『中美 G2 共治全球』：毫無根據」，**中國評論新聞**，2009年5月21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9/7/5/3/10097533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975339>〉(瀏覽日期：2013年4月7日)。

「張業遂大使在美中國貿委會招待會上的致辭」，**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2012年6月6日，

〈<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sgxx/dszc/dashihuodong/t939465.htm>〉(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開啟 十一年努力終掀大幕」，**新華網**，2013年3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7/c_115172671.htm〉(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TPP 擴容或衝擊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中國評論新聞**，2013年3月28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4/8/4/4/102484475.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2484475>〉(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中國代表團團長、外長唐家璇在第 54 屆聯大上的發言」，**新華網**，1999年9月22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72.htm〉(瀏覽日期：2013年5月22日)。

「『習氏外交』有三力」，**新華網**，2013年3月2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13-03/28/c_132268106.htm〉(瀏覽日期：2013年5月22日)。

「『中國模式』被賦新內涵」，**香港新聞網**，2013年5月9日，

〈<http://www.hkcnahk/content/2013/0509/191217.shtml>〉(瀏覽日期：2013年5月25日)。

「金溥聰，美中台戰略模糊 對台最好」，**中國時報**，2013年2月15日，

〈<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50207533/112013020500096.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17日)。

「中美關係：人權問題是關鍵」，**求是理論網**，2012年2月20日，

〈http://big5.qstheory.cn/gj/gjsspl/201202/t20120220_139743.htm〉(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外交部：釣魚島問題美國負有不可推卸歷史責任」，**環球網**，2013年1月20

- 日，〈<http://world.huanqiu.com/regions/2013-01/3553088.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 「安倍挑釁言行 違背美戰略利益」，**旺報**，2013年1月15日，〈<http://news.chinatimes.com/wantdaily/11052101/112013011500576.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 「中國社科院黃皮書：不能排除釣魚島危機升級風險」，**新華網**，2012年12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24/c_114137142.htm〉(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 「美《時代》雜誌指責中國引發東亞緊張 稱似火藥庫」，**環球網**，2013年2月2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2/3611516.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 「安倍晉三再次強調欲把自衛隊改為『國防軍』」，**中國新聞網**，2013年2月16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gj/2013/02-16/4565211.s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 「日內閣準設國家安全委員會 意在加強一元化領導」，**中國新聞網**，2013年6月8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08/c_124833748.htm〉(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 「美『準國務卿』聽證會上對華示好」，**新華網**，2013年1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1/26/c_124281792.htm〉(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 「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的增長格局」，**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7年12月17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5/6662531.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 「美媒：習近平更具毛派色彩」，**中時電子報**，2013年6月9日，〈<http://news.chinatimes.com/focus/501013616/132013060900579.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 「外交部：中國政府強烈敦促朝鮮信守無核化承諾」，**人民網**，2013年2月12日，〈<http://world.people.com.cn/BIG5/n/2013/0212/c57507-20482096.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 「日本前首相鳩山『親華遠美』言論遭曝光 在日引發熱議」，**新華網**，2011年5月6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5/06/c_121385554.htm〉(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 「中美首腦會談就促進朝鮮無核化等達成一致」，**中國評論新聞**，2013年6月8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5/7/2/2/102572220.html?coluid=148&kindid=7550&docid=102572220&mdate=0608154737>〉(瀏覽日期：2013年

6月8日)。

「朱雲漢：中國大陸興起與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重組」，*觀察者*，2013年1月21日，〈http://www.guancha.cn/ZhuYunHan/2013_01_21_122289_3.s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Peter Brookes, “Club For Dictators: An ugly agenda for Asia,”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une 12 2006),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commentary/2006/06/club-for-dictators-an-ugly-agenda-for-asia>〉 (Accessed May 21 2013).

Stephan M. Walt, “Dealing With a Chinese Monroe Doctrine,”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 2012,
〈<http://www.nytimes.com/roomfordebate/2012/05/02/are-we-headed-for-a-cold-war-with-china/dealing-with-a-chinese-monroe-doctrine>〉(Accessed Mar. 28 2013).

“China: one step closer to 'superpower' status,” *The Voice of Russia*, Mar. 4 2013,
〈http://english.ruvr.ru/2013_03_04/China-one-step-closer-to-superpower-status〉 (Accessed Mar. 28 2013).

“A Point of View: What kind of superpower could China be?” *BBC*, Oct. 19 2012,
〈<http://www.bbc.co.uk/news/magazine-19995218>〉 (Accessed Mar. 28 2013).

“China: The Other Superpower,”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special/world/china_superpower〉 (Accessed Mar. 28 2013).

“Obama Touts ‘Renewal’ of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on His Watch,” *CNSNews.com*, Jan. 25 2012 ,
〈<http://cnsnews.com/news/article/obama-touts-renewal-american-global-leadership-his-watch>〉 (Accessed Apr. 7 2013).

Geoff Dyer & Richard McGregor, “Opposition to US inspires ‘NATO of the east’ ,” *The Financial Times*, June 22 2006,
〈<http://www.ft.com/intl/cms/s/0/ff4b3e0e-018a-11db-af16-0000779e2340.html#axzz2TuUPIdTF>〉 (Accessed May 21 2013).

二、檔案資訊

李文海，「『振興中華』口號的由來」，*中華文史網*，
〈<http://www.qinghistory.cn/magazinefree/html/31/200/content/228.shtml>〉(瀏覽日期：2013年1月2日)。

陳述，「『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提出」，*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news/60years/2009-09/25/content_18603838.htm〉 (瀏覽日期：2013年1月13日)。

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1989年11月23日)，*中國共產黨新*

- 聞，〈<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69113/69684/69696/4950049.html>〉(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6/25/content_1546523.htm〉(瀏覽日期：2012年3月7日)。
-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文)」，新華網，2011年9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 「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中國網，2005年12月，〈<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book/1069230.htm>〉(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 「中國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mfa.gov.cn/chn/pds/ziliao/wjs/t8987.htm>〉(瀏覽日期：2012年7月14日)。
- 「1974年毛澤東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2/22/content_10839608.htm〉(瀏覽日期：2012年7月14日)。
-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04年4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4-04/29/content_1447509.htm〉(瀏覽日期：2013年1月2日)。
- 「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通過)」，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5/65448/6415129.html>〉(瀏覽日期：2013年1月7日)。
- 「『三步走』戰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56/64157/4509545.html>〉(瀏覽日期：2013年1月7日)。
- 「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全文)」，新華網，2005年9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6/content_3496858.htm〉(瀏覽日期：2013年1月7日)。
- 「冷靜觀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2/1028/c350803-19412863.html>〉(瀏覽日期：2013年1月7日)。
- 「中國統計年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sj>〉。

-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b_602314/zzjg_602420/yzs_602430/dqz_z_602434/nanhai_602576/t848051.shtml〉(瀏覽日期：2013年3月28日)。
-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6810次會議記錄」，聯合國正式文件，2012年7月19日，
〈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6810〉(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6711次會議記錄」，聯合國正式文件，2012年2月4日，
〈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6711〉(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6627次會議記錄」，聯合國正式文件，2011年10月4日，
〈http://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PV.6627〉(瀏覽日期：2012年12月16日)。
- 「《上海合作組織五周年宣言》(全文)」，新華網，2006年6月1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6/15/content_4703028.htm〉。
- 「胡錦濤：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華網，2008年12月3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2/31/content_10586495_1.htm〉
(瀏覽日期：2013年6月17日)。
- 「總統接受美國《CNBC》亞洲台專訪」，中華民國總統府新聞稿，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8818&rmid=514&sd=2012/12/15&ed=2012/12/15>〉(瀏覽日期：2013年6月17日)。
- Olga Oliker & David A. Shlapak, "U.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Policy Priorities and Military Roles," *The Rand Cooperation* (2005),
〈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monographs/2005/RAND_MG338.pdf〉 (Accessed May 21 2013).
- Richard Nixon,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June 4 1971,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3100&st=china&st1>〉
(Accessed Jan. 7 2013).
- "Illustration of Proposed Quota and Voting Shares—By Member 1/ (in perc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0/pdfs/pr10418_table.pdf〉
(Accessed Dec. 16 2012).
-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 6 2012,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us/20120106-PENTAGON.PDF>〉
(Accessed Apr. 7 2013).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ddress by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15 2009,
〈<http://www.cfr.org/diplomacy/council-foreign-relations-address-secretary-state-hillary-clinton/p19840>〉 (Accessed May 26 2013).

三、電子期刊

尹懷哲，「綜合分析美日安保共同戰略目標對台灣的影响」，*海峽評論*，2005年4月號(總172期)。

梁肅戎，「孫中山與日本及其對日的忠告」，*海峽評論*，2000年3月號，
〈<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111-3544.html>〉 (瀏覽日期：2013年3月29日)。

宋鎮照，「美國重返亞洲的企圖與策略：霸權地位保衛戰」，*海峽評論*，第266期(2013年2月號)，〈<http://www.haixiainfo.com.tw/266-8657.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林國炯，「戰雲密布的釣魚島」，*海峽評論*，第266期(2013年2月號)，
〈<http://www.haixiainfo.com.tw/266-8664.html>〉(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熊玠，「美國新政府與東亞：衡乎？對抗乎？」，*海峽評論*，第267期(2013年3月號)，〈<http://www.haixiainfo.com.tw/267-8682.html>〉 (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曾健民，「『朝核危機』聲中，堅持中朝友好」，*海峽評論*，第267期(2013年3月號)，〈<http://www.haixiainfo.com.tw/267-8680.html>〉 (瀏覽日期：2013年6月8日)。

Lieberthal, Kenneth,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 *Foreign Policy*, Dec. 11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2/21/the_american_pivot_to_asia〉 (Accessed Mar. 28 2013).